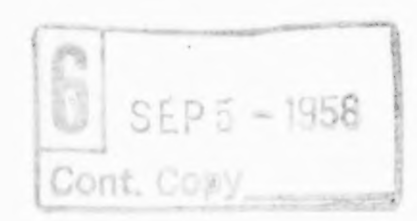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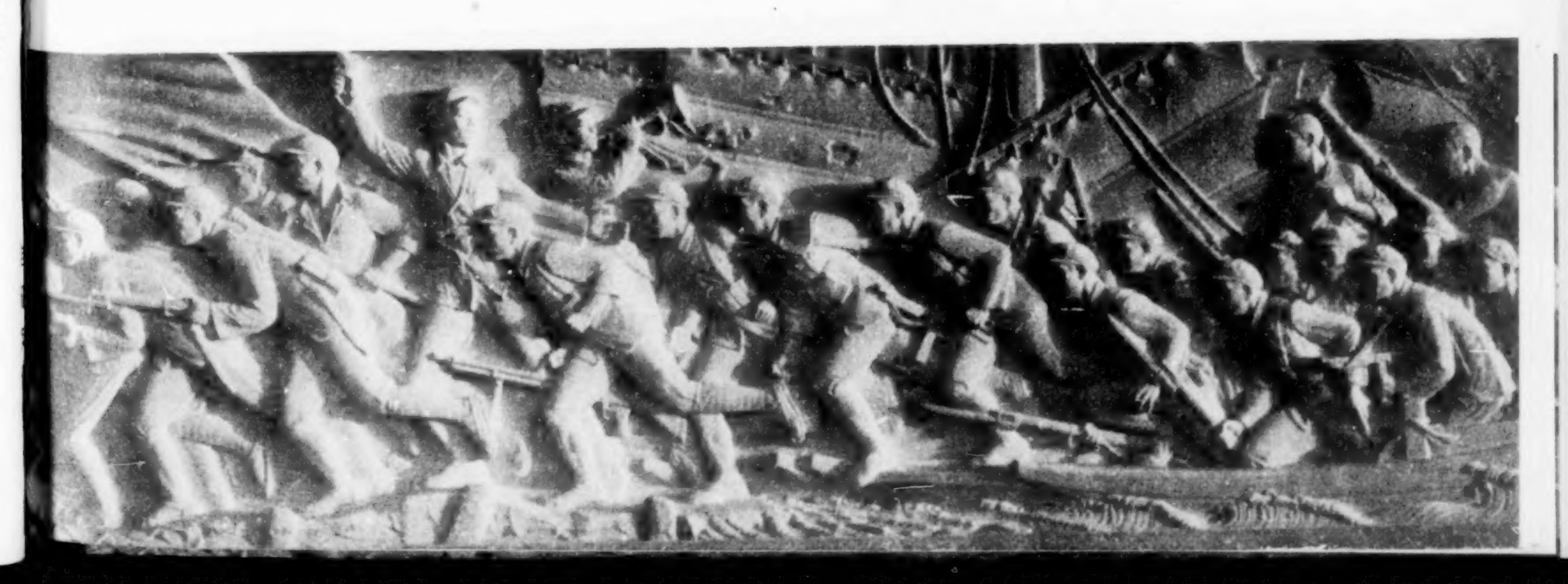
歷史教學

LISHI JIAOX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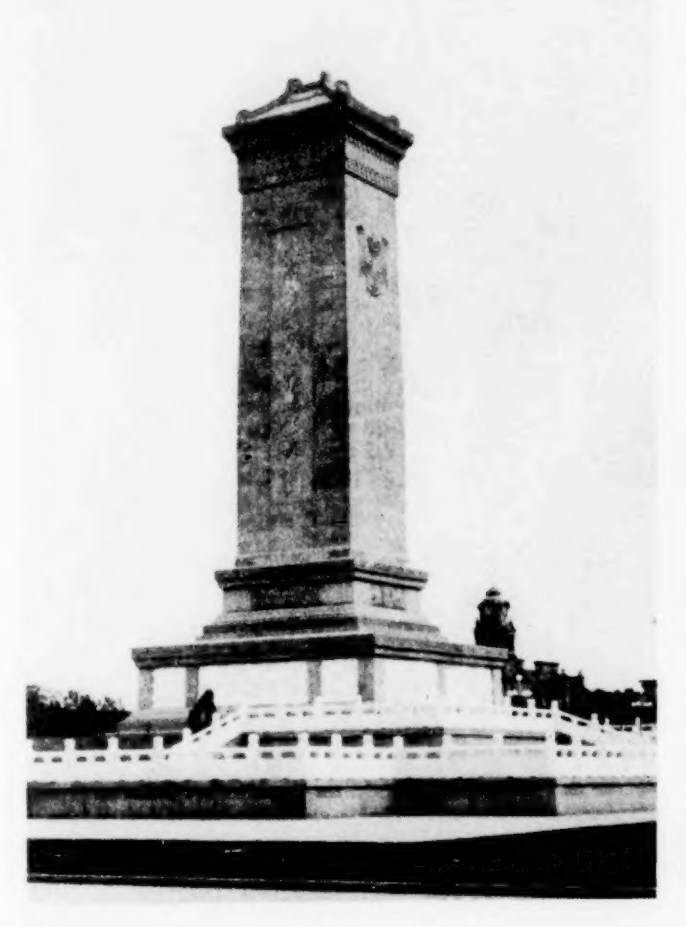


7

1958



人民英雄紀念碑及其浮刻





庄严地矗立于北京天安門广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已于1958年五一節建成揭幕。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第一届全体会議，通过决議为先烈建立紀念碑。当天下午六时，毛主席率領全体委員在天安門广場为紀念碑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奠基礼，并宣讀了碑文。这以后就积极进行了修建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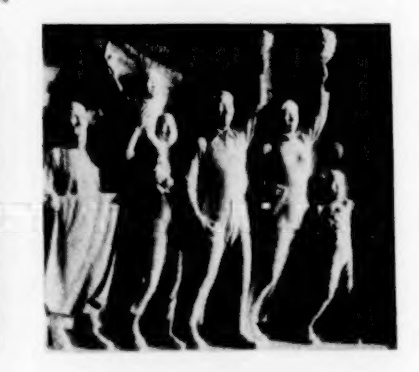
紀念碑在天安門与正陽門之間，从地面到碑頂高37.94公尺（比天安門还高4.24公尺）。碑心石正面（北面，見上左圖）刻着毛主席題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鎦金大字；碑背面（南面，見上右圖）是周恩來总理書寫的碑文鎦金字。碑文全文如下：

人民英雄紀念碑
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內外敌人爭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爭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第一届全体会議建立

在碑身須弥座四周是八塊从鴉片战爭到解放战爭胜利的历史浮刻（見封底里，封底）和兩塊裝飾性浮刻（見下圖），它們依次是：东面的兩塊由北至南是"燒鴉片"和"金田起义"；南面的三塊由东至西是"武昌起义"、"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西面的兩塊由南至北是"八一南昌起义"和"抗日游击战"；北面三塊的正中是"胜利渡長江"，其西头是"支援前綫"，东头是"迎接解放"。参加雕刻創作工作的有著名雕刻家刘开渠、滑田友、王臨乙、萧傳久、張松鶴、曾竹昭、傅天仇和青年雕刻家多人。石刻高二公尺，十塊合在一起共長40.68公尺，都是用河北省房山縣出产的汉白玉做成的，这种石料可經八百年至一千年不風化。全部浮刻有一百九十一个人物。（本期所用紀念碑及浮刻照片系新華社稿）



支援前綫



欢迎人民解放軍

理論学习

教学参考

教学問題

問題解答

歷史教學
·月　刊·
一九五八年七月号
（总第91期）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历史教学月刊編輯委員会
出版者　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錦州道六号）
發行者　河北省邮电管理局报刊发行局
訂閱处：全国各地邮局
代訂售处：全国各地新华書店
印刷者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

定价每册　0.30元
預定价目
三个月三期　0.90元
半年六期　1.80元
全年十二期　3.60元

本期印数001——22,532

历史教材跃进的道路

（本文是供討論用的）

巩紹英　邱汉生　陈乐素

一　历史教材必須跃进

經过一年多的全民整风运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已經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整风运动挂了帅，以生产建設为中心，各方面工作都在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社会主义建設的高潮，以万馬奔騰之势席卷全国，到处是跃进声，到处是凱歌声。

在党的号召下，在全国人民生产建設热情的鼓舞下，全国教育工作者，包括历史教师，都提出了自己的跃进的愿望：积极提高教学质量，赶上当前这种新的形势和要求。如北京天津一部分中学历史教师所发表的跃进倡議书，就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我們热烈地欢迎他們的倡議，希望全国历史教师共同努力，得到光輝的成就。

历史教材是历史教学工作的基本工具，也反映着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在一定时期內的重要成果。历史教材，对于保証做好历史教学工作，对于推动历史教学工作的跃进，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性的条件。为了适应全民大跃进的形势，适应历史教学工作的需要，历史教材也要以生动活潑的姿态，同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密切結合起来，协調步伐，共同前进，不能故步自封，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

对于过去几年內的历史教材工作，对于現有的历史教材，首先应該肯定它的成績和优点，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方面。这也是我們前进的陣地，不正确认識这些，就会迷失方向，失掉前进的信心和勇气。但是，一定要深入地切实地檢查現有教材的缺点和錯誤，特别是对党的教育方針貫徹不够，对新的形势和教学工作需要不能完全适应的情况，不能諱疾忌医，使教材僵化起来。

几年来，我們在党的領导下，得到各方面的协助，按照現行的教学計划，編成了一套适合于普通中学、小学，同时經过适当的改訂，也适合于师范学校和工农补习学校的历史教材。这些教材基本上是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为基础，学习苏联先进經驗，吸收国內外历史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結合教学实际情况，力求以眞实的正确的历史知識来教育青年一代，培养他們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培养他們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以及加强他們的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等。这些方面同旧的資产阶級的历史教材有根本的原則的区别。这些教材代替了旧的資产阶級思想支配下的，主要是英美帝国主义和买办資产阶級思想支配下的历史教材，是一个重要的胜利。随着历史科学的发展和历史教学經驗的积累，現有教材，同解放初期的教材比較起来，在思想性、科学性和編写方法等方面，都有許多进步。經过两、三年教学实践的証明：在政治上和科学內容上沒有发現重大的原則性的錯誤，在教学上沒有发生严重不适合的現象。有些教材，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分量較重、头緒較繁、取材不够謹严或者文字不够通暢等缺点，根据教师的意見，已經在修訂过程中逐漸作了一些改正。

这些教材的編写工作，是在党中央的深切关怀和教育部的直接領导下进行的，同时也是各方面集体劳动的成果。在教材的編写过程中，組織了历史科学工作者和历史教师的力量，依靠他們的合作，基本上貫徹了党的群众路綫。所以，这些教材基本上是专家与教师相結合，科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結合的产物。在具体工作中，也应用了集体主义的工作方法，这是一个比較成功的經驗。

但是，由于某些条件的限制，主要是編輯工作者政治水平和科学水平的限制，对党的教育方針、政策

了解不够，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和历史科学知識的学习和掌握不够，資产阶級的政治观点和学术思想影响还沒有得到徹底的改造和清除，对实际教学工作的調查研究不够，与教师的联系不够密切，加上时間和人力的限制，不可免地会存在着許多缺点。特别在目前社会主义大跃进的形势下，不能不对教材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毛主席关于教育方針的指示，更有极大的啓发意义，使我們能够站得更高些，向前看得更远些，使我們有了新的武器。必須認眞檢查現有教材的缺点和迅速清除这些缺点，赶到前面去。

現有历史教材的主要缺点是什么？首先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們的教育方針是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覚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来檢査，这一方針在历史教材中还沒有得到完整的全面的貫徹，某些教学內容的配备和材料的选擇缺少明确的目的性。在教材內容和分量方面与教学实际的結合不够，对专家意見注意較多，而对直接从事实际教学工作的广大教师群众的意見注意較少。对某些資产阶級的学术著作或研究結論缺少深入的分析批判，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不够鮮明，这就必然会接受或保留若干資产阶級的思想影响。在以苏联教材为藍本的世界史中，結合中国实际不够，中国史在学习苏联教材的編写方法方面，也有机械模仿的現象。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工作中，都有“厚古薄今”的偏向，对近代史和現代史注意研究不够，对毛主席的著作学习不够，沒有使历史教材更密切地配合当前的現实政治生活和生产建設，为政治服务，为生产建設服务。在科学上也有很多問題，沒有經过深入的独立的研究，同时吸取新的科学成果，得到更明确的解决。举例說：如中国古代史的分期問題（包括封建社会本身的分期問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和封建地方割据問題；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爭和土地制度的改革問題；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过程以及主要矛盾的互相轉化問題；民族資产阶級的历史发展問題；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轉变問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中的許多新問題；以及少数民族历史問題，都是这样。在編写方法上，特别感覚到的，是对于如何具体突出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具体地形象地叙述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况和他們的活动，体現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貫穿教材的基本綫索——阶級斗爭以及生产斗爭的某些方面，还沒有比較成熟的完整的經驗。

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們：应当向前看。我們的工作，在整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洪流中，不过是一个开端，只有草創的意义。一切已有的成績和收获，都是极其微小的，缺点錯誤与前者比較，尽管是十指中的一、二指，但从人民的利益和需要来說，都是不可容忍的。不能有任何盲目自滿情緒，那是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方向背道而馳的。历史教材必須跃进。

二　历史教材跃进的道路

問題提出了，就有解决問題的条件。历史教材跃进的道路，当然应該包括編輯工作者本身的許多具体努力，如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認眞进行思想改造，加强科学研究，深入了解教学实际，种“試驗田”等。这些暫时留在后面来說。这里只着重提出一个問題：即坚决貫徹党的教育方針，坚决貫徹党的群众路綫，依靠党的領导，依靠群众的积极性，推动历史教材的跃进。这是当前教材工作的主要問題，也是教材跃进的重要道路。

前面說过，現有教材的主要缺点，旣然是对党的教育方針貫徹不够，与教学实际的結合不够，那么，消除这些缺点，最重要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把教材放到广大教师群众中去，讓群众的烈火燒一燒。凡是有条件的地区，在党的領导下，都可以組織教师群众的力量，密切联系教学工作实践，大家动手，审査教材，改編教材。这样，才能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改进和提高教材质量，赶上当前的形势和需要。

在各地改編历史教材的工作中，从現在所了解的一部分情况来看，基本上是在現有教材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和补充。当然，如果有些地区，打破成規，重新編写新的教材，更是应該欢迎的。但是，无論哪一种做法，如果能够适当地注意到过去几年来教材編写工作的經驗和已有的收获，而不是完全摒弃这些經驗和收获，当然可以更好地保証新的教材在已有的基础上，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有所提高，少走不必要的弯路。在这样广泛的群众性的基础上，中央出版机关可以广泛吸取各地的經驗，把各地教材或大或小的收获和进步集中起来，逐步改进和提高現有的教材；而各地也可以不断吸取这些成果，充实到自己的教材里面。这样上下交流，截长补短，展开批評和自我批評，展开社会主义的竞赛，就使教材的跃进得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还可以考虑，中央和地方，这一地区和那一地区，根据不同的条件，适当地分工协作；而在一定的时間以后，根据实际情况，还可以集中必要的人力，集中各地的优秀經驗和优良成果，改

編教材。

由于历史科学的特点，它的基本知識、基本綫索和按照年代順序的叙述方式，同語文或自然科学比較起来，教材的統一性和共同性要更多些，这些統一性和共同性的內容应該占主要地位。但是，这仍不妨碍各个地区可以有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圍的灵活性。各个地区可以因地制宜，密切結合本地的生产建設和現实的政治生活，适当地掌握教材的內容和分量，以及补充必要的乡土教材，特別是少数民族历史的教材。这样，就可以更适应当地的特点和需要，同时可以更具体更生动地貫徹政治思想教育。当然，各地补充的教材內容，不应該脫离总的教学目的和任务，教材的分量也要适当地掌握，这些在后面再說。而历史教材統一性和共同性較多的特点，也正有便于集中目标，截长补短，分工协作，要注意避免各自为謀，互相重复，浪費人力。

提倡各地自己动手改編教材，并不是减輕中央出版机关的責任，不是取消中央統一編写和供应教材的必要性。中央出版机关，在党中央和教育部的直接領导下，可以更經常地了解党的教育政策，更全面地了解各地情况，在組織人力，与科学研究机关协作等方面，也有比較便利的条件。中央所編写的教材，可以統一規格，統一体例，掌握統一的知識分量和进度，在教材內容和观点上，可以吸收更多方面的意見。对于还沒有充分条件自己改編教材的地区，中央統一編写和供应教材，当然是不可少的；对于有条件自編教材的地区，也会有重要的帮助。

但是，各地自編教材，也有比較优越的条件。这首先是当地党委和教育行政机关的具体領导，可以取得当地科学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历史科学工作者的协助，更可以直接依靠教师群众的力量，密切結合教学实践，广泛吸收实际教学經驗，大大发揮群众的积极性、創造性，发揮他們的革新精神。这样教材的內容，更适合当地的特点和需要，具体历史事实的詳略，分量的繁簡，都可以有較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至于同普通学校的教学計划有較大差別的各种类型学校，如职业中学等，这种灵活性和机动性就可以更大些。

在目前的形势下，只有这种方法，給历史教材的改进和提高，开辟了广闊的可能性，創造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能够配合整个生产战綫和文化教育战綫上的大跃进，在一个不很长的时間內，开花結果。只有这种方法，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改进和提高教材的方法，这是历史教材跃进的重要道路。

党的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指示："把集中領导和分散經营充分地結合起来，把中央的力量和地方的力量、国家的力量和群众的力量充分地結合起来，把大型的事业和中小型的事业、提高的工作和普及的工作充分地結合起来，这一切，不但适用于工业，而且适用于其它經济事业和文化事业，适用于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整个事业。"这应該也适用于历史教材工作。

三 几个認識問題

改进和提高历史教材，推动历史教材工作的跃进，有几个認識問題，需要經过討論，予以解决。不同的意見应該进行辯論，而且需要实踐的檢驗。現在只提出我們的一些初步意見，作为討論的参考。

（一）关于"厚今薄古"問題：

"厚今薄古"或"厚古薄今"，表現着当前学术上两条不同的路綫，表現着对于学术与政治关系的两种不同的态度。厚古薄今，如陈伯达同志所指出的，是一种"脫离革命实踐的煩瑣主义"。厚古薄今，是引导人們脫离实际，脫离当前政治斗爭，而逃避到"象牙塔"中去的傾向。这是沒落的反动的資产阶級，特別是买办資产阶級学者，如胡适一流人所提倡的道路。有些人自謂清高，迷途忘返，也不自覚地作了他們的俘虏。这种风气是十分有害的。厚今薄古的道路与此相反，是要求学术（包括历史科学）服从政治，密切联系实际，为当前的生产建設和政治斗爭服务。这样，历史科学自然应該以近代史，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現代史为重点，当作主要的研究对象和学习內容。但是，这并不排斥或取消古代史的研究和学习，而是要从根本上明确其研究目的或教学目的，是要"温故而知新"，是要使古为今用，使古人为今人服务。要从古代史中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不是怀古鄙今，也不是存今废古。

在历史教材的編写工作中，也要走这条道路。要坚决貫徹党的教育方針，明确历史教学的目的，是通过具体的历史知識，使学生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規律，培养他們科学的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堅定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信心，鼓舞他們为实現社会主义总路綫而努力学习的热情。这样，近代史和現代史，应該担負更重要的任务，古代史也同样要在这些原则下面，担負一定的任务，而且也是重要的任务。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方面。这是选擇和配备教

材內容的基本标准，也是决定教材分量和比例的基本标准。

在过去历史教材的編写过程中，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工作中，都存在着厚古薄今的偏向。在思想上以为古代史的問題較多，爭論較多，材料的分析整理較少，需要多鉆研，多摸索；近代史和現代史，从教学方面来看，爭論的問題較少，材料比較集中，而且經过一些整理，有党的文件和毛主席的著作可以依据。这样，在人力的配备上，在編写时間上，用于古代史的較多，而用于近代史和現代史的就很少。古代史教材內容和重点的选擇、配备也有許多不尽得当的地方。这就是教材工作脫离实际、脫离政治的重要表現，是資产阶級思想影响的重要表現。厚今薄古的原则，确是給我們的工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教学計划，教材的分量和比例，也是体現厚今薄古或厚古薄今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現行的教学計划来看，古今比例大体相等，只有初中世界史因为照顾与高中課程的銜接，近代史和現代史比重較少，高中中国現代史写的比較匆促，当时考虑与政治課的分工，沒有把 1949 年以后的一段历史編写进去，是一个重要缺点，这些都已經改正。由于历史科学的特点，它的学习对象是从古至今的历史事实，要采取按照年代順序的叙述方式，这与其它課程不同，与政治課也不同。特别是中国历史比較长，而近代史的开始，从鴉片战爭算起，却晚于其它国家的历史两个世紀左右。这样，古今比例大体相等（暫不把各年級学生的学习能力的差别計算在內），事实上是体現了“略古詳今”的原则，基本上与“厚今薄古”的原則是一致的。事实上，我們的教学計划同資产阶級的教学計划比較起来，也有重要的原則性的区别，体現着不同的路綫，不应該混为一談。

現行教学計划中的教材比例，在必要的时候，也是可以考虑适当改变的，如适当扩大近代史和現代史的比重，相应地减少一些古代史的比重；但是，較高年級的改变不宜过多，因为这样会过分限制学生的知識范圍，不能比較完整地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規律及其全貌，不能更充分地貫徹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这对高等学校文、史等科課程的銜接固然有一定的困难，就是作为一个有社会主义覺悟有文化知識的劳动者，如果不是过于狹隘地了解，也是不够适当的。所以，有些同志对于厚今薄古这一原則的了解，只局限于教材的分量和比例，要求近代史和現代史的教学时間过多地超过古代史，甚至机械地从先后远近来衡量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地位，如要求厚辛亥革命而薄太平天国，这就容易离开問題的本質方面，而流入形式主义。就是在近代史和現代史的范圍以內，同样也要防止脫离現实的偏向，这是一个根本观点和态度問題。

（二）关于“欧洲中心主义”問題：

我們的世界历史教材，以苏联教材为藍本，欧洲历史所占的分量較多，有些人批評这是“欧洲中心主义”。这一問題应該具体分析。

西方資本主义的历史科学，一向是以欧洲历史为中心。这是由于那些国家御用的历史学家，把欧洲人当作“高等人种”，以为一切文化都是由他們創造的，他們应該統治全世界；把非欧洲人当作“低等人种”，沒有創造或推进文明的能力，只能成为欧洲人的剝削对象。这种对于非欧洲民族的卑視和誣蔑，是不能容忍的，要求改变这种做法是正确的。解放以前的世界史教材，不仅因襲了这种形式，而且接受了这种反动的历史观点，那是英美資产阶級思想影响的結果。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科学有着完全不同的情形。苏联的历史科学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有科学的历史观点和民族理論作依据，它对非欧洲民族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着正确的認識和态度，不受資产阶級傳統偏見的束縛。事实上，苏联历史学家在这方面的貢献，譬如說，对古代东方历史和殖民地附属国历史的研究，都是有目共覩的。在历史教材中，对这方面也是愈来愈重視了。

由于苏联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联系，也由于目前历史科学的发展情况，对于欧洲以外国家的历史，材料的发掘和整理还很不足，許多問題沒有經过充分的研究；所以，在苏联的历史著作和教材里面，欧洲历史所占的分量較多，这是可以理解的。还要具体考虑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典作家对于社会发展規律的研究，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起，到“帝国主义論”止，主要是以欧洲各国为典型；近代史和現代史的主要綫索——資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体系的对立和斗爭，欧洲都是重要部分，今天欧洲国家在国际关系上也还有一定的地位，并且与欧洲以外的国家在政治上、經济上有許多联系。历史教材既然要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就不能不考虑到这些情况，給它們保持一定的分量。反过来，世界上古史不講希腊和罗馬，中古史不講英国和法国，近代史不着重講欧洲的資产阶級革命和工人运动，或

把这些內容放在无关輕重的地位，而把"中心"放在另一些国家，可能发生更多的缺陷和实际困难。

我們世界历史教材的編写原則，是以苏联教材为藍本，同时結合中国实际情况，对亚洲各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中与中国历史联系比較密切的部分，在可能条件下予以补充。这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具体貫徹这一原則，还需要很多努力，同时要依靠历史科学研究工作的集体努力，才能逐步实現，不可能一蹴而及。这是实际問題，不是根本原則問題的分歧。

世界历史教材不应該主观制定任何"中心"（无論是欧洲的，或是亚洲的）；但是，具体內容有多有少，分量有輕有重，則是不可避免的。不能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同帝国主义国家的伪历史科学相提并論，同样看作"欧洲中心主义"。有些人（如雷海宗）正是以此为借口，混淆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之間的界限，这是一股"暗流"，应該提起警惕。当然，这些别有用心的"批評"与大多数善意的批評之間，也有严格的界限，不能混淆起来，而对于眞正的"欧洲中心主义"，作为資产阶級殘余影响的一种表現形式，也不应該忽視。

此外，还有人主張中外历史混合編写，这在教材体系和編写方法等方面都要具体討論。在鴉片战爭以前，中国与世界其它部分（特别是欧洲）的联系，历史事实的交叉錯綜并不很多，中国历史与世界其它部分历史的关系，并不是全体和部分的关系，而只能是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的关系。社会发展的規律是共同的，但中国有显著的特点，时間上的差別也較大；不仅整个历史的分期問題，就是在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以內，如封建社会（有人借用欧洲的"中世紀"一詞，按其涵义来說，似不尽妥当）本身的分期問題，按照今天的研究結果，都不容易同世界历史中通常的說法統一起来。在教材中，如果以中国史为主，穿插世界史的材料，对于世界史中需要着重講述的有关社会发展史的一般知識，即不容易講清楚；而如果較多地注意世界史的系統性，就会大大影响中国史在教材中的地位，不适合历史教学的要求。所以，就今天的实际情况来說，这个意見是不够成熟的。

（三）关于学习苏联先进經驗和吸收科学研究成果問題：

在历史教材工作中，学习苏联先进經驗是正确的方向，是我們已有的成績和收获的重要来源。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代替資产阶級反动的历史科学，以新教材代替英美資产阶級影响下的旧教材，一破一立，这是有革命意义的創举。苏联的历史科学和历史教学工作，經常是我們学习的典范。世界历史教材，以苏联教材为藍本，无論从接受苏联的先进經驗方面，或从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方面（离开苏联教材重新編写教材的困难），都是正确的必要的措施，不能看作盲目的抄襲搬用。教材要积极地謹愼地吸收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因为教材是在党的領导下，由国家机关制定的向广大青年学生进行教育的工具，不是任何个人的著述；只要这些內容是适当的，适合教学需要和学生的接受能力，就不应該看作抄襲拼湊（个人著述也不能不利用已有的科学材料和結論）。这些都不能一概叫作教条主义。

历史教材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肯定是存在的，应該具体檢查。但更重要的問題是对于資产阶級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著作，缺少深入的批判，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不够鮮明。对于某些經过資产阶級历史学家整理过的历史資料和个別結論，虽然可以适当利用；但是，应該采取革命的批判态度，应該在根本立場、观点上划清界綫，在根本立場、观点上蔑視他們，这是共产主义的风格。我們正是缺乏这种最可宝貴的风格，这样，就会被他們吓住，变成他們的俘虏。对于某些表面上站在馬列主义的旗帜下面，用馬列主义的字句写成的，但沒有完全打破資产阶級的矩矱，甚至在观点上、方法上直接違反馬列主义的著作缺乏嗅覺。相反地，对于眞正站在馬列主义立場上的战斗性的著作，却吹毛求疵，片面指摘某些材料的疏失或个别問題上意見的参差，格格不入，甚至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宗派主义情緒。在教材中，对于一些有爭論的問題，对于不同的意見或互相对立的观点，有时候是兼收并蓄，采取折衷調和的态度，有时候是簡单地回避过去。这样，表面上好象是四平八稳，八面玲瓏，但实际上停止在历史事实的鋪陳罗列，回避矛盾，回避問題。譬如說，前面所提到的，現有历史教材中若干重要的原則性关鍵性的問題，沒有經过独立思考，从理論上，从科学观点上，从基本綫索上，得到更明确更肯定的解决。这是思想斗爭中的怯懦态度，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相信不够的表現，是資产阶級的客观主义态度。这在过去的情形下，由于人力和时間的限制，固然有許多实际困难，但在今天，为了提高教材的政治质量和科学质量，促成历史教材的跃进，就成为直接的現实的任务。这是主要矛盾和主要問題所在。兴无产阶級思想，灭資产阶級思想，是社会主义思想革命的根本任务。这一任务也应該具体体現在

历史教材工作中，发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性和批判精神，建立和巩固工人阶級的思想陣地，保証历史教学內容的純洁性。資产阶級学术的偶象不被打倒，思想的大解放是不可能的。当然，我們的教材不能完全摆脫資产阶級思想的束縛，还保留着資产阶級思想甚至封建思想的殘余影响，还有更深刻的根源，那就是保留在思想意識中的千絲万縷的联系，这是思想改造的任务。

教条主义傾向在教材工作中的最具体表現，是結合教学实际不够，不能深入了解教学的实际需要，广泛吸取教师的实际教学經驗，閉門造車，出門不能合轍。这是今天历史教材的最明显的缺点。教师直接从事教学工作的实踐活动，他們的意見是最可宝貴的。虽然教师的意見是分散的，而且有些不免是片面的，不尽切合实际的，但从唯物主义的实踐观点来看，他們应該是教材工作必須依靠的基本力量，他們的意見应該是改进教材的主要源泉。我們要善于集中他們的意見，要学会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这一点就不再多說了。

还有狹隘經驗主义思想，沾沾自喜于已有的成績，夸大自己的經驗和能力，敝帚自珍，不願意听取和接受別人的批評。这就会妨碍自己更深刻地体会党的方針政策，使自己与群众隔絕起来，使經驗和能力也停滞、衰退起来。也有不願意接受已有的科学成果，只相信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事事要从头做起，成为“一家之言”，这是一种脫离现实的做法。

我們应該更好地学习苏联先进經驗，密切結合中国实际；积极吸收科学研究成果，深入开展对資产阶級学术思想的批判；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独立思考。这样，就可以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縛，实現共产主义的思想大解放。这是历史教材跃进的思想基础。

（四）关于教材和当前政策的关系問題：

历史教材和当前政策的关系，特别是与外交政策和民族政策的关系，是个比較复杂的問題。在历史教材中，包括許多重要的历史事实，有些是較远的，有些是較近的，都可能联系到各个国家之間或国內各兄弟民族之間的关系。这个問題，不能不予以特別的注意。

一般地說，历史事实是客观的，而且是已經过去了的事情，任何人不能改变或主观任意地解釋。对于历史上統治阶級的罪恶行为，无論他們是属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不应該給以粉飾；对于人民反抗統治阶級压迫或异民族侵略的斗爭事迹，也不应該抹杀，問題是要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正确地分析历史材料，抓住历史現象的本質和主流。那就可以認識到，历史上各族人民之間的基本关系是和平的，友好合作的；在这种关系中，他們互相学习，互相帮助，通过广泛的經济交流和文化交流，共同推动着历史前进。統治阶級为了少数統治者集团的利益或狹隘的民族利益发动的战爭，互相殘杀，互相掠夺，以及强加于其它民族或国家的压迫，不能代替各族人民之間的深远的友誼。当然，統治阶級的某些政策或行动，也有客观上适合各族人民的要求，得到他們的支持，并且为他們的友好往来創造了良好条件的，那是另一种情形。总之，只有抓住这一点，才算抓住了正确对待这个問題的鎖鑰。

但是，还要具体考虑，历史教学的目的，不是单純地灌輸历史知識，更重要地是通过这些知識，进行正确的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覺悟。这样，对于历史教材的选擇和配备，就不应該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而要有明确的目的性。除了一般的教学要求以外，凡是有助于发揚国际主义精神，增进我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結和兄弟合作，有助于增进我国与民族独立国家的团結，有助于增进国內各族人民之間的团結，共同建設社会主义，这样的教材应該注意适当地安排；而凡是对这些要求有直接妨害的，就应該摒弃，对于某些沒有分析清楚，沒有肯定的結論的历史材料，应該采取愼重的态度。对于一些过于复杂的問題，需要較高的理解能力才能接受的，在較低年級的教材中可以避免使用。这样的处理办法，对于加强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主要是国际主义教育和各民族团結友誼的教育，对于避免在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方面的不必要的誤解，都是有好处的。

（五）关于精簡教材和提高教材質量問題：

教材的量和質两方面，都应該适当考虑。教材所包含的知識分量，是由教学的需要和学生的接受能力决定的。教材的头緒要清楚，重点要突出，不可过于繁复和一般化，叙述方式和文字要具体生动，不可流于晦澀，这些已經是公認的对教材的要求。有些教材分量过多，脫离实际，教学上有較大困难，或者由于教学計划的改变，减少了教学时間，已經按照具体情况，吸收教师的意見，作了精簡，这是必要的。在精簡教材中間，为了减少較高年級与較低年級教材內容的重复，采取此詳彼略的原則；有些基本的关鍵性的問題，循序漸进，逐步扩大和加深；有些比較重要的不可少的內容，則只在已有的基础上作必要的概括分

析或突出典型事例；有些一般性的內容，在不打乱基本綫索的原則下刪去重复，犧牲一些形式上的系統性和完整性。在政治史、經济史、文化史各方面，也有适当的分工。由于历史科学的特点，在現行的学制下面，历史教材完全避免重复，还有很大困难，我們希望在学制的改革中合理地解决这个問題。

在按照实际教学情况，合理地精簡教材的工作中間，还应該注意到，精簡本身并不是目的，不能为精簡而精簡，教材的多少輕重要安排适当，不是愈少愈好。随着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发展和人民文化知識水平的普遍提高，应該逐步地提高教学質量，在必要的时候，也包括适当地扩大知識分量，因为这两方面是有密切联系的。当然，由于学生的年龄特征，知識的分量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教材的过重过輕都不是正常的現象。在普通教育中，教学的需要是服从生产建設和現实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按照实际教学条件和学生的具体情况，确定知識的广度和深度，在一定意义上，也要把多快好省的要求結合起来，才有促进的意义。"少而精"的提法，是有些片面性和狭隘性的。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要求脫离实际，大量增加教材分量，也不是否認过去合理地精簡教材的必要性，只是要求全面地切合实际地考虑这个問題，而且要从积极的发展的观点上来考虑，才是正确的。

（六）关于补充乡土教材問題：

乡土历史是祖国历史的組成部分，与祖国历史有密切的不可分的联系。乡土历史可以用眞实生动的材料，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識，使他們更具体地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面貌，培养他們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各地改編历史教材，应該包括編写自己的乡土历史教材，不准备自編教材的地区，也应該单独編写这样的教材，作为中央統一編写教材的补充。这些教材，按照具体情况，有些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插入教材中間，或者集中在一般教材后面进行教学；有些可以在一般教材內容的有关部分里面，經过适当的調整，結合进行。这些教材比較具体生动，便于联系实际，使学生感覺亲切，容易領会，可以增加他們对历史課程的学习兴趣，增加教学效果。

乡土历史教材的主要內容，应該是当地人民反抗統治阶級压迫和外来侵略的历史，当地經济、文化发展的历史，以及与此有关的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和文物遺迹等；特別是近代史和現代史中人民革命斗爭的历史事实和革命先烈事迹，应該是乡土教材的重点。在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当地民族的历史发展情况，各族人民历史上的傳統友誼，他們共同反抗統治阶級压迫和外来侵略的革命斗爭历史，以及共同建設社会主义祖国的历史。乡土历史的材料要很好地发掘和整理，并且要經过必要的选擇、分析，才能組織到教材里面。

乡土历史教材必須是眞实的，有教育意义的，其中的历史人物应該是在历史上有过积极作用，可以予以肯定評价的，应該采取宁缺勿濫的原則，不能拼凑。乡土历史不能与整个祖国历史的发展割裂开来，不能把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历史从祖国历史中孤立起来，片面地渲染到不适当的程度。要防止地方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思想反映到历史教材里来。乡土教材的分量也要适当地掌握，乡土教材或少数民族历史教材不宜过多，以至削弱整个祖国历史的地位，过分减弱教材的統一性和共同性。有些同志認为历史教材的地方性比較其它課程，例如生物、化学这样有关各地自然条件的課程，还要大些，这是值得商榷的。

（七）关于教材的穩定性問題：

教材的穩定性，从教学要求来說，是教材应該具备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于編輯工作和出版工作，也可以节省很多人力和物力。在可能条件下，应該尽力爭取做到这一点。但是不能絕对化。由于历史科学的內容与現实政治生活有密切的联系，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历史教材不可能长期停止在一个地方。近代史和現代史更是这样，随着国內外政治形势的变化，有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些修改，如果发生了重大政治事件，还要有較大的修改。不能为了保持教材的穩定性，拒絕这种修改。教材本身也是一个发展进步的过程，它需要吸收新的科学成果（当然是比較成熟的成果，但也有暫时采用一說的情形），需要采取各方

面的意見减少缺点和錯誤，不能長期保留已經发現的缺点和錯誤。至于教学需要的变动就更不必說了。

在今天全民大跃进，历史教材本身也需要跃进的时候，是稳定性服从跃进呢？还是跃进服从稳定性呢？在一定的时間內，这两方面是不好兼顧的。只有經过一定时間的具体努力以后，教材在政治上、科学上都已經打下了比較牢固的基础，同时随着普通教育改革中一系列問題，如学制、普及教育、教学計划等問題的解決，才能逐步达到較大程度的稳定性。在整风初期，有些人对教材的批評很多，但却要求教材的絕对稳定，甚至反对經常吸收新的科学成果，似乎也不要求認眞考慮他的意見来改进教材，只能推翻它，用自由竞爭优胜劣敗的办法来代替它，这是很难理解的。

四 我們今后的努力方向和对历史教师的希望

这里只談一下今后历史教材工作的基本方向。首先是編輯工作者要做到又紅又专，紅透专深，政治領导业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指揮具体历史材料。要認眞地系統地学习馬列主义理論，深刻体会党的教育方針政策，經过整风运动和实际鍛煉，認眞进行思想改造。对于历史科学和教材的态度，是要貫徹厚今薄古的原則，密切联系当前現实的政治生活和生产建設，深入批判資产阶級的学术思想，肃清他們对历史教材的殘余影响，貫徹两条路綫的斗爭。

为了不断改进和提高历史教材質量，要加强調查研究，經常地深入地了解实际教学情况，总結經驗，种"試驗田"。要开展批評与自我批評，改进工作方法。还要在科学研究机关的指导帮助下，加强科学研究工作。科学研究工作要服从教材工作的实际需要，首先是圍繞教材，以教材为中心，确实掌握与教材有关的知識和材料，深入研究教材的主要內容和关鍵性問題，解决教学中的疑难和迫切需要解决的問題。前面所說的調查研究和总結經驗也应該是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要把这两方面密切联系起来，才能避免脫离实际的煩瑣主义和迷失方向的狹隘經驗主义。要反对一知半解，抱殘守缺，滿足于已有的經驗和技术，不愿意独立思考，不愿意积极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懶汉思想；也要反对好高騖远，譁众取寵，单純追逐个人的兴趣，不愿意受教材內容的束縛，不愿意与別人合作，孤立地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做法。"边干边学"，这也是我們的努力方向。

教材工作要依靠历史教师与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密切合作。教师要直接使用教材进行教学工作，与教材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这里着重談一下对历史教师的希望，主要是教师对于教材应該采取的态度。

教材是教学工作的基本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教师要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上認眞地鉆研教材，熟悉和掌握教材，这是做好教学工作的基本保証。从教学工作的需要出发，从对教学工作負責的观点出发，教师对于教材（无論是中央編写的或地方編写的教材），首先应該是爱护的态度。教师要象一个劳动者爱护自己的工具一样地爱护教材，更好地鉆研和掌握教材，这是教学工作的最大利益。教师还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教学經驗，审查教材中的缺点和錯誤，积极帮助改进教材，这也是应有的責任。有些地区的历史教师，直接参加改編教材的工作，这是光荣的任务，应該大胆負責，发揮革新創造的精神，完成这个任务。但也必須指出，这一工作是在党的領导下，根据党的教育方針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原則，有組織地进行的，这与某些人所提倡的資本主义自由竞爭的办法有根本的区别。

在全国人民社会主义大进軍的浪潮中，历史教材必須跃进，也可以跃进。依靠党的領导，依靠广大教师群众和各方面的力量，胜利是不会很远的。但是，也不能把教材工作看作一帆风順的过程。在教材工作中还有两条路綫的斗爭，还有很多具体困难。必須坚持工人阶級的立場，反对資产阶級自由主义的立場，坚决貫徹党的教育方針，坚决貫徹党的群众路綫，才能克服困难，最大限度地减少錯誤。我們有战无不胜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武器，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就是胜利的保証。



理论学习



学习馬克思著“法兰西内战”

楊 甫

“法兰西内战”一书，原是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总会——第一国际，給协会欧洲各国全体会員写的关于1871年法兰西内战的宣言。这个宣言写于巴黎公社失敗后两天，卽1871年5月30日。在这个宣言里面，馬克思精辟地分析了德国、尤其是法国的阶級关系，由政治斗爭看出普法战爭的不可避免性；还分析了法国工人阶級的发展，巴黎公社的誕生、性质和历史意义。馬克思一方面以极大的憤怒揭发了和控訴了法国資产阶級对巴黎无产阶級进行野蛮殘杀的罪行；另一方面又以无比的热情来歌頌偉大的巴黎无产阶級的革命的英雄事业和巴黎公社的不朽的历史业績；它展示了世界无产阶級解放斗爭的曙光！

巴黎公社的誕生，也就是法兰西内战的开始；而法兰西内战的发生又不是孤立的現象，它是普法战爭的繼續。所以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再版的时候，就把国际工人协会总会就普法战爭問題所发表的两篇宣言，放在它的前面，并写了一个“导言”。这样更能使我們对“法兰西内战”一书有全面的理解。

至于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导言”，除了說明上述三个重要的历史文献的关系之外，恩格斯还以事过二十年的回顧（1891年3月18日），对“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叙述，做了一些鲜明而精辟的补充。从此，“法兰西内战”一书，是由上述三个“宣言”和一个“导言”組成的①。

馬克思著的“法兰西内战”和列宁著的“无产阶級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和“国家与革命”基本上一样，都是闡述馬克思主义中最重要的一个問題，卽无产阶級革命和无产阶級专政問題。二者所不同的就在于：前者是闡明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法国无产阶級革命和无产阶級专政問題；而后者則是闡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无产阶級革命和无产阶級专政問題。后者是前者的发展。因此，“法兰西内战”虽然是馬克思写于八十八年前，但是在今天，对于各国无产阶級的革命斗爭，对于社会主义陣营各国巩固无产阶級专政的国家政权，特别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現阶段，具有重大的現实的指导意义。

对于“法兰西内战”这本书的內容，我們拟分为下面几个主要問題加以研究：一、普法战爭的性質和法德工人阶級的任务；二、阶級斗爭和民族利益的关系；三、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級专政；四、巴黎公社的偉大的历史意义。

一 普法战爭的性質和法德工人阶級的任务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是世界历史的轉折点。1870年——1871年的普法战爭和巴黎公社，揭开了人类历史新的一頁：无产阶級革命兴起了，資本主义制度开始动搖了。

在当时，无产阶級和資产阶級的斗爭是以法国为中心。

路易·波拿巴（卽拿破崙第三）的第二帝国，在法国差不多統治了二十年（1851年—1870年）。这是一个动蕩不安的时期。这个时期法国政治形势的基本

---

① 本文根据的版本是“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中文版。

特点，正如恩格斯所說的，是“如果說无产阶級还不能管理法国，那末資产阶級却是已經不能管理法国了”。路易·波拿巴就是利用法国当时尖銳的阶級矛盾和阶級斗爭而上台的。第一，法国資产阶級对于在1848年革命中无产阶級显露出来的力量，感到恐惧和威胁，他們指望着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出来援救他們；第二，法国无产阶級在1848年6月事变中，虽然显出了革命的威力，而且提出了“社会共和国”的口号，但又象馬克思所說的，这种口号只是“作为一个詞句，作为一个預言出現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記”，“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中文版，第306頁）。即是說，在当时，无产阶級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第三，資产阶級內部也存在着各种矛盾和斗爭。当时的法国資产阶級大部分还是保皇主义的，并且又分裂为几个皇朝政党和一个共和派。它們之間存在着明爭暗斗和爭权夺利的冲突。上述这些条件，便利于路易·波拿巴的阴謀野心，便利于掌握住国家政权的一切命脈——軍队、警察和行政机关。他終于1851年12月2日掀起了政变：解散了資产阶級的国民議会，夺取了政权。就这样开始了第二帝国的統治。但是馬克思并不把这种情况看作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而是証明法国的阶級斗爭如何造出了那种情势，使得一个凡庸的而且不象样的人物，可能扮演一个英雄的角色。这种情况的出現，是法国阶級斗爭的必然結果。所以馬克思很正确地說：“事实上，帝国是在資产阶級已經失去治国能力而工人阶級又尙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統治形式。”

由于这个緣故，路易·波拿巴就裝模作样，表示出他是超出乎阶級斗爭的“中間阶层”，他“一方面借口說要保护資产阶級反对工人，另一方面又借口說要保护工人反对資产阶級”。其实，路易·波拿巴政权，并不是什么“中間阶层”，而是地地道道的法国大金融家和大工业家的代表。

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第二帝国面临着两个主要問題：一是国內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級，对于第二帝国政府在国內建立警察制度，对于工人阶級受着残酷的剝削，对于波拿巴皇朝的穷奢极欲和荒淫无度，表示巨大的不滿和憤怒；另一个是德国再統一的形势，使法国深感不安。因此，第二帝国政府考虑到：对普魯士发动战爭是必要的，而且是会一举两得的。

第二帝国是号召崇尙法兰西沙文主义、扩張領土的。它迫切要求归还1814年所失去的第一帝国的疆土，或者至少是归还第一共和国（即1789年法国大革命胜利所建立的共和国）的疆土。而最能激起法兰西沙文主义的情緒的，就是占領德属萊茵河左岸地区。这是第二帝国对普战爭的根据之一。另方面，在1866年普奥战爭由奥国失敗而結束后，德国再統一的形势已經形成。而这又是对法国最不利的。德国再統一問題是德国資产阶級革命的基本問題（本来这是一个老問題，由于1848年革命，无产阶級露出了头角，資产阶級沒有完成这个任务）。沒有一个統一的民族国家，德国資本主义就不可能获得广泛的发展。但是法国所希望的是一个分散的不統一的德国，而不是一个統一的德国。因为德国形成了一个統一的民族国家，法国就遇到一个强大的竞爭者，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領导地位就会发生动搖。因此，对普发动战爭就成为急迫的問題了。

法兰西帝国对普魯士发动战爭，旣能打击新起的竞爭者，又能吸引国內人民的“危險思想”。拿破崙皇朝幻想子孙世代承襲其統治地位，就尽力轉移人民的不滿情緒。当时的人民革命思想，甚至已使皇后欧貞尼也急切地喊着：“如果沒有战爭，吾儿将不能做皇帝了！”

在这种形势下，第二帝国于1870年7月19日对普魯士宣战了。

普法战爭的性质，馬克思在一开始就在第一国际的宣言中很明确地指出：在法国方面是非正义的侵略战爭，因为它阻碍着德国的統一，反对德国成为統一的民族国家；而在德国方面则是防御性的战爭，因为它将促进德国达到統一的目的，不管它是用什么手段达到这个目的。第一国际的这个指示，在法德工人中間获得广泛的拥护和傳播。

因此，法国工人阶級是堅决反对这个战爭的。当时第一国际在法国的一个支部发出的宣言中就这样写道：“这次战爭是正义的嗎？不！这次战爭是民族的嗎？不！这完全是皇朝的战爭。为了正义，为了民主，为了法国的眞正利益，我們完全和堅决贊同国际对于战爭的抗議。”

第一国际对德国工人阶級固然指出了战爭在德国方面是防衛的，但同时又警告他們說：“如果德国工人阶級竟容許这一战爭失去自己的純粹防御性质而蛻化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爭，那末无論胜利或失敗，都是同样要产生危害影响的。”所以馬克思要求德国工人阶級認識：（1）把德国民族利益和普魯士皇朝的利益明确地区分开来；（2）巴黎一被共和主义的非

民族侵略主义的政府掌握政权之后，便立即应当講和；（3）堅决地主張德国工人和法国工人的团結。这即是說，德法的工人阶級既反对拿破崙第三的侵略政策，也反对俾士麦的侵略政策。不論哪一方的侵略战爭，都是德法工人阶級所要共同反对的。这就是德法工人阶級对普法战爭的基本立場。

在战爭中，德法工人阶級表現出了自己的国际主义精神。第一国际的巴黎会員发出号召："法国、德国、西班牙的工人們！让我們把我們的呼声联合成为共同反对战爭的怒吼吧！……为爭夺霸权而起的战爭，或为維护某一皇朝利益而起的战爭，在工人看来只能是犯罪的胡行。"而第一国际的柏林支部也立即回答巴黎工人的号召說："我們全心全意地拥护你們的抗議……我們庄严地宣誓：无論是軍号的召喚或大炮的轟鳴，无論是胜利或失敗，都不能使我們离开我們全世界工人团結的共同事业。"这也是全世界工人阶級的共同的声音和語言。

从上述第一国际对于普法战爭的态度，我們就看出一些基本原則：第一，战爭的性質不都是一样的，有正义的，进步的，自衛的战爭，也有非正义的，反动的，侵略的战爭；第二，战爭性質由于条件不同是会轉化的，侵略的战爭可能轉化为防衛的战爭，而防衛的战爭也可能轉化为侵略的战爭；第三，工人阶級不应籠統地反对一切战爭，应該反对的只是侵略的，非正义的战爭。这些基本原則就是馬克思主义对战爭問題的基本原則。

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原則，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中，被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遺忘了和背弃了。他們为了資产阶級利益，提出了"保衛祖国"的口号，来拥护和支持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爭，而反对无产阶級革命和无产阶級专政。只有第二国际左派——俄国布尔什維克党堅持了和发展了馬克思的这些基本原則和原理。列宁在战爭中正确地分析了战爭的帝国主义侵略性質，而又正确地提出：工人阶級要反对这种侵略战爭，要在战爭中使本国政府失敗，要"变帝国主义战爭为国內革命战爭"的方針。正是由于这个正确的指导，俄国工人阶級和劳动人民把侵略战爭变为无产阶級的革命战爭——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沙皇地主資产阶級的統治，建立了苏維埃政权（无产阶級专政）。

馬克思的这些基本思想和原則，毛澤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爭和民族解放战爭中，也光輝地运用和发展了。毛澤东同志的"中国革命战爭的战略問題"、"論持久战"等著作，就是充分地表現出这种光輝运用和发揮了馬克思关于战爭問題的基本思想的典范。

二　阶級斗爭和民族利益的关系

伴随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胜利后的資本主义的发展，法国无产阶級也就逐漸地壯大起来了。这个阶級在1830年的时候，远比法国資产阶級所設想的为多，就已經形成为一种独立性的政治力量了。在此之后的五十年中，巴黎每次所发生的革命，都不能不帶着无产阶級的性質。例如1848年6月，1849年6月，1850年7月，都显露出法国无产阶級的政治覚悟和斗爭力量。到了六十年代，法国无产阶級已有了第一国际的支部。由于无产阶級有了自己的政党組織，因而这时候，无产阶級的組織性和斗爭性，也就不同了。在普法战爭中，法国无产阶級所表現出了的它的偉大力量和英勇气概，使威廉帝国感到威胁的不是法国資产阶級的政府和軍队，而是法国的无产阶級了。

在1870年年底，当普法战爭发展到严重关头，当第二帝国軍队一部分被圍于麦次，一部分被德国人俘虏的时候，当普魯士人敲着巴黎大門的时候，第二帝国象紙房一样倒塌下来了，而巴黎的无产阶級则宣布成立共和国。虽然这个共和国立即就被資产阶級的冒險家們所占据，但在工人阶級的压力下，他們行使这个政权只能是为了国防的目的。在这緊急的关头，巴黎无产阶級做了巨大的努力，来反对法国資产阶級的无耻的投降屈辱的勾当，以保衛法国人民的利益和法国民族的尊严。第一，巴黎人民，首先是巴黎的无产阶級都編成了国民衛軍，并且都拥有武裝（国民衛軍中虽然也有資产阶級的武裝和小資产阶級的武裝，但工人武裝則占絕大多数）；第二，当1871年1月28日，資产阶級政府投降了普魯士人，炮台、槍炮交出了，但是由于巴黎工人和国民衛軍保存了自己的武裝、堅持了斗爭的結果，普魯士人不敢进入巴黎，他們只能挤在巴黎城的一个小角落里；第三，巴黎工人不讓普魯士人越过那个小角落的界限，侵略者处于巴黎工人武裝的包圍之中。这种情况說明了誰在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威风，誰眞正維护了法国人民的利益和民族利益。关于巴黎工人这些偉大事迹，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紀念时曾以驕傲而生动的笔調这样描写着："巴黎的工人們竟使一支战胜了帝国一切軍团的軍队对他們表示这样的尊敬。跑到这里来向革命策源地进行报复的普魯士容克們，竟不得不正是在这个武裝的革命面前恭恭敬敬地停立下来，向它敬礼！"

那么，法国的資产阶級呢？他們对于外国侵略者——普魯士人，是那样的軟弱无能；而对于巴黎工人阶級却是那样的仇恨和狂暴殘忍！

法国資产阶級最害怕的是什么呢？不是普魯士人，外国侵略者，而是法国人民和工人阶級，特别是工人的武裝。在法国資产阶級看来，这比起普魯士人来危險千百倍。所以，恩格斯說："掌握了国家政柄的資产者認为第一条金科玉律就是解除工人武裝"，"当政的資产阶級共和派一感到了他們脚底的根基已經相当稳固的时候，他們認为第一件事便是要解除工人的武裝"。是呀！資产阶級把解除工人武裝看作"第一件事"和"金科玉律"呀！这些話对于后来的无产阶級革命和无产阶級专政难道不是金玉之言嗎？

法国資产阶級不仅自己用全力来反对工人阶級，而且收集一切反动力量，甚至昨天还是自己的敌手，联合起来反对工人阶級。1871年3月18日，以这个資产阶級的腐朽和罪惡的化身的梯也尔为首的法国政府，开始向工人阶級下手了。它派了軍队去繳国民衛軍的槍械，这些槍支和大炮是巴黎工人自己捐錢买来的。自然，反动政府这一企图沒有成功，全巴黎的工人和人民起来反抗和自衛了。

3月18日产生了巴黎公社，它标志着法兰西內战的开始。在这时候，普法战爭在法国資产阶級的投降下結束了，而法国的資产阶級和无产阶級武裝斗爭开始了。

3月18日产生的巴黎公社，它体現着純粹无产阶級的性質。这一阶級性質，在普法战爭中被反抗外敌侵犯掩盖着，而在資产阶級和无产阶級的內战中暴露出来了。

1870年9月4日成立的共和国政府，巴黎工人当时所以还承認它，是为了使它成为"国防"政府。可是現在，它要防御的不是普魯士人，而是法国工人阶級了。这个政府已不是什么"国防政府"，而是卖国政府了。法国資产阶級把它自私自利的阶級利益放在民族利益之上，宁可說是为了前者而牺牲后者。这是一切資产阶級的特点。关于这个問題，馬克思做了詳尽和精辟的分析。他說："当时弄得措手不及的巴黎，由于工人們的眞正首領还被关在波拿巴的监獄里，而普魯士人又已迅速逼近了，所以只得讓这些人掌握政权，不过附帶有一个定要执行的条件，就是他們行使这个政权只能是为了国防的目的。当时为要保衛巴黎，就一定要武裝巴黎工人，将他們組成为眞正的軍事力量，使他們在实际战爭中学会軍事艺术。可是，武裝巴黎就无异是武裝革命。巴黎战胜普魯士侵略者就无异是法国工人战胜法国資本家及其国家寄生虫。国防政府被迫在民族义务与阶級利益二中擇一的时候，一分鈡也沒有犹豫——它变成卖国政府了。"資产阶級为了自己的阶級利益而抛掉民族义务，是"一分鈡也不犹豫"的啊！

法国資产阶級在无产阶級取得了統治权的面前，昨天的敌人——普魯士人，今天变成并肩作战的朋友了。他們互相勾結来反对巴黎无产阶級。"那些曾咒駡普軍炮击巴黎是犯瀆圣罪的人們，此时自己已在炮击巴黎了。"他們乞求普魯士政府把它俘虏的法国士兵送回来替他們夺取巴黎，由于这些軍队的逐漸开到，便使凡尔賽的軍事力量在二月間取得了决定的优势。而握有北部和东部炮台的普魯士人，讓凡尔賽軍队，通过城市北部一个按照停战协定条件禁止通行的地区，以便在一条广闊的战綫上向巴黎公社实行进攻。在这时候，凡尔賽人和普魯士人之間沒有什么对立的敌意了，他們共同的敌人是巴黎无产阶級和巴黎公社。他們之間民族界綫沒有了，他們共同的目的，是消灭巴黎公社。关于这个問題，馬克思十分中肯地写道："在現代最悽慘的战爭終結后，战胜的軍队和战敗的軍队联合起来共同打击无产阶級。这个前所未聞的事件，并不是如俾斯麦所想象的那样証明正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社会遭到了最后的失敗，不，它証明資产阶級旧社会已經完全腐朽了。旧世界所尙能作出的至高英雄偉績不过是民族战爭，并且这种战爭在目前原来是政府玩弄的十足欺騙勾当；这种欺騙勾当的唯一目的原来是要推延阶級斗爭，一待阶級斗爭燃成国內战爭烈火时，欺騙勾当就要根本垮台。阶級的統治已經不能拿民族的外衣来掩盖了；在反对无产阶級时，各个民族政府是一致的。"

法兰西內战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它給我們說明了一些什么？

它說明了，阶級利益高于一切。阶級斗爭是不可調和的。資产阶級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可以利用工人阶級；但是一当工人阶級站起来的时候，它对工人阶級的凶恶面目就立即暴露出来了。

它說明了，資产阶級往往以全民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代表自居；但是一当人民群众触动它的統治地位时，它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这是一切資产阶級的天性。

它說明了，各个国家的資产阶級，为了自私自利的打算，而往往进行互相殘杀；但是一旦无論哪一个

国家的无产阶級点起革命之火，他們就会立即化敌为友，联合起来，共同向无产阶級进攻。

它說明了，只有无产阶級才是眞正代表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它清楚地知道：沒有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也就不可能有阶級的解放。无产阶級是反对資产阶級的民族主义的，它是国际主义者，但是眞正代表民族利益的只有无产阶級。

这就是阶級斗爭的客观規律。这些規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法兰西內战”一书中，做了杰出的分析和闡明。

馬克思闡明的这些規律，在中国人民百年来的革命斗爭中，也是能够找到說明的。

远的不說，单就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来看看。在抗日战爭时期，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們祖国遭到亡国灭种危險的时候，全国人民，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領导下的工农大众的抗日爱国运动，磅礴于全国。但是，代表买办資产阶級和封建地主阶級的蔣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友好”政策和“不抵抗”政策，而对人民的救亡爱国运动，則采取高压政策。他們的原則是“投降有功，爱国有罪”。为了維持国民党的反动統治，它害怕的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而是中国人民。即至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領了我国的半壁河山，亿万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竟躲到峨嵋山上；中国共产党和它領导的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根据地人民，坚持了抗日战爭，并且成为抗日战爭的主力。这时，国民党政府不是抗日，而是“坐山观虎斗”；不但是“坐山观虎斗”，而且是或明或暗地勾結日寇汉奸来向抗日根据地进攻，幻想借助外敌力量来消灭共产党和抗日力量，以維持它对中国人民的血腥統治。以蔣介石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买办資产阶級的“勇于对內，而怯于对外”的本色，难道不就是馬克思在“法兰西內战”中所描写的法国資产阶級的天性么？从中国抗日战爭中的阶級斗爭看来，中国工人阶級及其政党共产党不仅是阶級的战士，而且也是民族革命的战士。这不也就是馬克思在“法兰西內战”中所指出的法国工人阶級的特点嗎？

阶級斗爭和民族利益的关系，只有馬克思主义才能做正确的解釋。对于这个問題，誰沒有馬克思主义的認識，誰就会犯机会主义的錯誤。

三　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級革命和无产阶級专政的第一次尝試

巴黎公社的誕生，不但震动了整个法国，而且震动了整个資本主义世界。对資产阶級来說，它是个怪物；对无产阶級来說，也是个新事物。馬克思曾經这样写道：“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为‘公社万岁！’的雷鳴似的喊声驚醒了。公社，这个使得資产阶級的头脑怎么也猜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巴黎公社既不是什么天灾，也不是什么怪物，而是无产阶級革命的产物——无产阶級专政。对于巴黎公社的性质，馬克思明确地指出：“公社的眞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級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級对占有者阶級进行斗爭的結果，是終究发現了的可以使劳动在經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恩格斯在为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紀念而写的“导言”中，对那些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們也說的十分明白。他說：“近来，社会民主主义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級专政就嚇得大喊救命。諸君，你們想知道无产阶級专政是什么嗎？請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級专政。”

巴黎公社是世界无产阶級革命和无产阶級专政的第一次尝試。它是无产阶級的翻天复地的革命事业。如果說1848年2月革命，巴黎无产阶級曾經提出的“社会共和国”是模糊的东西，那么巴黎公社就是明确的无产阶級专政。

很显然，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級专政的国家形式，是能使无产阶級从經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权形式。公社的經驗，使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說进一步地发展了。

像列宁曾經指出的，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說，即无产阶級专政的学說，不是一下子形成达到完善的，而是通过各国无产阶級不断的革命斗爭的实踐經驗，而在历史上更加具体、在科学上日益确切起来的。

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說，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上就奠定了它的基础，但是在“共产党宣言”里面，对国家問題还提得抽象，还是在一般的概念中表現出来，例如“国家就是組成为統治阶級的无产阶級”。即是說，无产阶級如果不先获得政权，不得到政治的統治地位，就不能推翻資本主义制度。但是在“共产党宣言”中，还未能具体地、明确地、肯定地得出結論說：过去一切革命都使国家机器臻于完善，而現在我們則必須把它破坏和打碎。正如列宁恰如其分地說的，“共产党宣言”只指示出任务，而沒有指示出完成任务的方法。这个問題馬克思在1852年才在“路易·波拿巴政变記”一书中，很明确地、肯定地提出来。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給留·庫格曼論巴黎公社的信中这样写道：“如果你讀到我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記’一书最后一章，那你就会看到，我認

为法国革命下一次的尝試，不应如迄今以前一样把官僚軍事机器从甲手轉到乙手，而是要把它毁坏，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个眞正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莫斯科中文版，第463頁）这显然是比“共产党宣言”所提的进了一步了。虽然这里只解决了一个問題——必須打碎資产阶級的国家机器，但还沒有解决下面这样一个問題，即以什么形式的国家政权来代替已被打碎了的国家政权。这个問題到巴黎公社时才获得了解决。即是說，应当以巴黎公社形式的无产阶級专政来代替已被打碎了的資产阶級国家政权。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也說到：“公社是无产阶級革命打碎資产阶級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試，并且是‘終于发現了的’政治形式，这个政治形式可以而且应当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見“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08頁）

巴黎公社打碎了法国資产阶級的国家机器，并把无产阶級专政的新的国家形式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經驗，不但給世界无产阶級革命以明确的方向，而且把馬克思关于国家的学說向前推进了一步。

无产阶級取得政权之后，必須坚决地、徹底地鎮压資产阶級的反抗。当資产阶級被推翻了以后，它不但不会沒有抵抗，而且是会十分瘋狂地、千方百計地反抗。当它快将死亡的时候，就会象一个落水狗紧紧地抓住一根草一样，紧紧地抓住国家政权。无产阶級对“落水狗”不应存有絲毫“慈仁”之心。巴黎公社打碎了資产阶級的国家机器，但可惜沒有干得徹底。这是一个严重的經驗教訓。

和在“法兰西內战”中所指出的一样，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給留·庫格曼的信中就指出巴黎公社的两个主要錯誤。第一，他說巴黎人的壮举，在历史上，还从来沒有过象这样偉大的例子。如果他們归于失敗，那只是由于他們的“寬大”，由于“講良心”而丧失了时机，沒有向凡尔賽进軍，沒有坚决地鎮压資产阶級的反抗。“第二个錯誤就是中央委員会（国民衛軍的指揮机关——笔者注）过早地卸脫自己的职权而让交給公社。这又是由于弄到多疑地步的‘良心’所致！”是的，公社內部的成份是很复杂的，在公社中占絕大多数的是布朗基派，而第一国际的成員又以普魯东派占多数，眞正馬克思主义者是很少的。这样就需要把权力集中于軍政机构之手。但巴黎公社沒有这样做。列宁曾經認为这两个錯誤都是在于缺乏进攻，缺乏意識和决心去打破官僚主义的軍国主义的国家机器和資产阶級的权力。所以，巴黎公社的主要經驗就是馬克思事后所总結的：“工人阶級不能簡单地握取現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是，巴黎公社后四十多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巴黎公社后七十多年的欧亚許多国家的革命，尤其是偉大的中国革命，对这一工作就做的很不錯了。这些革命都徹底地打碎了資产阶級的国家机器，并且把苏維埃形式的或人民民主形式的无产阶級专政的国家政权来代替已被打碎了的資产阶級的国家政权。

同时，由于現代新的历史条件，比較巴黎公社形式更臻完善的，就是苏維埃的和人民民主形式的无产阶級专政。

国家政权問題是革命的根本問題。无产阶級专政是馬克思主义的主要点。而坚决地、徹底地打碎資产阶級的国家机器，并以无产阶級专政来代替它这一原則，又是国家政权問題——无产阶級专政問題中最重要的問題。这一問題未能获得解决，无产阶級就不能取得政权，取得政权后又不能巩固它。巴黎公社的經驗証明了这点，今天胜利了的社会主义陣营各国的經驗也証明了这点。

对于这个重要的眞理，和旧修正主义者同样，現代的修正主义者，也做了这样或那样的汚蔑和曲解。現代的修正主义者，在目前新的国际形势下，在无产阶級专政在欧亚許多国家实現、社会主义各国形成了不可动搖的陣营、社会主义力量已比帝国主义力量占了优势、东风压倒了西风的形势下，对馬克思主义的曲解，尤其是对无产阶級专政理論的曲解，显得更加瘋狂和恶毒。他們說馬克思主义已經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发展，已經“过时”了；他們粉飾資本主义制度，說資本主义社会本质发生变化的时候已經到来，工人阶級現在已有可能直接通过生产过程成为領导的政治力量而最后取得政权；他們把国家資本主义理想化，認为在資产阶級政权下，国家資本主义可以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他們把資产阶級国家看作是旣限制資产阶級也限制无产阶級的、独立于社会之上的“超阶級”的东西；但是他們却又認为无产阶級国家机关、无产阶級专政是社会发展的障碍，国家存在就不会有民主，要自由民主，要消灭官僚主义，就必須立即实現“国家消亡”。总之，这些观点实质上就是取消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級斗爭和国家政权的理論，反对无产阶級革命和无产阶級专政，而为日趋沒落的資本主义制度辯护。所以修正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一种最危险的思潮。毛澤东同志对現代修正主义的阶級基础、思想本质及其危險性作了如下全面的分析．“我們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須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傾机会主义，是一种資产

阶級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义者，右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掛着馬克思主义，他們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們所攻击的正是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們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証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領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資本主义制度，他們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級进行斗爭，包括思想方面的斗爭。而在这个斗爭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懂得了这个重要的眞理，我們就認識了在这次整风中資产阶級右派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进行瘋狂的进攻，就决不是偶然的。

其次，巴黎公社的国家政权和資产阶級的国家政权是根本不同的。它是眞正民主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它的特点是能使工人阶級及一切劳动人民有充分的参与、管理和监督国家政权的机会，因而这个政权不会变成为脫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机关；相反的，它却能成为眞正代表人民利益和为人民服务的政权。

巴黎公社是个新形式的国家，它的政治制度的特点和胜于資产阶級的議会制的优点，就在于：

第一，"公社应当不是国会式的，而是同时兼任立法和行政的工作团体"。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統一，旣表現了人民內部的团結一致，又表現了人民民主权力的强大。它旣有立法权，也有监督行政权。它旣制訂法律，又要执行法律。它旣討論政策，又能执行政策。所以它不是清議和空談的机关，而是"工作团体"。公社的这一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則，为后来的苏維埃政权和人民民主政权的政治制度所繼續、发展和完善。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的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不但有其他国家机关所沒有的立法权（制定法律权）；而且国家其他机关（如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总檢察長，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都由它产生、监督，也可以由它罢免。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国家的立法权和行政权統一起来，实現国家权力的最高集中。作为政府机关的国务院，不是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立的，而是它的执行机关。二者之間是协調一致的，沒有什么互相傾軋互相矛盾的。

資产阶級总是标榜資本主义国家的議会为代表"全民"的民意机关，議会議員为"全民"的代表，其实它只是代表資产阶級尤其是壟断資本利益的机关。选民是不能监督他們的，国家最高的决策者，是少数壟断資本家，而議会只是裝作門面的空談的欺騙人民的机关。

資产阶級还标榜着"三权分立"、"互相平衡和互相制約"，好象誰也不能独断专行，好象立法、司法、行政三权是平等对待互不矛盾的；而实际上却是行政权高于一切，实行极少数人的官僚統治。議会所通过的法律和决議，行政机关可以"退回复議"。所謂具有立法权力的立法議会，只是冠冕堂皇的空招牌而已。列宁对資产阶級的議会制的本質这样指出："每数年一次解决統治阶級中什么人应当在国会中鎭压并压迫人民——这就是資产阶級国会制底眞正本質，不仅在国会制的君主立宪国內是这样，即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內也是这样。"（"国家与革命"，"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99頁）

第二，"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按普选制选出的城市代表所組成。这些代表应該負責并且随时可以更換。其中大多数自然是工人或已被公認的工人阶級代表"。公社的这种普选制，具有鮮明的阶級性質，它是眞正工人阶級和劳动人民获得解放和民主权利的表現。这决不是象叛徒考茨基所曲解的那样，說什么公社的普选制是巴黎工人阶級和資产阶級完全平等的共同进行的"全民投票"。这完全是胡說。考茨基企图把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級专政的性質掩盖起来。

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应当对选举他的人民負責，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如果代表不称职的話，人民有撤消他代表資格之权。代表們只是劳动人民的勤务員，而不是騎在人民头上的官僚政客。馬克思对于这点，說得十分清楚："普选权不是要每三年或六年一次解决統治阶級中哪一个人应該在国会里代表人民和鎭压人民，而是要为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为的是使人民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計員，正好似个人选举权要为这种目的服务于任何一个雇主一样。"显然，公社的普选制是为了找到为人民服务的"社会的負責公仆"，而不是找到凌駕于人民之上的官僚政客。

和巴黎公社的政治制度一样，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也是直接来自人民的。因为人民代表大会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要对人民負責，人民对不称职的違法乱紀的代表有更換权。人民群众眞正能以主人翁的地位，来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管理国家事务。这样就能使政府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政府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人民有了更充分的民主权利，国

家就能有更集中的权力。它既不象資产阶級那样的少数人的专横独断，也不象无政府主义者那样不要任何集中的权力，而是眞正的民主集中制的政权。

在資本主义国家，不管它們也标榜着“普选制”、“普选代表权”等等，而实質上，广大的劳动人民是沒有任何民主权利的，眞正的統治者是資产阶級特別是少数的壟断資本集团。資产阶級采用各种各样的限制办法(如財产数量、教育程度、居住期限，以至性別、膚色的限制），甚至用警察和特务的办法，来限制和剝夺了人民的选举权。所謂“普选权”只是一种騙局。

第三，“公社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废除常备軍而代之以武裝人民”。以人民武裝来代替雇佣軍队和警察，是无产阶級专政的国家政权区别于資产阶級国家政权的基本标志之一。无产阶級专政，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这个国家政权所应有的武裝力量，就应該是人民的武裝，而不是雇佣的武裝。工人阶級和劳动人民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鎮压資产阶級的反抗，也不是只靠少数的軍队和警察，而是依靠全体人民群众的力量。这样就使軍队和人民成为血肉不可分离的統一的东西，而不是对立的东西。列宁对于人民武裝的必要性和意义作了极其深刻的闡述，他說：“鎮压資产阶級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这对于公社曾特別必要，而公社所以失敗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沒有充分坚决地来这样作。但是这里，实行鎮压的机关，已是居民大多数，而不是少数，如象向来无論在奴隶制下，无論在农奴制下，亦无論在雇佣奴隶制下所有的情形那样。而既然是由人民大多数自己去鎮压自己的那些压迫者，那末实行鎮压的‘特別力量’便已經不需要了！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就开始消亡。人民大多数能不要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底特殊机关（特权官吏，常备軍底长官），由自己来直接执行这些事情，而国家政权职能底执行本身愈是全民化，则这个国家政权底需要性也就愈見减少。”（“国家与革命”，“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95頁）可見，軍队的性質是决定于国家政权性質的。資产阶級的国家政权是資产阶級压迫无产阶級的工具，它的軍队和人民是对立的。一当人民取得了政权，人民所需要的軍队就自然而然地是人民自己武裝起来的軍队。

第四，“从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所有一切公务人員，都只应領得相当于工人工資的薪水。高級国家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和办公費，都随着这些官职的消灭而消灭了”。废除国家公务人員的高薪和官吏特权，也是无产阶級专政的国家政权区别于資产阶級国家的貪污腐敗的官僚寄生机构的基本特点之一。这也是国家工作人員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标志。列宁对巴黎公社这一原則給予特別的重視，他說，馬克思指出过的公社所采取的方法：取消支給国家工作人員一切办公費和所有金錢上的特权，把国家工作人員的薪水降低到等于“工人工資”的水平，这是在政治上的一种重要轉变，即从压迫者的民主制轉变为被压迫者的民主制，从資产阶級民主制轉变为无产阶級民主制，从少数人的民主制轉变为多数人的民主制，从用以鎮压劳动人民的“特別力量”的資产阶級国家轉变为由工农大众“共同力量”来鎮压資产阶級的无产阶級的国家。按照列宁的看法，这种轉变，还会把工人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結合起来，“成为由資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公社的这一原則，为現在社会主义陣营各国所坚持、发展和完善了。

从上面几点看来，巴黎公社政权的若干政策和措施，已在基本上为現在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則奠定了基础。这种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已为坚如磐石的和日益繁荣的苏維埃政权和人民民主政权所充分地証明了。这种优越性是自古以来历代政治制度所沒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

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它的优越性，不等于說，剝削阶級就心悅誠服了，甘願自己退出历史舞台了；也不等于說，无产阶級不經过艰苦的阶級斗爭就可以輕易地取得政权，或者可以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了；更不等于說，現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完全平安无事，可以高枕无憂了。不是的，現在資产阶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反对馬克思主义最中心的問題之一，仍然是无产阶級专政問題。一切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汚蔑和对馬克思主义进行曲解的主要目标之一，也仍然是无产阶級专政問題。

我国資产阶級右派也不例外。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取得基本胜利的时候，当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日益巩固的时候，当剝削阶級和剝削制度快要消灭的时候，中国人民的一切敌人——帝国主义、地主富农的殘余势力和資产阶級右派是不甘心于失敗和死亡的。他們只要有一分力量，就要做一分的挣扎；他們只要有一点儿机会，就要拼命地斗爭。这不是什么奇怪的現象，而是他們的阶級本能。

資产阶級右派向党向人民瘋狂地进攻的矛头之一是指向着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級专政）制度。他們汚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人民的天下，而是“党天下”；他們还要用資产阶級的“两院制”和“政治設計院”来代替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此等等。这些攻击和汚蔑的本質，就是企图推翻我国无产阶級专政的政治制度，使資本主义复辟。

无产阶級为取得政权而斗爭，是一件翻天复地的革命壯举，也是要抱有艰苦奋斗和牺牲精神的英勇行为。資产阶級为保持它的統治地位，是要竭尽一切力量，采用所有凶恶殘暴的手段来对付无产阶級的，当它已被推翻的时候，更是会这样的。巴黎公社由于"講良心"，对反革命鎮压得不够，而敌人却以血海来淹沒它。五月的最后几天，巴黎街道上的堡壘，在敌人优势压力下陷落了，巴黎的无产阶級和正直的巴黎人，遭到空前未有的大屠杀。許多公社的优秀分子和工人被槍杀了。許多的人被活埋了。許多被打伤的人和被打死的人埋在一起；有的人埋的很淺，他們的手还露在地面上，他們痛苦的呻吟，在靜靜的深夜还能听得見。資产阶級的劊子手們杀人的野蛮方法，也是自古稀有的。一个凡尔賽的將軍——加里福，竟把被捕到的人排成队伍，他跟着排成队伍的人走，当队伍中有些引起他注意的人（如个子較高，年紀較老，样子較脏），立即拉出来槍斃。死难者数以万計，被法庭判苦役的有四万多人，而多半也在苦役場中很快就死去了。这种慘无人道和暗无天日的資产阶級的罪行，不論是在法国历史上或者是世界历史上也是少見的，馬克思用很大憤恨的心情写道："和1871年的空前可恶的罪行比較起来，甚至資产阶級1848年6月的暴行也要相形見拙。""工人們的平靜的巴黎，公社的巴黎，一落到这班守衛'秩序'的嗜血恶狗爪牙下时，就突然变成一个地獄了。"

我們試想想吧！如果我国資产阶級右派向共产党、人民和社会主义进攻得逞的話，如果象一些糊涂的人那样，讓反动派也有"民主"和"自由"的話，那么，我們的国家和人民將遭到什么样的悲慘的命运呢！那么，帝国主义者、地主富农、官僚資产阶級的反革命殘余势力，不是会象巴黎公社时代的法国資产阶級那样的，以"血宴"来庆賀它的胜利嗎？

我們应当牢記，馬克思对巴黎公社时期的阶級斗爭經驗的总結，在今天对我們也还是适用的。馬克思說："每当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子的时候，資产阶級制度的文明体制和正义原則就显示出自己真正的凶殘面目。那时，这种文明体制和这种正义原則就是毫无掩飾的野蛮体制和野蛮报复。財富生产者反对財富占有者的阶級斗爭中的每一次新的危机，都愈益明显地表示出这件事实。"公社以来將近百年的历史，难道不是充分地証明了这点么？

四　巴黎公社的偉大的历史意义

巴黎公社一出現，整个巴黎和法国都变了。

巴黎变了！巴黎人也变了！馬克思說从1848年2月以来，巴黎街道上初次变得平安无事。"公社簡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国时代荒淫无耻的巴黎沒有了；充滿大街小巷的明妓暗娼的巴黎銷声匿迹了；大地主、大資产阶級、大投机家鉤心斗角的巴黎不存在了；槍杀、盗窃和流氓搗乱的巴黎几乎絕迹了。在巴黎出現了新的气象，新的秩序，新的社会，新的人民。巴黎充滿着革命的、热情的、忠誠、高尙和勇敢的巴黎工人和劳动人民。馬克思給当时的巴黎作了下面如实的亲切的描写："努力劳动，用心思索，艰苦奋斗，流血牺牲而又精神奋发地意識到自己所負历史創造使命的巴黎，几乎忘記了站在它城墻外面的食人生番，一心滿腔热忱地致力于新社会的建設！"

法国变了！法国人也变了！巴黎和凡尔賽的斗爭，就是无产阶級和資产阶級的斗爭，两个对立政权的斗爭。巴黎和凡尔賽象征着两个法国——新生的、光明的法国和衰亡的、黑暗的法国的斗爭。总之，"巴黎全是眞理；凡尔賽全是謊言"。

法国变了，世界也变了！巴黎公社不只是巴黎人的，也不只是法国人的，而且是世界工人阶級的。因为它不只是当时法国工人阶級的政府，而且也是具有国际主义的性質的。巴黎公社不仅开辟法国历史新的一頁，而且也是近代世界历史的新的开端。馬克思在他給留·庫格曼的信中曾經这样說过："工人阶級对資本家阶級以及对代表着資本家阶級利益的国家进行的斗爭，由于巴黎公社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次事变直接結果怎样，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經爭得了。"（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莫斯科中文版，第465頁）

因此，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它只存在了七十天，就被資产阶級的豺狼們扼死了，但是它的偉大的历史意义是永远存在在全世界工人阶級、劳动人民和一切进步人类的記忆中，而不能磨灭的。对这种偉大的历史意义，馬克思在"法兰西內战"一书的最后一段，做了經典式的評价："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將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輝的先驅受人敬仰。它的英烈們已永远被銘記在工人阶級的偉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劊子手們已被历史釘在耻辱柱上，尽管他們的牧师們怎样禱告也不能把他們解脫。"馬克思的这段評語，在二十年后恩格斯也認为是对巴黎公社最好的評价。恩格斯說馬克思"把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用簡短而有力的几笔描繪了出来，但是描繪得这样准确，并且——而这是主要的——描繪得这样眞实，以致后来所有关于这个問題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是望尘莫及的"。

可是，巴黎公社失败了。其原因也很多。除了客

观原因（当时資本主义尙未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之外，还有主观上的原因。主要的就是象上面已經說过的，公社沒有及时地坚决地向凡尔賽进軍，沒有徹底地打碎資产阶級的国家机器，使資产阶級的凡尔賽政权有喘息的机会。此外，公社对法国銀行沒有采取坚决的措施，也是"非常严重的政治錯誤"。恩格斯認为，銀行掌握在公社手里，比扣留一万个人質还要有更大的意义。由于資产阶級和地主阶級对巴黎的封鎖，公社对法国农民的联系沒有成功，使公社的战士們的英勇斗爭，陷于孤立无援。还应該指出的是，巴黎公社缺乏一个統一的强有力的工人阶級政党的領导。公社中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多数派是布朗基主义者，少数派是第一国际派，而后者中間又以普魯东派占多数，眞正的馬克思主义者是少数。布朗基派是不主張无产阶級专政，而是主張个人专政的；而普魯东派則是反对无产阶級专政的。沒有一个統一的馬克思主义的政党来領导，公社要坚持下去和取得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

公社的这些錯誤，是它失敗的主要原因；但又是宝貴的經驗教訓。它教育了世界无产阶級的后代，如何正确地去同資产阶級进行斗爭并最后战胜它。后来偉大的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的胜利，都証明了这点。对于后来的无产阶級革命說来，巴黎公社是个开路先鋒。关于这点，馬克思也說得极其清楚。他說："在1871年的降灵节之后，法国的工人与他們劳动产品的占有者之間，已是既不能有什么和平，也不能有什么休战了。雇佣兵卒的鉄腕可能暫时把这两个阶級都压服一下，但是它們之間的斗爭定会重新燃熾起来，并且必然要燃熾得更旺，所以归根到底究竟由誰获得胜利——是由少数占有者，还是由絕大多数劳动群众获得胜利，那是毫无疑义的。法国的工人不过是整个現代无产阶級的先鋒队罢了。"在今天看来，这不是完全証明了馬克思預言之正确么？

虽然公社是失敗了，但是这并不是說，巴黎工人阶級不应該起义，公社的发动是錯誤的。不，决不能这样說。

在公社誕生前六个月，即1870年9月，馬克思就警告过巴黎工人阶級："法国工人阶級正处于最困难的情況。当敌人几乎已在敲着巴黎城門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絕望的蠢举。"在当时馬克思不让工人阶級做沒有希望的輕举妄动，是事实，也是正确的。但是，当巴黎工人已經武装起义了，已經把資产阶級統治打倒了，成立了巴黎公社，建立了第一次工人阶級自己的政权，巴黎人做出天翻地复的英雄事业的时候，馬克思則采取了另一种严肃的态度。在这个时候，他認为巴黎工人阶級的英雄事业不是什么蠢举，而是"冲天"的革命壮举了。他不象紳士們那样謾罵他們，責备他們，譏笑他們；而是以高度的热情来同情他們，支持他們，贊揚他們！馬克思这种同情、支持和贊揚的精神，在"法兰西内战"中，特別是在1871年4月12日給留·庫格曼的信中，表現得极其明显。在致后者的书信中，馬克思在說明巴黎工人阶級打碎了資产阶級的国家机器的壮举之后，說："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呀！在忍受了与其說是由于外部敌人，莫如說是由于內部叛变所遭致的六个月的飢餓和破产之后，他們在普軍的刺刀下起义了，好象在法国和德国之間并未有战爭，好象敌人并未站在巴黎大門前一样！历史上还沒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实例！"（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莫斯科中文版，第463頁）他又說，巴黎公社的起义，即使会被資产阶級鎭压下去，但"还是我党从6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功业"（同上，第464頁）。

馬克思对于人民的革命行动，对于人民的偉大的主动性和創造力，是那样的热爱！那样的珍視！那样的爱戴！甚至当他知道人民的行动不会有什么結果的时候，也还是如此。

列宁对于馬克思的这种态度，也曾作过很有价值的論述和发揮。他說，当群众已經起来行动的时候，馬克思就和他們一同前进，要和他們一同在斗爭过程中学习，而不是向他們作一番官僚主义的訓責。他說，馬克思知道要想在事先就把机会估計得完全正确，这是吹牛或是絕望的迂腐。馬克思以为工人阶級英勇地、自我牺牲地拿起主动权来創造历史，其价值是超乎其他一切之上的。列宁还說，馬克思善于珍視这种事实，就是在历史中会有这样的时机，群众甚至为了一个无成功希望的目标而拼命奋斗。但是为了給这些群众更进一步的教育，为了訓練他們准备下一次的斗爭起見，还是必要的。

同时，列宁还尖銳地批駁了普列汉諾夫在俄国革命中的机会主义的观点，指出普列汉諾夫不懂得馬克思，歪曲了历史事实。普列汉諾夫認为馬克思曾經在1870年9月警告过巴黎工人一切推翻政府的企图都是絕望的蠢举，就对1905年俄国革命的失敗得出荒謬的結論說："他們原不該动用武器啊！"列宁嘲笑普列汉諾夫无耻地自比于馬克思，其实他不是馬克思主义者，而是伪馬克思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这种机会主义观点，歪曲了1905年俄国革命的偉大意义，帮助了沙皇地主資产阶級来反对俄国工农群众的革命。

对于人民的革命行为，人民的創造能力，群众运动，常常有两种根本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一种是馬克思主义的看法，認为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和創造精神是最可貴的，有超过一切的价值，因而抱这种看法的人就采取爱护、支持和贊揚的态度。另一种是机会主义的看法，認为人民群众是愚昧无知、簡单粗暴的，他們一行动起来就容易“出軌”、“过火”，因而抱这种看法的人就采取仇視、反对和鎮压的态度。是眞馬克思主义还是假馬克思主义，是革命主义还是机会主义，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对待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的态度如何，是一个辨别的界綫。

在俄国革命中，有过眞正馬克思主义的列宁和假馬克思主义、机会主义的普列汉諾夫之間的斗爭。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也有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毛澤东同志和假馬克思主义、机会主义者陈独秀輩之間的斗爭。对于1905年俄国革命，列宁說这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演习。而普列汉諾夫則說“他們原不該动用武器啊！”在中国第一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对于南方各省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毛澤东同志說“好得很”，而陈独秀和反革命一样在叫嚣“糟得很”。和馬克思、列宁同样，毛澤东同志以高度的热情来贊揚和歌頌农民运动的胜利：“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眞正目标。……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勛。……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該跟着瞎說。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們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論。”（“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澤东选集”第一卷1955年版，第17頁）而陈独秀机会主义者們，则認为农民行动“过火”了，埋怨农民武裝起来，要求农民保持“秩序”，不能越出“自衛”的范圍等等，这就是等于不让农民革命。什么是革命呢？毛澤东同志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画綉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样溫良恭儉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級推翻一个阶級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級推翻封建地主阶級的权力的革命。”（同上，第18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即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个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什么推翻政权的革命，而是在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級专政）的領导下，通过一系列的群众运动来进行的。一系列的群众运动，就是一系列的群众革命行动。例如土改运动、鎮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肃反运动、对資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运动、反右派斗爭等等，都是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沒有这些运动，就等于沒有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些革命运动中，表現出了我国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无限的热情和高度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創造性。人民群众的这种革命主动性、积极性和創造性，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取之不竭的力量的源泉。

可是，資产阶級右派則相反，他們对待历次的群众运动，不是采取欢迎的态度，而是采取仇視的态度。他們抹杀群众运动的基本成就，夸大群众运动的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他們叫嚣土改“过火”了，“三反”“五反”太厉害了，肃反“扩大化了”，“不应搞成群众运动”，“違反了宪法”，諸如此类。右派分子为什么害怕和攻击运动呢？害怕运动，就是害怕革命和害怕人民。因为人民和革命就是他們的致命伤，所以他們就拼命地向人民和社会主义进行瘋狂的进攻。

和馬克思对巴黎工人阶級的創造力的贊揚一样，列宁贊揚了俄国工人农民的革命創造力，毛澤东同志贊揚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創造力。这是无产阶級革命領袖們堅定的立場和高貴的品質，我們学习我們領袖們的这种堅定立場和高貴品質，就必須和資产阶級右派和一切机会主义者进行堅决的斗爭。

× × ×

馬克思写的“法兰西內战”，到今年5月已經八十七年了，就是恩格斯写的“导言”也已經六十七年了。可是这部經典著作所論述的一些重要的問題，特别是它的研究分析問題的科学方法，对今天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实踐，仍然是有其現实意义的。我們党把这部經典著作列为社会主义教育的必讀之书，就是这个理由。

針对着我国当前的实际斗爭的形势和要求，我們学习这部經典著作“法兰西內战”时，应該注意如下几点：

第一，馬克思的堅定的无产阶級观点和阶級分析方法。自从普法战爭起至巴黎公社失敗止所經历的时間很短，只有十个来月的光景。但是在这短短的时期中間所发生的事件，是复杂的，瞬息万变的：有侵略和被侵略的互相轉化的矛盾，也有阶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矛盾；有政治斗爭，也有武裝斗爭；有資产阶級的政权，也有无产阶級的政权。只有馬克思的堅定的无产阶級立場和他所采用的阶級分析方法，才能及时地鮮明地指出各种事变的性質和意义以及无产阶級的

任务。也只有这样，才能对事变的未来做科学的預言。恩格斯說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三个宣言中所預言的，后来的历史发展都“已經証实了”。我国过渡时期的各种关系及其变化，也是极其复杂的，只有掌握了銳利的阶級分析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認識和解决各种矛盾，正如我們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做的那样。为什么有些人只看到敌我矛盾而看不到人民內部的矛盾呢？为什么相反的又有些人只看到人民內部的矛盾而看不到敌我矛盾呢？又为什么有些人認不清我們和資产阶級右派斗爭的性质，是你死我活的敌我斗爭呢？为什么有些人怀疑右派就是反动派、反革命呢？这些难道不就是由于沒有坚定的无产阶級的阶級立場和阶級分析的緣故么？我們学习馬克思这部著作时，必須学会掌握这把解剖刀——阶級分析方法。沒有掌握这个方法，我們既不能具体分析和認識当前事变的性质和意义，也不能对事变发展的将来作科学的預言。

第二，无产阶級为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而斗爭是殘酷的阶級斗爭，是革命的基本問題。从“法兰西內战”中我們可以看出一条基本規律，这就是資产阶級无論在什么时候，都不放松抓住政权的机会。1870年，第二帝国政权在普魯士人面前跨台了，9月4日工人阶級宣布成立共和国；但是这个共和国的政权立即就被資产阶級所窃据。这个政权1871年3月18日在巴黎被工人推翻了；但是資产阶級竭尽一切力量，集中一切反动势力退到凡尔賽去，整頓它的統治“秩序”，并且准备着对工人阶級进行拼命的报复。而在工人阶級方面，当它坚决地推翻資产阶級的統治，打碎它的国家机器的时候，就能取得自己統治的政权。一当工人阶級对阶級敌人怀着“仁慈”之心，它就不能保持自己的政权，而遭到惨重的失敗。显然，斗爭的焦点，是集中于国家政权上面。

如果說巴黎公社时期，巴黎工人阶級如何取得政权和如何巩固自己的政权，都沒有足够的經驗；那么，我們今天应該說是有比較足够的經驗了。我們懂得了：阶級斗爭是不可調和的，資产阶級是不甘心于自己的死亡的，无产阶級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建設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須坚决地鎮压資产阶級的反抗。我們懂得了：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級和資产阶級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資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而无产阶級专政则是无产阶級战胜資产阶級，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資本主义道路的决定前提。因此，所謂阶級斗爭“熄灭論”和无产阶級专政“取消論”，都是錯誤的，必須坚决反对的。

第三，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創造者。在普法战争和法兰西內战中，工人阶級表現出“冲天”的創造精神和翻天复地的革命权威。当法国民族受到普魯士人威胁的时候，当第二帝国政府屈辱投降的时候，工人阶級自己出錢买槍炮来武装自己；他們自己宣布成立共和国企图自己执掌政权，以抵御外来敌人；他們当梯亥尔反动政府勾結普魯士人向工人阶級开刀的时候，便于3月18日武装推翻了反动政权建立了轟动全世界的巴黎公社的政权；他們对普魯士人一点也不客气，竟使后者不能向巴黎越雷池一步；他們发揮了光輝的天才和智慧，有条有理地管理着巴黎，建設新社会，完全是新型的巴黎，新型的社会。劳动人民就是这样在斗爭和建設中創造人类历史。

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創造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获得了充分发揮的可能。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資料的所有制是公有制，剝削和压迫的制度及其产生的根源都消灭了，劳动人民在經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都得到了解放，因此，他們的聪明智慧就不受任何限制地自由发展。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設的各个战綫上，創造了惊人的奇迹，就足以充分証明这一点。单就我国农村去冬今春的水利工程来看吧！在生气勃勃的农村里，来了一个高潮又一个高潮，一个大跃进又一个大跃进。成千上万的农民靠着他們的积极性和創造性和自然作斗爭。他們不断地改造了自然，战胜了自然：他們在几个月內完成了过去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才能完成的水利工程，他們把干旱地改变为水澆地，水澇地改变为好耕地，沙漠改变为良田。他們沒有水，就到几十里甚至几百里以外的地方去接水；他們在高山上开荒种地，把水引上到几十公尺高的地方去，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这就是劳动人民征服自然斗爭的奇迹，这就是劳动人民創造历史的奇迹。

可是，对于劳动人民这种創造性，总是有二种根本不同的态度：一种是革命主义的态度；一种是机会主义的态度。前者是贊揚和歌頌劳动人民的革命行动，鼓舞他們的革命干勁和跃进；后者则是責备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为“乱子”，把群众的革命干勁贬为“盲动”，把群众的革命跃进責为“冒进”。这两种态度的对立，在本质上說，就是辯証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对立，也就是无产阶級的立場、思想和感情同資产阶級的立場、思想和感情的对立。馬克思对巴黎工人阶級的創造精神和革命气概，采取那种爱护和珍視的态度，就是建立在辯証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級立場的基础上的。



中国历史上的农村公社問題

邱汉生

一 馬克思主义关于古代东方农村公社的学說

馬克思、恩格斯对古代东方的农村公社問題，非常注意。所謂古代东方，就是指埃及、巴比倫、印度等等国家而言，也包括中国在內。古代东方的奴隶制社会，有所区別于希腊、罗馬世界的奴隶制社会。古代希腊、罗馬的奴隶制社会是一种类型，它的奴隶制度达到了最高发展阶段。古代东方国家的奴隶制社会是另一种类型，奴隶的数目比較小，奴隶以外更多的生产劳动者是自由的农村公社的农民。这只是就大体而言。但是，必須說明，不論是古代东方各族人民还是古代希腊人和罗馬人，都生活在奴隶社会的条件之下。馬克思主义的經典著作里曾經这样地注意了古代东方的农村公社問題：

"在印度和中国，生产方式的广闊基础，是由小农业和家內工业的統一形成的。在印度，还有以土地共有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的形态；并且在中国这也是原始的形态。"（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412 頁）

（按：村落共同体即农村公社）

"这些田园风光的农村公社……，却始終一直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馬克思："不列顚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中文版，第 327 頁）

"古代的公社，在其繼續存在的地方，于数千年中，曾經是最殘暴的国家形式（东方君主統治）的基础，从印度到俄国都如此。"（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187頁）

由此可知，馬克思主义經典著作是把印度和中国放在一起講的。这里，应該注意两个問題：一个是印度和中国都有以土地共有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即农村公社存在；再一个是田园风光的农村公社，农村公社的土地所有制，是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馬克思主义經典著作的这些指示，是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十分重要的鑰匙，我們首先必須掌握。

現在，再进一步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对农村公社的具体叙述和分析。这里談四个問題：（一）农村公社的特征；（二）农村公社跟专制主义的关系；（三）农村公社的土地分配情况和耕作情况；（四）阶級关系。

先談农村公社的特征。馬克思在"答維拉·查苏里奇的信和草稿"里，具体指出了农村公社的各方面特征：

"我現在必須指出'农村公社'不同于更古类型的公社的若干特征：

首先，所有較早的原始公社都是建立在自己的成員的血統关系上的。农村公社則割断了这种强韌然而狹窄的联系，从而更能够适应环境，更能够扩大和維系与其他公社的联系。

其次，在公社內部，房屋及其附属物——庭园，已經是农民的私有財产，可是远在农业兴起以前，公有的房屋曾經是当时各种形式的公社的物質基础之一。

最后，在农村公社中，虽然耕地仍归村社公有，但在村社各个成員之間已經进行定期分配，

因此，每一个农民是用自已的力量来耕种分配給他的一份田地，并且把从耕作得来的果实留为已有；然而在較早的公社中，生产则共同进行，被分配的只有产品。不言而喻，这种原始类型的集体的或协作的生产，是孤立的个人軟弱无力的結果，而不是生产資料社会化的結果。

不难了解，‘农村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能够成为它的强毅的生命的根源，因为，一方面，公有制以及由公有制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使村社基础稳固，同时，私有房屋、耕地的分散經营、产物的私人占有等又使得个体获得发展。而这种个体发展与較早的各种公社的条件是不相容的。

但是，同样明显的就是这种二重性也能逐漸变成公社解体的根源。我們把不利的环境的一切影响且抛开不談，单談从积累牲畜开始的动产的逐步积累，……动产在农业中所起的日趋重大的作用，由于积累动产而引起的、我要加以闡述就会使我离題太远的許多其他情况，所有这一切都是起了瓦解經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作用的因素，并且还在村社本身內部造成各种利益的冲突，这些利益冲突，首先引起了耕地轉化为私有財产，最后以私人再占有早已变成村社私产而成为村社附属物如森林、牧場、荒地等等而告一終了。”

（馬克思：“答維拉·查苏里奇的信和草稿”，見“史学譯丛”1955年第三期。这里用的是第一次草稿，因为它比較簡短，意思也还明白。）

在这封信稿里，馬克思指出农村公社不同于更古的原始公社的三个特征：第一，原始公社建立在血統关系上，而农村公社割断了这种关系，建立在地域关系上；其次，原始公社一切財产都是公有的，而农村公社內部，房屋和庭园是农民的私有財产；第三，原始公社土地公有，生产共同进行，分配的只是产品，而农村公社，耕地虽归村社所有，但定期分配給农民耕种，农民用自已的力量耕作分配給他的份地，收获物留为已有。

这里，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問題，一方面是土地公有和由公有制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另一方面是房屋和庭园私有，耕地分配和个体經营，产品的私人占有。公有制和私有制結合，就是农村公社的二重性的統一。公有制使农村公社有巩固的基础，但是私有制又不断使个体經济发展，不断对农村公社起瓦解的作用。又有公有制，又有私有制；又稳固，又不稳固，这就是农村公社二重性的統一和矛盾。

农村公社的解体，根源就在农村公社的二重性。私有制使农村公社內部貧富分化，破坏农民的經济平等和社会平等。解体的第一步是耕地定期分配制度的废弃，定期分配耕地变成固定耕作某一块土地，再进一步则这块固定耕作的土地成为私人占有。最后，则为私人霸占村社的公产：森林、牧場、荒地等等。

再談农村公社跟专制主义的关系。馬克思指出：

“在大多数基本的亚細亚的形态里面，高居这一切小集团之上的結合的統一体，作为最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而出現，而因此实际的公社却不过作为承襲的占有者而出現。……在这些集团里边，每一单个的人，事实上已被剝夺了財产，或者說，在这些集团里边，由于当作这許多集团之父而体現为专制君主的結合的統一体，通过各个人所属的公社而賦予各个人。”

“公社之一部分的剩余劳动，属于最終成为一人形式的最高集团，而这种剩余劳动既表現为貢賦等等的形态，又表現为用以讚揚統一体——一部分是現实的专制君主，一部分是想象的部落存在，也就是神——之劳动的集体形态。”（馬克思：“前資本主义生产形态”，見“世界通史参考資料”古代史与中世史部分，第一輯，中国人民大学1954年版，第5、6頁）

这里，深刻地指出了专制主义的經济基础。土地所有权，属于公社，而最高所有者则为高居一切集团之上成为一切集团之父的君主，公社却不过作为承襲的占有者而出現。因而，剩余劳动就以貢賦的形式，一部分奉献給現实的君主，一部分用以讚揚想象的部落存在“神”。在地上是現实的君主，在天上为想象的神明，政治上是国君，宗教上是神明，二者統一，都是最高所有的体現。不仅如此，在古代东方，单个人从来不能成为財产的所有者，而只不过是一个占有者，事实上他本身即是財产，即是公社的統一体人格化的那个人（君主）的奴隶。最高的土地所有也是最高的人身所有，这就是超乎一切的权力的来源，这就是专制主义的根源。

再談农村公社的土地分配和耕作情况。在这个問題上，恩格斯有极其具体的叙述：

“凡是实行三田制的地方——事实上，差不多到处都是实行这种制度的——，村落中全部的田地总是分成三个大小相等的农圃，在这三个农

圃之中，每一个农圃总是輪流着，第一年用于冬播，第二年用于夏播，第三年休閑。所以，村落每年都有它的冬作田、夏作田和休耕田。在分配土地的时候就要注意到，每一个成員的份地都要平均地分配到三个农圃之中，这样，才能使每一个人都能适应公社耕地强制的办法，而不至于感到困难。例如，按照这种办法，他只許在他的冬作地里进行冬播，等等。

每一次的休閑地，在休閑期間，又成为共同的財产，作为牧場，供整个公社来使用。并且，其他两个农圃，只要收获一过，也同样成为共同的財产，当作公共的牧場来利用，直到下次播种的时候。……

一切其他的土地，也就是說，除去家宅与庭院或者已經分配过的村有地以外的土地，还是和原始时代一样，依然是共同所有，共同利用的。这里面有森林、牧場、荒地、沼澤、河流、池塘、湖泊、道路、桥梁、猎場和漁場。”（恩格斯："馬克"，見"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語言"，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1—142頁）

"当自由处分家宅和庭院的权利获得了重要的意义、可以把它們轉让于第三者的时候，……实行耕地共有制的許多村落也漸漸停止了习慣上的定期分配办法，因而使馬克成員們的各块份地，同样地成为可以繼承和轉让的产业。"（同上引书，第139—140頁）

"公社的生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者越多……那末，公社各別成員的財产狀况也越加变成不平等。旧的公社的土地所有制也越加深刻地被破坏，公社也越加迅速地趋于瓦解而轉为小所有者——农民所組成的乡村。"（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6頁）

这里，說明了三个情况。第一个情况是耕地的分配。耕地划分为三类：冬作田、夏作田和休耕田。分配的时候，每家都分到数量相同的冬作田、夏作田和休耕田。这样的分配，三年进行一次。第二个情况是耕作按一定的規矩办事，即使明年耕地要重行分配了，但是今年的冬作田，仍得下种，以便明年别一家收取。这是規矩，这規矩必須遵守。第三个情况是村社的瓦解。按期重分土地的办法逐漸衰亡下去，活动的占有权变成固定的私有权。剩余生产品更多地变成商品，农民之間的財产狀况越加变成不平等，村社土地所有制越加深刻地破坏了。这样，就出現了小所有者农民。

最后談阶級关系。馬克思說：

"在亚細亚財产形态……的情况下，……各个人决不会成为財产所有者，而只不过是占有者，所以事实上他本身即是財产，即是公社的統一体所体現的那个人的奴隶。"（馬克思："前資本主义生产形态"，見"世界通史参考資料"古代史与中世史部分，第一輯，第30頁）

农村公社（簡称村社，下同）的农民既不是村社土地的所有者，他本身就会变成村社的財产，即变成专制君主变相的奴隶。馬克思所說的"尽人皆是的奴隶制的东方"，就是指这种形态而說的。国君是最高的奴隶主，国君跟各級貴族包括村社的領导者在內，构成統治阶級，他們是奴隶主阶級。村社农民是自由民，但是实际上他們的身分有似于奴隶。村社农民和奴隶是被統治阶級，他們受奴隶主阶級殘酷的压迫和剝削。村社农民的剩余劳动，以貢賦的形式通过村社提供給国君，而在人身关系上，村社农民也得受国君的支配，凡是筑城修路，挖渠行役，都得参加。

馬克思主义对于古代东方农村公社問題的叙述和分析，有助于我們对中国历史上农村公社問題的研究和理解。

二　中国历史上的农村公社問題

我們認为：从夏朝开始到春秋战国之际，这一段时期是我国的奴隶社会。在我国的奴隶社会里，普遍存在着农村公社。生产劳动者，除了奴隶以外，更多的是农村公社的成員"村社农民"。关于夏商两代的农村公社情况，由于文献无征，我們且不去說它。周代的文献遺存比較丰富，有关村社的叙述也比較地可以研尋。下面的分析也就以周代的文献如"詩經"、"孟子"、"左傳"、"周禮"等为根据。"詩經"、"孟子"、"左傳"是先秦古籍，这沒有問題。"周禮"是一部綜合叙述周代制度的书，蓋亦为先秦古籍，其中保存有不少古制的遺留，也是很明显的。

中国的奴隶制社会，是符合于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的一般規律的。但是中国的奴隶制社会也还有它的特殊情况。下面分五个問題来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农村公社。

首先，是农村公社的土地所有制問題。中国的奴隶制社会，村社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是国君。国君是国家最高的代表。"詩經""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这里說得很明白，也很露骨，土地是王土，人民是王臣。土地和人民都是王之所有。所有权的标簽貼得毫不含糊。

这样，专制主义的国家就掌握土地和人民。"周

祇”“大司徒”：

“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輪之数，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大司徒佐王掌握天下土地之图和人民之数。分别各种不同的地形，如山林、川澤、丘陵、坟衍、原隰，和其名物。用沟和封划分疆界。設立社稷，种植其野所宜之木，遂以名其社与野，如树松則为松社，树栗則为栗社。“詩經”“大雅”“韓奕”和“崧高”两詩，具体說明了周王国对諸侯国建邦和划分土田，都直接掌握。

“溥彼韓城，燕师所完。……实墉（城）实壑（池），实亩（私田）实藉（公田）。”（“韓奕”）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尔庸（城）。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崧高）

而更詳尽的，則为春秋中期楚蒍掩数甲兵的情况。“左傳”襄二十五年：

“楚蒍掩为司馬，子木使庀賦，数甲兵。甲午，蒍掩书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数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甲兵、徒兵、甲楯之数。既成，以授木子。礼也。”

楚国是保存古制較多的南方大国。子木是令尹，蒍掩是司馬。蒍掩庀賦，数甲兵，进行了一系列工作。这里，主要是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就是根据地形，作了各种不同的规划：例如藪澤地帶，則聚而合之，衍沃地帶，則規为井田。这就是“周祇”“大司徒”的辨“山林、川澤、丘陵、坟衍、原隰”，“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另一方面則为修賦，就是从农民賦取車、馬、甲、楯，并賦取甲兵、徒兵的人数。这就是“周祇”“大司徒”的“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土地的规划，跟軍賦的征取互相結合，这正符合中国古代农村公社的制度，所以說“祇也”，就是說“合乎古代祇制的”。

其次，是农村公社的井田规划問題。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周祇”“遂人”）

“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一發土为一伐），广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为井，井間广四尺深四尺，謂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間广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間广二寻深二仞，謂之澮，以达于川。”（考工記”“匠人”）

“周祇”“遂人”的材料完全可以跟“考工記”“匠人”的材料相印証。有人怀疑这样整整齐齐的规划是不可能的，因为地形并不是一律方方正正的平原。这怀疑，有部分道理，但是也并不尽然。首先是在河南河北大平原，完全有条件作出这样整齐的规划来；其次，这种整齐的规划，原也只限于“衍沃”之地，或“坟衍”之地、“原隰”之地，并不要求在山林、川澤地带，一例地作。这只要看“周祇”“大司徒”“辨山林、川澤、丘陵、坟衍、原隰”，楚蒍掩“数甲兵”別各种地形的例子就可知道。战国秦汉之际，計算土地面积，常常除去山林、川澤、道路、园廛之后，才指出“提封田”共有若干頃亩，也可以作为旁証。其次，应該指出的是这种井田规划的基本单位是以村社成員的一个劳动力为标准，这种基本单位，叫作“夫”。也就是一个劳动力“夫”能耕的田“百亩之田”，就是井田的基本单位。至于一井是九夫，还是八夫，还是十夫，那是另外的問題，可以不論。

第三，是土地分配和耕作的情况。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沟封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周祇”“大司徒”）

“遂人掌邦之野，……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居屋），田百亩，萊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萊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萊二百亩，余夫亦如之。”（“周祇”“遂人”）

“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饒不得独乐，墝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土易居，財均力平。”（“公羊傳”宣十五年，何休注）

“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汉书”“食貨志”）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詩

經”“小雅”“采芑”）

“亦又何求，如何新畬。”（“詩經”“周頌”“臣工”）

注：“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三岁曰畬。”这里，可以看到耕地的分配情况。不易之地，即是上地，或称上田；一易之地，即是中地，或称中田；再易之地，即是下地，或称下田。田和莱对举，田是耕地，莱是休耕地。不易之地，一岁一垦，无需休耕。一易之地，二岁一垦，則耕一年休耕一年。再易之地，三岁一垦，則耕一年休耕二年。所以，不論在什么情况下，一家分到的可耕地，总是百亩，其余的都是休耕的莱。这是一。其次，耕地跟房屋一起分配。三年之后，重行分配一次，土地和房屋都要調換，故曰“三年一換土易居”。土就是田，居就是里，故曰“以頒田里”。一夫之居则为一廛，故孟子曰“願受一廛而为氓”。第三，耕地和房屋的三年重分一次，目的在使“肥饒不得独乐，墝埆不得独苦”，使“財均力平”。这仍可以看到土地公有制所产生的經济平等要求。第四，“汉书”“食貨志”所謂“自爰其处”，跟春秋中期“晋作爰田”，当同是“換土易居”办法废弃后的情况。旣然不再在村社农民之間“換土易居”，当然就在自己所分到的土地上自行調配耕地和休耕地，故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自爰”就是自行調換，而不是村社农民之間相互調換。这是村社土地公有制破坏的第一步，正如恩格斯所說，“漸漸停止了习慣上的定期分配办法，因而使馬克成員們的各块份地，同样地成为可以繼承和轉让的产业。”（恩格斯：“馬克”）第五，“詩經”的新田，是休耕后新耕的田，畬田是休耕后連續耕种的田，菑亩，是休耕田。故新、畬、菑，相当于冬作田、夏作田和休耕田。关于三年內耕种和休耕的情况应如下：

第一年	菑	新	畬
第二年	新	畬	菑
第三年	畬	菑	新

（引自徐中舒：“試論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見“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問題論文选集”）

第四，是农村公社的組織情况。

“五家为比，五比为閭，四閭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周礼”“大司徒”）

“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周礼”“遂人”）

“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軍。”（“周礼”“大司徒”）

这里，可以看出，不論是比閭族党也好，邻里酇鄙也好，伍两卒旅也好，基本上都是五进位，但是有一点应該注意，就是到第三次进位时則都是四，因此四閭为族，族就是一百家，四里为酇，酇就是一百家，四两为卒，卒就是一百人。这与“詩經”的“以开百室”可以互証，百室并非率举成数，而是实在的一百室，就是一族。“遂人”“百夫有洫”，也不是率举成数，而是实在的一百夫。故郑注“以开百室”曰：“其已治之，則百家开戶納之，千耦其耘，輩作尙众也。一族同时納谷，亲亲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欢。”百家为一族，故曰“一族同时納谷”百家共洫間而耕，共族中而居，故百室不是率举成数，而是实在的一百室。“礼記”“祭法”郑注曰：“大夫不得特立社，与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故一族，一酇，一旅，实即一社。这是一。其次，我以为比閭族党主要是以血統編制言，邻里酇鄙主要是以地域編制言，故大都从邑，伍两卒旅是以軍事編制言。这并非制度上有什么歧异，而是不同角度的不同編制。以公社成員本身来說，从血統言，在家則为孝子順孙，从劳动力言，在南亩則为服劳百亩之农夫，从軍旅田役言，在役則为士为徒，或称卒。公社成員一人之身非有什么分身法，但从不同角度来看，則或为孝子順孙，或为农夫，或为士为徒为卒，实則只是这么一个人。过去以国野来分，似不易說得通。第三，各种編制，有各种不同名目的貴族在領导。以血統言，則有比长、閭胥、族师、党正、州长、乡大夫。以軍旅言，則有伍长、两司馬、卒长、旅帅、师帅、軍將。以地域言，則有邻长、里宰、酇长、鄙师、县正、遂大夫。在血統則为比长，在軍旅則为伍长、以地域言則为邻长，实在同是这一个人。各級貴族，組成統治阶級。第四，中国的农村公社，虽然以地域編制，但是保存有强韌的血統关系。“詩經”“周頌”“載芟”“为酒为醴，烝畀祖妣”，所贊揚者为祖先神。貴族，在村社农民的眼里，只是“公子”、“曾孙”。这样的例子，在“詩經”里不胜枚举。农村公社保存强韌的血統关系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这点必須注意。

第五，是村社农民的負担問題。

（一）公田之籍，或什一之稅，这是指的田稅。

（二）“四邑为丘，丘有戎馬一匹，牛三

1945—1949年美国对蔣介石的“援助”

Г·阿斯塔弗耶夫

战后美国对蔣介石集团的“援助”經历了几个阶段，随着情况的变化和在每个阶段美国所采取的方法的不同，“援助”的形式也在不断地改变。

战后，美国政府以解除日軍武裝和遣送其回国为掩护，立即在中国展开广泛的武裝干涉。这种干涉是通过武装、訓練与运輸蔣介石軍队的形式，甚至是以美国軍队直接参加軍事行动的形式实現的。为此目的，对华租借法案的有效期限最初延至1946年3月，以后又延至7月。

对日战爭結束后，开始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救济基金供給中国。这个国际組織本来应当依靠一切联合国的成員国将必需的民用消費品供給中国，以救济人民和使被战爭所破坏的生产得以恢复。但是，由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管理机构实际上是操縱在美国的手里，故它在中国的活动是完全不符合其宣揚的目的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救济財物的絕大部分为蔣介石集团所占有。蔣介石集团首先是把它用于豢养軍队和作为內战的經費；其次，是用它进行黑市投机和作为国民党官僚发財致富的来源。

“援助”的第三种形式，是无償的或者是以一美元的象征性代价把美国陆海軍在太平洋战場与印緬战場上儲存的大量武器、彈药以及其他軍事裝备与物資供給蔣介石集团。所有这些儲存品以“軍用剩余物”資为名直接供給国民党軍队，或者被蔣介石政府轉卖給美国及其它国家以作为其內战經費的外匯来源。

蔣介石集团在重新装备和整編其腐敗軍队方面，除了采取掠夺人民的手段以外，所有这三种类型的“援助”早在1945年就已成为其經費的主要来源了。以此，1945年10月蔣介石的軍队向解放区展开进攻。蔣介石軍队在美国与日本軍队保护之下占領根据地，集中与扩充軍队。

如所周知，第一阶段蔣介石政府的軍事冒險是以失敗而結束的。同时，美国在中国的武裝干涉引起了美国人民与全世界的极大的不滿。美国政府不得不暫时地轉而玩弄政治阴謀。

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統杜魯門发表了“关于美国在华政策”的宣言。从这一宣言中露骨地显示了：美国在华政策的基本方針仍然是堅持維护蔣介石集团

头，是曰匹馬丘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备，謂之乘馬。”（“左傳注疏”定元年正义引司馬法）

这說的是兵役負担和軍賦負担，这种情况，可以跟“尙书”的“費誓”，互相印証。虽然不完全一致，但是可以互相发明。“周礼”“小司徒”：“乃頒比法于六乡之大夫，使各登其乡之众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岁时入其数，以施政教，行征令。”說的当也是相类似的事。

（三）“中冬教大閱。前期，群吏戒众庶，修战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为表，百步則一，为三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后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乃陈車徒，……群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进。大兽公之，小兽私之。………入，献禽以享烝。”（“周礼”“夏官”）

这說的是檢閱車徒，数战陈，然后田猎，归而献禽烝享。从“左傳”里，可以看到不少具体例子，說明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軍事訓練跟田猎相結合。而田猎之后，則又繼之以对祖先的祭祀，春祠、夏礿、秋甞、冬烝。这里，也可以看到血統关系强韌地維系着。

总起来說，村社农民的負担，有师、田、行役、賦、稅等等。

关于村社农民的經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除了“豳风”“七月”所叙述的以外，孟子的两段話，虽然带一些理想色彩，也还是典型地說明了村社农民的家庭情况。孟子去古未远，特別值得重視。

“五亩之宅，树墻下以桑，匹妇蚕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飢矣。”（“孟子”“尽心章”）

掌握的政权并扩張其統治到全国的領土上。

美国統治集团所以需要中国暫时停战，只是为了用扩大經济援助（这是为了滿足当时美国壟断資本的需要，也就是为了增加資本与商品的輸出）的办法，增强与装备蔣介石集团而已。

美国“援助”国民党的实际目的，乃是为了准备武力鎮压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

由于这种“援助”，遂使蔣介石政府有可能在1946年7月把430万大軍投入全面进攻。結果使中国又重陷于艰难的破坏性的三年战爭的深淵之中，这个战爭是以人民革命的胜利与反动派的被粉碎而結束的。

在1947年“杜魯門宣言”公布之后，又通过了馬歇尔計划，美国轉而采用援助蔣介石集团的新方式——自年度預算专門款項中撥款，以及与蔣介石签訂特別条約。

采取这些新方式的意图，是要使蔣介石集团不仅在軍事方面、政治方面而且也在經济方面完全受美国的操縱，并且要达到使蔣介石統治下的中国領土实际上成为美国的殖民地的目的。

1947年10月27日签訂的协定規定給予二千七百七十万美元的“援助”，这一“援助”是美国国会1947年5月31日通过的。这个协定是根据美国国会所制定的法案締結的，按法案規定接受“援助”的国家，必須保証这种“援助”将依据国会所規定的条件使用之。协定对支配“援助”的制度，出售貨物所获款項的使用等都有所限制，并規定有监督“援助”的分配，美国檢查員有参与分配中国的战略物資与获得他們需要的一切情报的权利等。协定責成蔣介石政府防备人民对美国“援助”的普遍抗議。

这样，美国在給予蔣介石集团极小数目貸款的同时，却得到了对国民党中央与地方組織的政治經济活动的监督的可能。中国著名史学家刘大年在評价这一条約的性質时指出，它給了美国政府使蔣介石政府的財經机构服从自己的統治的可能。

1948年7月3日在南京签訂关于經济“援助”的协定，美国国会根据1948年4月3日的法令給予总数四亿美元的“援助”。其中用于經济“援助”的为二亿七千五百万美元。这笔款項必須在美国国会法案內所規定的許多条件下使用。

余下供軍事設施之用的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是以贈送形式交予蔣介石政府的。似乎南京政府方面沒有負担任何义务，而美国政府方面也沒有监督使用的权利，但这純粹是虛构，因为軍事“援助”的使用是处在美国軍事代表团与国防部直接操縱之下的。

1948年7月3日签訂的协定与1947年10月27日的协定以及其他一些协定乃是美国在华殖民制度的法律基础。

据1948年7月3日的协定，南京政府經济政策的管制与中国国民党区域經济的实际管理均交給了經济合作代表团，該团团长納法姆自1948年7月起与司徒雷登大使及美国軍事代表团团长巴尔同为美国三执政的成員，他們事实上管理了中国的这一部分。

美帝国主义通过其在华軍政机构确立了对中央、地方的国民党軍队、党政机关的控制，对国民党对內、对外和經济政策的控制，以及对国家經济和部分

“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孟子”“滕文公章”）

“汉书”“食貨志”所述，班固自云出于詩书所载，但多根据后儒的师說，价值較遜。但是因为是綜合材料，也还可以参考，摘引如下：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

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田中不得有树，用妨五谷。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还廬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植于疆場。鸡豚狗彘，无失其时，女修蚕織，则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

在野曰廬，在邑曰里。

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戶也。……

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

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

“孟子”和“汉书”“食貨志”所述农民的田疇园宅情况，种植耕作情况，邻里相联相助同工同作情况，等等，都反映村社农民的生活面貌，可以跟“詩經”“周禮”的材料相参証。

本文所提出的若干論点和看法，是否正确，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評指正。有关中国古代社会的奴隶問題，非本文所及，故未予叙述。

地区的控制。

所有这些总合起来，就是美国帝国主义統治中国国民党区域的形式。这一形式实质上是一种奴役中国的殖民地附属国的类型，它比1937年以前的半殖民統治时期厉害得多。事实上它几乎与日本帝国主义在1937至1945年間在其所占領的中国地区建立的傀儡制度毫无二致。

由于許多“援助”的实际数目在美国官方的統計里是被有意識地縮小了，若干种“援助”常常不能用金錢形式表現或者是被細心掩盖了的，因而准确地确定美国“援助”蔣介石集团的总数是有困难的。

享有战时总統权限的杜魯門政府能够不需要“援助”的法律手續而用供給战时剩余物資的方法，轉让美国占領軍的武裝、彈葯及其他軍事裝备，并对美国社会輿論界隐瞞其实际数額。

据白皮书中援引的官方材料：战爭开始至1949年为止，美国“援助”蔣介石总共三十五亿二千三百万美元（仅只战后时期就达二十亿七千七百七十万美元）。其中不包括在各个时期以极低的，甚至是象征性的价格給予蔣介石的軍事剩余物資在內。这批剩余物資的价值并不是白皮书里所指出的三亿美元，而是二十亿美元。

白皮书中所引用的数字，自抗日战爭开始以来美国“援助”蔣介石的軍事剩余物資为五十八亿六千九百万美元（战后时期是四十三亿三千八百万美元），在这里还必須考虑到这些剩余物資的官方价格与实际价格是有差別的。在白皮书里也完全沒有計算美国进出口銀行給予蔣介石的五亿貸款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1946年給予蔣介石集团的总数一亿八千四百四十万美元的物資，这批其它国家生产的物資事实上是由美国当局支配的，把它們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美国物資部分一同交到了蔣介石的手里。

因此美国援助蔣介石集团的总数增至六十五亿五千三百万美元。

就是这个数字也还沒有反映出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干涉与給予国民党集团的“援助”所支款項的全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后，在三年多的时間里，龐大的美国陆海空占領軍、巨大的軍事代表团、許多軍事合作机构和美国与国民党合办的諜报机关“中美合作所”的費用，以及最后在美軍从北京、天津、青島撤退时，无偿地留給蔣介石的武裝、彈葯与其它軍事裝备等，均沒有以任何金錢的形式，哪怕是近似的形式来表現。这些花費无疑地是有数十亿美元的。美国进步記者麦耶尔在其“美国的毁灭是不可避免的嗎？”一书中断定：美国在华花費的总数是一百八十亿美元。

对蔣介石集团的援助具有三种基本形式：金錢的，即借債与貸款；商品的，即供給武器、軍用物資、生产与消費性質的商品；最后，是所謂支援，即运送国民党軍队与供应物資。

商品供給占压倒地位，数字大至四十四亿八千五百万美元，即占总数的76.4%，其次是“支援”估計为总数的12.2%，占末位的是借貸款，仅只是在对日战爭的年代里才有而战后事实上沒有进行。

这种分配并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美帝国主义总的政治路綫：給予以商品形式为主的援助，其目的是为了保証美国壟断資本家的过剩商品的銷售与获得利潤，同时这种“援助”方式也剝夺了被“援助”国家經济独立，破坏了它們的民族工业，并使它們依附于美国經济，实質上，是把它們变为美国工业的殖民地附属品。

由于大批美国貨物的拋售与进行內战，使中国的民族工业与农业遭到了重大的破坏。它是中国大批商店倒閉、企业关門与失业剧增的最主要原因。

在1946年仅上海一地就有三分之二的烟草工厂、过半的紡織、制葯与化学工业企业停工。中国的机器制造、电气、水泥、造紙、火柴、面粉、玻璃、服飾用品等一系列民族工业部門也都处在很困难的情况中。

美国小麦、面粉、棉花、烟草、人造絲、奶粉、橘类、罐头食品的輸入和傾銷，妨碍了中国农产品在城市的傾售，并使其境况更加恶化了。

美国对华貿易的特点是：发展粮食、原料与消費需要的工业品等的輸入中国，竭力限制机器与工业設备的輸入中国。因此，1946年美国輸入中国的机器与工业設备的数量比1936年縮小了很多。

美国对蔣介石集团“援助”的后果，促使其更加积极地进行空前規模的反对中国人民民主力量的內战，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痛苦。

美国在1945—1949年对蔣介石集团的“援助”，很明显地表現出美国对別的国家“援助”的实質。这种“援助”并不能导致这些国家經济政治的发展与获得政治經济的独立；而是支持各种反动制度的政权，加强这些国家对美国的依賴，将它們在事实上变成美国的殖民地。

中国人民的有历史意义的胜利，有力地証明了以給予“援助”的方法奴役东方人民的企图是注定要失敗的。

（張愢全譯自“世界經济与国际关系”
1958年第一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远东太平洋形势与华盛頓会議（1921——1922年）

郑 挺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十月革命的結果，在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出現了第一个无产阶級专政的国家。苏維埃社会主义国家象一座灯塔，給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阶級和民族指出了摆脫剝削和压迫的解放道路。在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影响下，远东地区的反帝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1919年3月，朝鮮爆发了全民性的"三一"反日武裝起义，1919年5月，中国人民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1921年7月，蒙古人民在苏維埃国家援助之下，赶走了压迫蒙古人民的中国軍閥，消灭了侵入蒙古的白衛匪帮，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民族解放运动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远东地区的殖民主义統治。因此，帝国主义乃图通过协商互相勾結起来，共同反对苏維埃国家以及远东（特别是中国）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以維护它們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統治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还引起了帝国主义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力量对比关系的重大变化以及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矛盾的尖銳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美、日、俄、德、法等帝国主义在远东都拥有相当大的陣地，彼此进行着激烈的竞爭。战后德国由于战敗而被剝夺了在太平洋地区的一切属地。它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也在1919年的巴黎分赃会議上被轉让給日本。十月革命后，苏維埃政府宣布：它奉行主張一切民族平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約和协定的政策，因而放弃了沙俄政府在远东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特权。英、法帝国主义在大战时期由于忙于对德作战，暫时放松了对远东的控制。同时，四年大战的巨大消耗也使得英、法的力量受到一定的削弱。因此，英、法帝国主义战后在远东的势力也相对地削弱了。所以在战爭結束后，英、法乃图卷土重来，恢复和扩大它在远东地区的陣地。然而，它們在这里却遇到了战时靠吸吮旁人的鮮血而势力大大膨脹起来的帝国主义竞爭者——美国和日本。美国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发横财，世界資本主义財政剝削的中心已經由欧洲轉移到美国了。美国壟断資本在战后便提出了重新分割世界要求，积极展开了夺取世界霸权的活动，特别是对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活动，因为对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統治是美帝国主义称霸全世界的重要組成部份。然而，美帝国主义的这种計划則遭到英、日等帝国主义的反对。因此，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就尖銳化，特别是英、美之間爭夺世界霸权的斗爭就构成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主要矛盾。然而在远东地区，美、英帝国主义所遇到的最危險的敌人却是日本。日本和美国同样也是在世界大战中发財的国家。在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大大地扩張了在中国和远东地区的势力。它野心勃勃地企图独霸中国和称霸太平洋地区。这样就不能不引起力图在中国确立自己优势地位的美帝国主义的激烈反对。因此，美、日之間爭夺太平洋霸权的斗爭，便成为帝国主义之間在远东地区的主要矛盾了。列宁曾指出：远东的全部外交与經济历史毫无疑义地表明了：在資本主义基础上要防止日趋成熟的日、美間的尖銳冲突是不可能的①。日本积极在中国和远东地区的扩張，也损害了英帝国主义的利益，因而使得这两个傳統的"盟国"之間的关系日益恶化。

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矛盾的尖銳发展，明显地表現在空前的海軍軍备竞爭上面。美国在1919年批准了龐大的海軍建設計划。按照这个計划，到1924年美国艦队应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艦队。英国也极力要維持自己的海上霸权地位。它不願意放弃海上政策的傳統原則——两强标准，即：英国艦队的实力要等于其它两个最强的海軍国家实力的总和。因此，尽管战后英国的財經狀况很不好，但劳合·乔治首相还是宣布：英国要耗費最后的一文錢，使海軍超过美国或任

① "列宁全集"，俄文版（下同），第23卷，第5頁。

何其它国家。日本在1920年通过了"八——八"造艦計划，准备建造两支以八艘战斗艦所組成的艦队，每八年更新一次。如果这个計划全部实現，就会使日本在远东太平洋区处于优势。

然而，历时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交战各国的国民經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广大的城市和乡村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在战后的初期，資本主义各国的經济仍然非常混乱，生产与貿易衰退，貨币制度也异常混乱，国际間的經济联系也几乎处于断絕狀态。1920——1921年美、英、法、日、意等資本主义国家又爆发了深刻的經济危机，因而使繼續推行无限制的軍备竞爭发生了困难。同时，在偉大十月革命直接影响下，欧洲大陆和殖民地附属国在战后都爆发了一系列的革命运动。在四年殘酷的帝国主义世界战爭中受苦最深的人民群众，对于战爭的苦痛是記忆犹新的。因此，在战后，要求裁减軍备、反对扩軍备战政策的和平呼声日益高漲起来了。

以上这些情况都促使帝国主义列强召开一次国际会議，来按照帝国主义、特別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利益来"解决"远东和太平洋問題。1921—1922年的华盛頓"軍縮"会議就是在上述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这次会議要完成的任务是：

1.利用人民群众的和平主义情緒，在"軍縮"的幌子下，根据列强的新的力量对比关系来确定各国軍备的比例，暫时緩和相互間的尖銳、漫无限制的軍备竞爭。

2.根据战后列强新的力量对比关系，重新划分各列强在远东特別是在中国以及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領地和勢力范圍，以弥补凡尔賽体系之不足。

3.在各国互相让步調整矛盾的基础上，彼此暫时勾結起来，共同反对苏維埃国家，反对中国及其它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民族解放运动，以維护帝国主义在这些地区的殖民統治。

华盛頓会議的帝国主义性質，它的反苏、反中国和反远东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質以及它所包含的帝国主义之間的尖銳矛盾，在它的各項决議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二

1921年7月，美国国务卿許恪士正式宣布召开解决太平洋問題的华盛頓"軍縮"会議。应邀参加会議的除美国外还有英、日、法、意、荷、比、葡、中国等与太平洋地区有利害关系的一些国家。美国召开会議的目的是：借助于在反苏口号下把列强联合起来的国际协定，来緩和一下帝国主义之間十分緊張的关系，并打算利用英、日之間的矛盾对它的竞爭者施加压力，削弱它們在远东的陣地。它的具体計划是：結束英国的海上霸权地位；迫使英国接受英、美海軍平等的原则；拆散英日同盟；取消日本在华的优势地位；修改凡尔賽和約中最不利于美国的条款；在"門戶开放机会均等"的幌子下冲破各国在华的势力范圍；排除竞爭者树立自己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地位。

英国則希望在保持英国海軍优势的情况下与美、日达成限制海軍軍备的协議，以緩和力不从心的軍备竞爭。并打算以美、英、日的三角同盟代替英日同盟，这样既可以使自己避免卷入一触即发的美、日太平洋战爭的漩渦；又可以討好美国来协助自己恢复陷于混乱的財政狀况，以巩固自己在远东地区的地位。对取消日本在华优势地位的問題，英国和美国具有同样的要求，只不过是从各自利益出发的不同罢了。

日本帝国主义則力图維持自己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反对修改凡尔賽条約中山东問題的条款，不让美国插足以便建立自己在中国和远东地区的霸权地位。因此，日本对美国发起的华盛頓会議不感兴趣。它怕像1895年那样，資本主义列强剝夺了它大部分掠夺中国的果实。但是，由于美、英等国既已决心召开华盛頓会議，又在"裁减軍备維护和平"的大招牌压力下，为了避免外交上的孤立，日本只好参加会議。但它却表示：反对討論涉及任何国家的"特殊利益"和"既成事实"問題，并用远东反苏和鎮压民族解放运动的宪兵姿态，迫使美、英对自己不能"过分"。

至于法、意、荷、比、葡等国，也是各有自己的打算，只不过它們在会議上不能起重大作用罢了。甚至連号称一等强国的法国，在华盛頓会議上也不受重視。至于中国北洋軍閥政府的代表們，在会議上則完全听任列强的摆布。然而，这些厚顏无耻的傢伙們竟然以为是以"平等地位"参加会議而欣喜不尽哩！

1922年11月12日，华盛頓会議在許恪士的主持下宣布开幕。会上一切重大問題均由美、英、日三国代表事先在秘密会議上作出决定。美国的外交官对会議的各項决議均起了主导的作用。会議經过各国代表的激烈爭吵之后，共达成了以下几个国际协定：

（一）四国条約和英日同盟的废除

华盛頓会議締結的第一个条約是1921年12月13日美、英、法、日四国間"关于各該国太平洋内各島領地及属地条約"（四国条約）。該条約第一条规定：各締約国互相贊同和尊重各該国在太平洋地区内之各島領地及属地之权利。第二条规定：所云之权利倘有任何一国有加侵犯之举动，则各締約国应互相充分而

坦白地交换意見，以便达成关于应当采取的最有效措施的协議。这就是說：帝国主义强盗們互相承認它們在太平洋地区掠夺到的贓物的“合法”权利，并要共同維护这种殖民主义“权利”。条約第四条規定：本条約一俟各締約国批准生效后，1911年締結的英日同盟条約即行废止。这一条是美国外交的重大胜利。因为在英、日保存同盟关系的条件下，美国是不可能夺取远东太平洋霸权的。英国最初曾堅持締結一个美、英、日“三角”同盟协定来代替“英日”同盟，但为許恪士所拒絕。因为三角同盟不能保証美国的优势地位，所以美国堅持邀請法国参加同盟以便利用英法矛盾，施展其狡猾的外交伎倆使之对己有利。英国在美国的压力下終于作了让步，于是美国得以通过四国同盟这一“体面”的形式拆散了英日同盟。1921年12月13日在四国条約之外，又附加了一个“宣言”，規定該条約适用于“太平洋受委任統治的島嶼”，并說明：“不得以現經訂定条約而遂認美国方面对于各委任統治权已加贊許，以及阻碍美国与各有委任統治权国彼此間因关于委任統治各島有所协議”。1922年2月6日又訂了一个补充协定，它闡明四国条約中所用的“各島領地及各島属地”字样，“对于日本只适用于樺太島（即庫頁島南部）、台湾、澎湖列島及日本接管的委任統治島嶼”。所有这些补充声明和协定都表明美、日之間爭夺太平洋地位所进行的激烈的外交斗爭。

由此可見，四国条約是互相矛盾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以互相让步为代价的一个暫时妥协，其目的是要勾結起来共同反对苏俄，反对远东（首先是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列宁在評述这一条約时曾指出：“在华盛頓会議上締結的英、美、法、日四国同盟，首先，象所有的帝国主义同盟一样是极不巩固的；其次，是与所有其它的民族为敌的。”①

（二）限制海軍軍备問題和五国海軍条約

1922年2月6日，美、英、日、法、意五国在經过将近三个月的爭吵之后，締結了“限制海軍軍备”的五国海軍条約。該約第四条規定：英、美、日、法、意五国主力艦的比例为五、五、三、一点七五、一点七五。各国拥有主力艦的总吨位数为：美国525,000吨、英国525,000吨、日本315,000吨，法国175,000吨，意大利175,000吨。这个条約表面上似乎解决了列强的海軍力量对比問題。但是它却包含着列强之間深刻的重重矛盾。这种比例的規定是美国外交的胜利，它使得美国得到了建造和英国同等强大并大大超过日本的艦队的权利，从而結束了英国海上霸权的时代。英国由于国內財政困难和受到美国的压力，不得已放弃了“两强标准”的海上政策。但是，它却打算把旧式軍艦自現役艦队中剔除，留下最新式的軍艦与美国的艦队相抗衡。

日本曾提出用十比七代替五比三的比例，但遭到了美国的拒絕，終于在美国威胁下被迫放弃十比七的要求。应当指出：日本艦队虽然在数量上减少了一些，但是它也爭得了美、英对自己的一个重大让步。由于日本的堅持，五国海軍条約第十九条規定：美、英、日在太平洋的防备和軍事基地“維持現狀”，换言之，各国不得在太平洋地区建筑新的海軍基地。当时日本在台湾、琉球、庫頁島、千島已建立了很好的海軍基地，而同时美国在日本的附近菲律宾、关島、阿留申群島等地却还沒有建立海軍基地。在这种情况下“維持現狀”的条款便保証了美、英在距日本五千公里以內的地区（新加坡除外）不建立海軍基地。这样就使得具有广泛分布的基地網作为靠山的日本艦队得以称霸亚洲海洋。将来一旦在太平洋爆发战爭时，英国的艦队需要分散在三个大洋的广闊水面上作战，美国的艦队也要陷于两个大洋活动，而日本的艦队却可以密集在中国、朝鮮、日本三地所包圍的一片狹小的太平洋海面上作战，从而可以取得进攻中国和对付美、英的优势地位。

五国条約第五条規定：各国不得建造排水量大于35,000吨的主力艦。这是由于美国的堅持而列入的一个条款。因为当时英国已开始建造42,000吨的巨型軍艦，而美国却沒有这种軍艦。如果美国也要赶上英国建造四万多吨的巨型軍艦时，它的艦队就不能通过巴拿馬运河而自由地活动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間。（在当时，排水量在35,000吨以上的船只无法通过巴拿馬运河。）

美国还力图限制巡洋艦队以取消英国在这方面的优势。英国断然拒絕了美国的要求。因为它需要龐大的巡洋艦队来控制海上交通并維持它和遍布在世界各处的广大殖民地的联系。因此，五国海軍条約沒有限制巡洋艦吨位的条款。此外，由于法国以及日本、意大利等国需要龐大的造价低廉而威力甚大的潛水艇艦队来对付各自的竞爭者，所以它們堅决反对英、美关于限制潛水艇吨位的要求。同样，由于帝国主义之間的尖銳矛盾，会議也未能就限制陆、空軍方面达成任何协議。

可見为帝国主义所大吹大擂的华盛頓“軍縮”会議并不是什么眞正的“裁軍”“和平”会議，而是仅仅就限制主力艦方面达成了一个暫时的协議，暫时地

---

①“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7頁。

解决了列强間海軍实力对比关系問題。它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消除"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和軍备竞爭。

（三）中国問題与九国公約

华盛頓会議的最重要的問題是"中国問題"。帝国主义了解：誰能够独霸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誰就能够巩固在太平洋沿岸的势力。"中国問題"的解决也就意味着太平洋問題的解决。所以帝国主义在中国利益冲突的錯綜狀态，也就是它們在太平洋地区利益冲突的焦点。正因如此，作为解决"太平洋問題"的华盛頓会議，也就"自然"地把列强协議共同宰割中国的問題作为会議的中心問題了。

1922年2月6日会議的参加国締結了一个对华政策的"九国公約"。条約的基本內容是"門戶开放机会均等"八个大字。条約第一条規定：（1）"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及"領土与行政的完整"；（2）給予中国以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維持一有效巩固的政府；（3）施用各国之权势以求有效地建立并維持各国在中国全境的工商业均等的原則；（4）不得利用中国局面而乘机营謀足以侵害友邦人民权利的特别利益，并不得奬許有碍友邦安全的行动。可見这个条約是一个徹头徹尾的掠夺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强盗性質的条約。由于当时在"五四"爱国运动之后，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情緒空前高漲，所以帝国主义者为了麻痺中国人民的斗志，在条約的开头加上一个"尊重"（？！）中国主权独立与行政領土完整的欺騙性的条款，用此掩盖它的侵略实質。所謂"給予中国完全无碍的机会以发展"也只是掩盖帝国主义粗暴地干涉中国內政的一块遮羞布罢了。至于要"維护一有力巩固的政府"云云，也无非是要通过它們的代理人来加强对中国人民的压榨。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門戶开放"原則，更加赤裸裸地暴露出了殖民主义者的凶恶嘴臉。"門戶开放机会均等"这一原則的本身就粗暴地破坏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因为这种原則不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平等的主权国家来对待，而是把中国看成是任凭帝国主义宰割的无主人的一宗財产。美帝国主义之所以用最大的努力爭取各国接受它所提出的"門戶开放"原則，是由于当时日、英帝国主义在中国占了美国的上风，所以它才采取了这一原則，而要求中国的"門戶"必須对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它帝国主义者同样的"开放"，反对其它帝国主义者独占中国，而要和其它帝国主义者"均沾"掠夺中国的利益。美国企图依靠自己强大的財政势力在"机会均等"的幌子下把自己的竞爭者排挤出去，以达到自己独霸中国的目的。所謂"不得利用中国局面而乘机营謀足以侵害友邦人民权利的特別利益"的規定，只是美国用来防止日本或其它列强背着美国來独吞中国的一种手段，决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独占中国的野心。以后全部的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最雄辯地說明了这个問題。

华盛頓会議还通过了一系列与"九国公約"具有密切联系的有关"中国問題"的議决案。其中包括："关于中国关稅稅則"；"关于在中国的領事裁判权"；"关于在中国的外国駐軍"；"关于裁减中国軍队"；以及关于中国的邮电、鉄路交通等等議决案。这些議决案可以充分表示帝国主义所謂"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与行政領土完整的实質究竟是什么。例如："关于中国关稅稅則"議决案規定：对于进入中国的入口洋貨中国海关的关稅稅率不得超过5％（値百抽五）。以后关稅稅則的"修改"也需要由帝国主义国家开会"决定"。"关于在中国的領事裁判权"議决案則說什么"中国法制的改良"沒有"达到各国所希望之程度"，故决定由各国政府共同組織一个委員会，先到中国"調查"，向各国政府提出"报告"再說。这样就可以使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对中国的"調查"，写出"中国法制改良"还不到帝国主义"希望程度"的"报告"，从而把領事裁判权"合理""合法"地保存下来。"关于在中国的外国駐軍議决案"仅規定：那些駐紮在中国未得条約或协定許可"的軍队可以撤退。这样以来，許多帝国主义国家在北京、天津等地的駐軍都不須撤退了，因为那是"辛丑条約"所"許可"的，因而也是"合法"的。"关于裁减中国軍队"議决案中帝国主义假冒伪善地說什么：中国各省自建軍队互相混战，增加了財政支出，妨碍了經济发展和政治的統一等等，而要求中国裁减軍队。事实上，帝国主义者正是制造中国軍閥混战的罪魁禍首。帝国主义用这种"悲天憫人"的姿态来建議中国裁軍不过是为了：（1）掩盖自己制造中国軍閥混战的暴行；（2）討取一部分对帝国主义认识不清楚的中国人的好感；（3）消除中国抵抗外国的武装力量。其它的一些議决案也无非是諸如此类的欺騙加掠夺的玩意儿罢了。

美帝国主义在华盛頓会議上还支持中国軍閥政府代表团向日本提出了收回山东的要求，其目的是要取消日本在中国一些地区中的独占地位，以便使自己插足进来。但日本借口这个問題只能是"中日两国双边談判討論的对象"而拒絕在华盛頓会議上討論。美国在形式上对日本作了让步，同意由中、日两国进行双边談判但却坚持美、英派"观察員"参加談判。談判的結果，1922年2月4日中、日两国締結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約"。条約規定：日本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

交还中国；日本軍队撤出山东；胶济鉄路由中国贖回。日本声明：放弃它在1915年强迫中国接受的"二十一条"的某些条款，其中包括：日本放弃貸款給中国在南滿和蒙古东部修筑鉄路的特权，把它让給新成立的美国占重要地位的"国际銀行团"；关于在南滿应聘用日本顾問和教官的特权也放弃了，这样中国便有了"选擇"美、英顾問和教官的"自由"。但就整个說来，日本并沒有完全放弃"二十一条"。美国对日本願意撤消"二十一条"的某些条款感到"滿意"，但对"二十一条"的其它条款美国将繼續"不承認是日本单独的权利"。美国要求中国依照各别协定給予自己"应有"的一切利益。

由此可見：华盛頓会議所通过的"九国公約"，关于"中国問題"的各項議决案，以及由美国起主导作用而締結的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約，都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掠夺奴役中国人民的殖民主义条約。这些条約使得帝国主义可以在中国为所欲为；可以决定中国的关税税則；可以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可以在中国駐兵；可以租借中国的土地等等。这些血腥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条約的本質是不能用什么"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与行政領土完整"一条宣言式的条款所能掩盖得住的。然而，美帝国主义及其代言人却居然还胆敢用这些条約作为"資本"冒充"中国人民之友"，胡扯甚么：由于美国所采取的这种"門戶开放"政策才使得中国保持住了国家的"独立"、避免了被列强瓜分的命运。美国帝国主义的这种无聊又无耻的說教在我国的一些資产阶級历史学家中居然还得到支持。这些人不是帝国主义的奴才就是認識上的糊塗。正因如此，通过华盛頓会議諸决議来徹底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政策的实質，是有着重大的現实政治意义的。

九国公約以及其它有关"中国問題"的决議案給我国人民套上了新的殖民主义的枷鎖，并帶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正如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所指出的那样："华盛頓会議給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剝夺中国人民的經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民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拉斯的奴隶。"

华盛頓会議不仅是掠夺中国人民的会議，而且和巴黎"和"会一样，也是一个反对苏維埃国家的会議。会議的反苏性質明显地表現在以下的事实上，即：帝国主义国家企图解决与苏維埃国家有关的重大問題，但却"否認""統一的俄罗斯政府的存在"，而拒絕太平洋上的大国——苏俄——参加华盛頓会議。苏俄政府为此曾提出抗議并声明：未經苏俄参加而通过的任何决議都是无效的。帝国主义还拒絕到达华盛頓的远东共和国代表团参加会議。然而，远东共和国代表团还是在华盛頓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对于揭露帝国主义在远东的侵略政策方面曾起了不小的作用。华盛頓会議的反苏性質还表現在对"中东鉄路問題"的討論上。美帝国主义在会議上試图在"非政治性"的"国际监督"的幌子下来攫取中东鉄路。当时还組織了一个"技术专家"的专門委員会并拟定出了"改組"中东鉄路管理局的"草案"。根据該"草案"，中东鉄路的全部管理权都轉移到拥有警察、宪兵的"专門委員会"的手中去了。苏俄政府对帝国主义的这种做法提出了堅决的抗議，并指出：中东鉄路是苏俄的財产。由于苏俄政府的堅决立場以及与会各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使得华盛頓会議才通过一項沒有拘束力的必須"保护"中东鉄路、"节約"資金等一般性的决議。会議所設立的关于中东鉄路問題的技术委員会也不得不承認："鉄路确为俄国政府所有"。

华盛頓会議各項决議的基本內容及其帝国主义实質就是如此。

三

从以上的闡述和分析中我們可以明确地作出以下的結論：华盛頓会議是战胜国列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确定互相間力量对比关系、重新瓜分殖民領地和势力范圍的一次强盗分賍会議，是帝国主义互相妥协勾結起来共同反对苏俄、反对中国、反对远东民族解放运动的会議。这次会議虽然使得美、英、日帝国主义对于在中国确立势力范圍与掠夺中国的方式上取得了暫时的协議，然而这些协議却是极不巩固的。

斯大林同志曾經指出："华盛頓会議各項决議之所以是不巩固的，第一，因为协議者現在和将来都为了分賍而互相拼命地搏斗；第二，因为这种协議是背着中国人民而进行的，中国人民不願意并且也不会服从外国强盗的法律的。"①历史完全証实了斯大林同志这一論断。在华盛頓会議結束后不久，苏維埃国家便自远东区赶走了帝国主义的最后一支干涉軍队，并在1922年12月建立了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沿着社会主义建設的道路凱歌前进。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威力、地位和威信也一往直前地增長起来了。苏联的强大是对帝国主义奴役别国人民的华盛頓体系的致命打击。同时，过了不到三年，偉大的中国人民也在年青的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下展开了轟轟烈烈的反

① "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7卷，第99頁。

鉄拉克——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偉大先驅者

周清澍　吳乾兑　彭树智

1956年，印度人民紀念了波尔·甘加哈·鉄拉克誕生的一百周年。鉄拉克是爭取印度民族解放的杰出战士，是一位偉大的民主主义者和思想家。

鉄拉克于1856年7月23日生于馬哈拉什特的拉特納吉里地方，他的家庭属于高級“卡斯特”——婆罗門，可是在英国殖民者侵占馬哈拉什特之后已經破落了。

鉄拉克出生的环境和时代，对他后来的革命生活有了很大的影响。他出生的1856年，正是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前夕，而他的出生地馬哈拉什特也是富有反抗侵略光荣傳統的馬拉特人居住的地方。时代的激蕩和民族精神在鉄拉克幼小的心灵中孕育了未来偉大事业的幼芽。

鉄拉克在浦那受过高等語文和法律的教育。在学生时代，他对著名的革命英雄人物产生了敬仰，例如意大利的馬志尼和加里波的，馬拉特人的錫瓦基，都是他所欽慕的对象。在大学毕业前不久，他和他的朋友阿卡尔宣誓为祖国服务，拒絕担任殖民政府机关中的任何职务。而在当时，凡是到大学求学的青年，几乎都把弄到一官半职看作求之不得的事。为了从自己祖国悠久的文化中尋求力量，鉄拉克还很好地研究了梵文，以便能够順利地閱讀吠陀經典和古代印度文艺作品的眞本。

大学毕业以后，也就是十九世紀最后的二十年內，鉄拉克开始了他初期的革命活动。这时他主要的活动范圍是他的家乡馬哈拉什特，主要的工作是进行爱国主义宣傳，努力喚起具有光荣历史傳統的馬拉特人的民族自豪感，揭露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罪恶。同时他也开始了初步的群众組織工作。

1880年，鉄拉克在法科毕业以后，和他的朋友在浦那創办了一所独立的中等学校，他們以宣傳祖国独立的精神教育青年。这所学校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培养了一批新干部。同时，他用本民族語言——馬拉特文出版了“獅报”和“馬拉特杂志”。尽管殖民政府有着苛刻的檢查制度，鉄拉克仍然利用了这些刊物，揭露了英国殖民統治給印度人民帶来的灾难，他对殖民者横行霸道的罪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教导人民，不要对殖民統治者抱有幻想，不要想从祈求他們的施舍来改善自己的境遇，而是要和他們进行斗爭。这些报刊很快就成了西印度民族集团最有威信的机关刊物了。

1885年，全印国民大会成立了。鉄拉克馬上就积极参加了它的活动，同时，他也参加了由經济学家和馬拉特民族領袖之一馬哈德夫·戈文达·兰那德在浦那建立的教育組織——“薩瓦詹尼克·薩勃哈”(Sarvarjanic Sabha)。1889年，鉄拉克被选为国民大会条款委員会的委員。

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鉄拉克的世界觀和政治信仰的基本特征已經形成了。他逐漸摒弃了“溫和的”民族主义的綱領，这些綱領要印度掌握西方的教育，

帝反封建的大革命运动，这样便严重地动搖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統治。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在华盛頓会議后不仅沒有“消除”，而且反而日益尖銳地发展起来了。美、英两国夺取世界霸权的矛盾仍然是帝国主义間的主要矛盾。美、日两国为了爭夺远东和太平洋的霸权，在华盛頓会議后不久就違反了四国条約，在太平洋地区建設一系列的軍事基地。英、日之間爭取中国和东南亚市場的斗爭也日益激烈化。各帝国主义、特别是美、日帝国主义爭夺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統治权的斗爭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它們之間的尖銳冲突，从而破坏它們親自制造的华盛頓体系。1931年9月，日本出兵侵占了中国东北，在远东建立起了一个战爭策源地，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为华盛頓体系敲响了丧鐘。由于美、英和日本之間矛盾的尖銳发展，終于导致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爭的爆发，这就最后徹底地毁灭了华盛頓体系。以苏联为首的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战爭的胜利和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远东以及全世界的面貌，从而永远地結束了帝国主义对中国和对亚洲人民为所欲为的殖民主义統治时代。

使印度和英国资产阶級文化結合起来，并且实行个别的。首先是生活习慣上的改革。在这些民族主义者看来，这些改革就能够把印度引向独立发展的道路。鉄拉克認为，在英国殖民統治的条件下，印度人地位的任何实际改善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殖民主义是印度进步道路上的基本障碍。他引用了一句馬拉特的俗語来說明他的看法："为什么馬儿不跑了？为什么蒟醬叶腐爛了？为什么面包发霉了？对这些問題只有一个回答：因为缺乏运动。叶子需要翻轉而面包需要移动，如果把馬儿牽出来，牠就不会再止步不前了。我們有不滿的根源，因为我們沒有任何权力，沒有自治的主权。"①鉄拉克由此得出結論：只有独立了的印度才可能順利发展。他估計到，殖民政府实施生活一类的改革，只会給他們造成干涉印度社会事务的借口，从而也只可能加深印度国内的糾紛和破坏印度的团結。鉄拉克提出：除了宣傳教育活动，还应采取斗爭的方式。在斗爭中，有文化教养的阶級必須依靠人民群众才能获得力量。在以后的活动中，他也眞正竭力貫徹了这一思想。

鉄拉克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不可避免地与"溫和的"民族主义者发生原則的分歧。1895年，鉄拉克及其同志掌握了"薩瓦詹尼克·薩勃哈"的領导权，而把"溫和的"民族主义者驅逐出这一組織。

在国民大会內部也是如此。自由資产阶級和地主的代表們只提出一些局部改良的要求。鉄拉克嘲笑他們的特点是"請願、抗議和諂媚"。鉄拉克所提出的徹底反对英国殖民統治的政治思想，正好和妥协派的主張是一个鮮明的对比。他的主張得到进步人士的支持。因此，在国民大会內部就出現兩个对立的派别：自由資产阶級、地主的"溫和派"和鉄拉克等小資产阶級的"极端派"。

1895——1905年这十年中，鉄拉克开始了政治活动的新阶段。他轉向与殖民制度进行公开的斗爭，而且把人民群众吸引到斗爭中来。鉄拉克及其同志用民族意識、宗教感情和爱国的傳統来鼓动群众。1895年起，他发起重新修建錫瓦基的陵墓，而且也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庆祝錫瓦基的群众紀念大会。錫瓦基是馬拉特人民反抗莫臥儿异族統治斗爭的領袖和独立的馬拉特国家的奠基者。鉄拉克曾經不止一次地号召人民学习錫瓦基反抗侵略者的斗爭精神。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神并沒有把印度永远交給外国人統治，錫瓦基就曾努力把故土从外国人的統治下解放出来。""以他作为榜样吧，突破英国法律那些可憐的限制吧，学习我們偉大民族英雄的榜样吧。"为了更广泛地团結具有爱国情緒的青年，他还組織了一些体育协会的組織，这些組織把鍛煉身体和政治教育結合起来，馬拉特的青年在这里受到了初步的軍事訓練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陶冶。此外，他也广泛地利用印度人民的宗教情緒，反对一切习俗的改革，把印度的古代理想化，不加批判地攻击西方文化。当然，这显然是落后的表現。可是我們也"必須認識那構成这些宗教形式之基础的民族爱国的目的。……在帝国主义严厉地鎮压一切直接的政治运动与組織的情形下，在民族运动还沒有达到任何群众基础的时候，利用这种形式是不无理由的"②。

1896年，鉄拉克被选入孟买的立法委員会。他利用这一个卡通式的講台，进行了反对殖民制度的斗爭。

鉄拉克也想把国民大会引向更为激进的方向，在同年十二届年会上，他对殖民政府加以猛烈的攻击。在关于地方賦稅的演說中，把英国殖民当局掠夺印度人民的醜恶本質加以无情的揭露，他指出："最高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协議，就像放蕩的丈夫和他的妻子之間的协議一样，当前者放任他一切放肆行为时，他却要求他妻子所有的东西。"③因此，他認为要革新任何弊端，首先得推翻殖民統治。

1896——1897年，印度发生飢饉，接着黑死病也蔓延起来。殖民政府出动警察胡乱抓走所謂"嫌疑病人"，到处搜查，整批农村被燒掉。这必然引起人民的不滿。鉄拉克在1897年5月4日的"獅报"新聞欄中，强烈地斥責这种暴行，認为这是政府鎮压人民的一种借口。在以后几个月中，他繼續通过"獅报"发表了鼓励人民为恢复祖国的独立而斗爭。

鉄拉克不仅在报刊上、講台上激烈地发表反对殖民統治的言論，而且也开始了組織群众的活动。他所領导的"极端派"和工人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們把恢复祖国独立的口号带到了孟买的工厂区和国內其他工业中心，同时也到馬拉特的茅舍里进行反对殖民压迫的宣傳。在1896——1897年这次飢荒中，孟买几个区的农民在鉄拉克的号召下，宣布抵制英国殖民者，拒絕繳納地租。

鉄拉克的活动，引起了殖民政府的恐慌。恰好当时发生了殖民官吏兰特被刺事件，这个人因在"防止

---

① Pradhon, India's Struggle for Swaraj. 第81頁，轉引自 А. М. Дьяков: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и Английский империализм в индии，第11頁。

② 杜德著，黄季方譯："今日印度"下册，世界知識社1957年版，第44頁。

③ Dr. Pattabhi Sitaramayya, The History of 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Vol .I, P.94. 1946年孟买版。

瘟疫"时的胡作非为，被兩个大学生（兄弟）暗杀了。于是这就成为殖民政府迫害鉄拉克的借口。尽管鉄拉克声明他反对采用个人恐怖手段，而且說他与这次暗杀行为无关，可是殖民政府仍將他逮捕并提交法庭审判。他被控告为鼓动敌視現存政权。鉄拉克只簡單地要求在法庭上宣布他的"犯罪"事实，因为殖民政府所控告他"犯罪"的材料都是假的，不是他自己所写的东西。对于所有的詢問，他断然拒絕回答，他指出："我的生活面临着这样的阶段，当我們不是自己唯一的主人时，只能作为我們同胞的代表而活动。"①他冷冷地說完了他要講的話，勇敢地走进了监獄。法庭判决了鉄拉克六年徒刑。但是鉄窗的生活并沒有能够摧毁他的意志，在监獄中，他繼續对古代吠陀經典进行研究，并完成了兩部有名的著作："猎戶星座——吠陀著作时代的研究"和"吠陀經中的北極之乡"。这些著作得到国內外科学界的承認。以馬克斯·繆斯为首的一些英国梵文学者开始爭取减輕对鉄拉克判决的运动。印度国內爭取釋放鉄拉克的运动也有广泛規模。結果鉄拉克的徒刑縮减了一年半。1898年9月6日英国殖民当局又被迫將他提前釋放（1897年9月14日入獄）。鉄拉克提前釋放的消息傳出后，孟买的工人阶級举行了一万多人的盛大游行。这是印度无产阶級第一次的政治发动。

鉄拉克出獄后，立刻又投入了新的战斗中去。"獅报"的銷售額增加了。反对"溫和派"的斗爭也加强了。

印度1905——1908年革命高潮的到来，鉄拉克也随着开始了他政治活动的新阶段。这次革命高漲是国內外环境所准备好的。日俄战爭中亞洲人第一次战胜了欧洲的强国，特别是俄国1905年革命的影响，促进了印度人民的覚醒。印度的民族資本发展速度加快了，但殖民剝削也加强了，民族自覚和全民对殖民專制的憤懣更加迅速地增長起来了。在副王寇松的統治年代中（1899——1905年），实施了一系列新的政治、經济、文化的反动措施，目的是更加巩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陣地，加强对印度的剝削，尤其是1905年10月16日孟加拉省分割案，更露骨地表現出寇松企图分裂和扑灭民族运动的目的，以致成为这次解放运动高潮的导火綫。

当革命高潮到来以后，以鉄拉克为首的"极端派"更加积极地活动起来。1905年8月7日，他們促成国民大会宣布支持抵制英貨的运动。1906年在加尔各答的国大党常会上，由于"极端派"的堅持，通过了司瓦拉吉（自治）、司瓦德希（自产）、抵制英貨和民族教育四大綱領。自由資产阶級因为受到英国資本的排挤，所以从自己經济利益考虑出发，也同意了这个綱領。但鉄拉克对这个綱領作了进一步的解釋，他把自治理解为完全独立，他主張扩大国大党的基础和影响，主張派代表团到农村中去，向农民解釋国民大会党的綱領②。

群众性和自覚性的增長，是这次高潮最显著的特点。抵制英国的紡織商品、监視販卖这些商品的商店、举行群众大会、游行示威等斗爭形式时常出現。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总罢业——哈塔尔（Hartal），在罢工时，大小工厂的工作停止了，市場和商店、办事处和交易所关了門，以致引起了一时生活上的暫时麻痺。妇女也参加了斗爭。大中学生也起了很大作用。

站在堅决反对殖民主义立場的定期报刊（特别是用印度文字发行的），在这时期的影响更为显著。像鉄拉克的"獅报"等享有声誉的报紙，常常拿到街头和广場上朗讀，許多文盲也从这里得到他們希望知道的新聞。随着利用地方語报章和政治活动，鉄拉克和"极端派"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在民族解放运动的进程中，群众已經革命化了，常常超出了抵制和其他非暴力斗爭的范圍。1907年5月，在旁遮普的拉华尔平迪，1908年春季和夏季在印度南方的廷涅維利、土梯科林、特里凡德勒姆，都发生了地方性的起义。无产阶級和农民群众都参加了这些发动，群众的发动嚇倒了印度的地主和大資产阶級，他們开始退却了。

1907年在苏拉特的国大党常会上，"溫和派"和"极端派"之間发生了公开的分裂。"溫和派"要求拋弃去年加尔各答大会所通过的决議，而"极端派"表示要堅决到底。"溫和派"利用大会的多数通过了以"殖民地自治"代替像"在自治領和宗主国本国"一样的自治，停止抵制，与政府的改革合作等。爭执到最后双方在会場上徒手搏斗起来。在警察的帮助下，"极端派"被逐出会場。

"极端派"退出国民大会后，当天就另成立了新党。在成立大会上，鉄拉克提出了新的策略：不仅要扩大抵制，而且还要組織群众，进行反对現在政权的运动。他使用公开的破坏（虽然是非暴力的）英国法律的办法。他認为斗爭的和平方式在現在的条件下是最有效的，这种方式統称为"消极抵抗"，在这一点上，鉄拉克是甘地的先行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甘地应用国民的群众性非暴力抵抗或不合作策略，把它

① Dr. Pattabhi Sitaramayya，前引書，Vol. I，P.98.

② G.D.Ress，India，1910年版，第228頁。

当作争取印度独立的基本手段。鉄拉克在1908年5月12日“獅报”上发表了一篇名叫“不幸的祖国”的文章，他認为有些人想用遞交請願書的方法达到自由是不可能的，他用句俗話作比喻：“当沒有捏着鼻子的时候，口是不会張开的”，所以民族主义的政党的“見解及目标应当明确的表达出来，并遵循着消极抵抗的步驟是可能达到的”。但是鉄拉克与甘地不同，他把非暴力斗爭并不看作宗教的信条，也不因此拒絕承認其他的斗爭方式。当时印度人甚至連防御野兽的火器都沒有的时候，而殖民主义者手中有現代組織和武裝精良的軍队，在时机还不成熟的时候，他宁願采取消极抵抗。但是他表示了堅定的信念：“革命这一时刻在印度还沒有开始。但是在將来要到来的。”因此，他确信要取得胜利是要用暴力，1908年5月12日在“獅报”上另一篇文章中，鉄拉克指出1649年英国革命的例子是爭取印度的司瓦拉吉的激进方式。他也援引了俄国和法国革命的例子。

鉄拉克建立了新的民族主义者的政党之后，他的革命活动有了更大的規模。殖民政府認識到，要扑灭民族解放运动就必需除掉鉄拉克。正如克尔卡所說：“任何鎮压的运动不能算是完成了，如果它沒有扩及到新党所公認的領袖鉄拉克的話。”①

1908年4月30日晚，发生了一次謀杀英国官吏的事件。鉄拉克在5月12日和6月9日的“獅报”上連續发表了对这件事情的評論文章，他認为：“暗杀事件是由于迫害和拒絕給印度人以自治的結果。炸彈就是回答。”②这篇文章，就成了英国殖民者迫害鉄拉克的借口。他們首先逮捕的不是暗杀活动的組織者而是鉄拉克，并以反政府宣傳和陰謀暴动的罪名提交孟买最高法院审判。

审判自7月13日开始，一共进行了六天，他拒絕任何律师和辯护人，而发表了長达二十一小时十分的長篇演說。他反对殖民者的鎮压手段，堅持人民进行暴力斗爭是自己的权利，俄国駐孟买領事（他列席旁听）給彼得堡的报告中写道：“他几乎常常超出了自己辯护的范圍，而轉向激烈地反对印度現存的制度。”③他声明說：“不管陪审官的判决怎样，我認为我是无罪的”，并且确信“由于我受苦而失去自由，我提出的主張，更可能得到成功。”④象1897年一样，法庭选擇了一些陪审員，保証英国人的多数，結果他被判处服苦役六年。

許多城市（如浦那、馬德拉斯）都发生了群众性的抗議运动。1908年7月23日到28日孟买的革命事变中，这一运动达到了最高点。从7月13日开始审判鉄拉克那天起，孟买已开始了声援鉄拉克的罢工运动和憤怒的街头示威。到了7月23日已发展为十万孟买无产阶級对迫害鉄拉克抗議的总罢工。城市居民（包括中小資产阶級）也支持罢工，通过决議，以一天总罢工来回答面临着鉄拉克的每一年徒刑，結果形成了一切生活普遍停頓。殖民政府动員警察和正規軍进行鎮压，沒有任何武器的工人，用石头木棍展开了街壘战进行还击。迫害并沒有摧毁鉄拉克在人民中的威信，連英国人自己也承認，鉄拉克由党的領袖变成了群众贊美的英雄。在孟买的街头上，横过街道挂着巨幅的鉄拉克的黑色画象，并且写着“偉大的鉄拉克万岁！”的口号⑤。鉄拉克的精神不仅激励了孟买的群众，而且鼓舞了其它各地，甚至是僑居国外的印度人。賈·尼赫鲁曾回忆說：“关于鉄拉克的活动以及他判罪的消息……使我們在欧洲的印度人都感到激动。我們差不多沒有例外全都是鉄拉克派。”⑥

列宁指出了1908年孟买7月革命事件的卓越意义：“可是，在印度开始起来拥护自己的作家及政治領袖的有游行示威的群众，英国强盗对印度民主派鉄拉克下了卑鄙的判决（他被判处長期充軍），而且近日英国众議院內的質問已經查明，印籍陪审員曾替被告人辯护，而罪狀是由英籍陪审員表决宣布的；——資本家走狗向民主派的这种复仇，引起了孟买的游行与罢工。在印度无产阶級也已发育到有覺悟的群众政治斗爭了——既是这样，在印度的英俄制度已經沒有長期存在底前途了。”⑦

鉄拉克在自己的活动中認識到个人恐怖不是解放印度的办法。他能依靠工人和农民，他能用爭取自治和把政权从外国殖民者手中轉到印度人民代表手中的一般性民主口号，喚起人民群众积极地参加斗爭。他的主要功績就在这里。

可是，他也有一些缺点。他根本忽略了对工农群众阶級意識的啓发并喚起他們进行阶級斗爭。当时在孟买的罢工中，在拉华尔平迪的工农运动中，以及在南印度的起义中，都出現了罢工和公开起义的斗爭方

---

① N.S.Kelker, Landmarks in Lakomanya's Life, P.144. Madras, 1924.

②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 Ⅵ. P.533.

③ А.В.Райков, Новые данные о Б. Г. Тилаке, 載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56年11期。

④ Dr.Pattabhi Sitaramyya, 前引書, Vol.I, 第98頁。

⑤ 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 стран Зарубежного Востока, Ⅱ, 第289——290頁。

⑥ “尼赫魯自傳”，世界知識社1956年版，第24頁。

⑦ “列宁文集”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97頁。

式，但是，鉄拉克虽是主張暴力斗爭和重視吸收工农群众参加斗爭，却沒有在此时关心他們的阶級利益和組織他們。其次，在他著作中从来沒有注意到对这次高潮中的斗爭經驗加以总結。最后，他对个人恐怖对群众革命主动性的发展和組織的危害性估計不足，而肯定这种无效的斗爭方法总比对英国殖民者保持順从要好。

工人和农民的发动，并沒有达到釋放鉄拉克的目的，但苦役被改为徒刑。鉄拉克的被捕，使年輕的政党失去唯一权威的領袖。这样，这个阶級成份复杂、組織涣散而又与群众缺乏联系的政党，在革命低潮到来时，終于在警察的压力下瓦解了。

鉄拉克被囚于曼德勒的监獄里，直到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前一个月徒刑期滿出獄。从此直到他逝世为止，是他活动的最后一个阶段。

鉄拉克这一时期的活动着重注意在他所提出的三条綱領上：（一）国大党內部的和解；（二）再組織民族主义政党；（三）着手加强地方自治运动。

鉄拉克終于促成了国大党的和解并参加了1916年勒克瑙大会。这次大会也是国大党和回教联盟团結的大会。会上决定以“在帝国內与自主的自治領享受同等地位的一員”作为共同目标。同年四月他又建立了一个“印度地方自治同盟”。

殖民政府仍把他看作危險人物，限制他的活动与旅行自由，規定不經地方長官許可不得发表演說。鉄拉克在大战中的政治表現是向后退了一步，他想用在战爭中为英国效劳爭取印度自治。他向英国殖民当局表示願意为其募兵捐款。

可以看出：他这时放弃了过去与殖民制度坚决斗爭的革命方式。

大战以后的事实，使鉄拉克的幻想破灭了，而1917年偉大的俄国十月革命，也直接影响了印度和鉄拉克本人。道威尔写道：“由于俄国革命，大大加强了这种希望，一些俄国領袖們的思想被认为是最好的思想。”“現在沙皇政府的崩潰，鼓舞了极端派的希望，即同样的命运等待着印度政府。鉄拉克还活着，还怀着与他早期猛烈反对不列顚印度統治的希望。”①鉄拉克热烈地欢迎十月革命。1918 年他从倫敦回国后，对組織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感到兴趣。他主張把属于英国人的鉄路和其他企业国有化②。而且也糾正了早期的宗教偏見。誠然，他在对取得自治的方式上，还是不够坚決的③。

1920年8月1日，当印度的革命高潮又一次到来的时候，鉄拉克沒有来得及参加这次运动，就在孟买与世長辞了。

鉄拉克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卓越領袖，是为爭取全民族和一般民主要求而奋不顾身的战士，他是最先举起印度独立的旗帜的人，并且号召人民为民族自由、为夺取政权而斗爭。他一生的活动表明：他无愧乎“新时代的眞正象征”④的称号。

鉄拉克在印度人民中留下了深長的影响。在馬哈拉什特，鉄拉克的追随者所組成的民主派小組，后来都成了共产主义小組的成員。而国大党的年青一代，也大多受到鉄拉克的影响，所以賈·尼赫魯說：“鉄拉克陶冶了我国兩代人民的思想，因而影响了千百万印度人。”⑤

印度共产党机关刊物“新紀元”为紀念鉄拉克而写的社論中对鉄拉克的活动作出了很高的評价，肯定：“这些反抗外国統治的英勇事迹已成为我国偉大人民所繼承下来的共同財产。”⑥

（本文主要参考 И·М·莱斯涅耳：“杰出的印度爱国者和民主主义者——波尔·甘加哈·鉄拉克”一文，載“苏維埃东方学”1956年第四期。出自此文之处，未另詳注。）

---

① H.H.Dodwell, India, PartⅡ, P. 217。
② 見苏联大百科全書 Тилак条。
③ Dr.Pattabhi Sitaramayya 前引書，Vol I，第192——194頁，1929年四月鉄拉克發表的宣言。
④ 賈·尼赫魯著，齐文譯：“印度的發現”，世界知識社1956年版，第465頁。
⑤ 賈·尼赫魯在鉄拉克誕生一百周年的紀念詞，1956年7月24日“人民日报”。
⑥ New Age Weekly，1956年7月23日社論 Lokmanya Tilak

教学問題

認真學習和貫徹厚今薄古的方針

我們学习"厚今薄古"方針的一些体会

北京一〇一中历史教研組

陈伯达同志3月10日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員会第五次会議上，所作的关于"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講話，不仅是对革新科学研究和高等学校的教学现狀的重要指示，对于我們中学历史教学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我們也很关心这一問題，我們認为在中学历史教学中貫徹厚今薄古的方針，自然会关系到課程安排問題。例如，本屆高三毕业生曾用了102課时学习远古至鴉片战爭的历史，而五四运动到現在这一段历史，正如教学大綱草案初稿所說的是全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段，但却仅仅学习33課时，社会主义革命部分根本沒有，这样的安排，对厚今薄古方針的貫徹是不太相宜的。厚今薄古須从詳今略古体現出来，忽略了一定数量上的表达，厚今薄古就会缺乏实际的內容。不过这是应由課本編者統一考慮的問題。作为中学历史教师，在教学中如何貫徹厚今薄古的方針，使历史課为現实服务，为当前的政治斗爭和生产建設服务，使"古"为"今"用，則是每个人都必須考慮的問題。

根据上述粗淺的体会，我們对自己几年来的教学工作作了初步的檢查。虽然过去在联系实际、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做了不少的努力，但还存在着很多問題：

第一，在教学中有詳古略今的傾向。把古代的东西講得很詳細，甚至不顧学生的水平旁征博引。現代的东西，有时三节幷两节按照課本一掠而过，講得簡略而不生动。思想上有些喜古怀古，对于現代的一些轟轟烈烈的斗爭，表面上感到偉大光輝，但却認为沒有更多可講的，同时感到談古代可显示自己学問淵博，現代好多事情一般人都知道，不願再詳細描繪。自然也是由于古代史有整理得比較現成的材料，越接近現在就越需从报紙杂志上去搜集整理，工作一忙，就不願在这方面花更多的时間了。

例如，在初一講汉武帝对匈奴的战爭时，講得非常詳細（当然講古代史时恰当地补充一些資料还是必要的），把三次大战役的进軍路綫杀俘人数一一介紹給同学，把战爭性質、意义、胜利原因都詳加分析。还把霍去病以二十多岁的青年指揮如此大規模的战爭幷取得胜利，倍加贊揚；幷談到他不以此自滿，当汉武帝想給他修府第时，他說"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显示其难能可貴；甚而进一步談到他24岁就死了，武帝为紀念他筑其墓成祁連山狀，至今仍屹立于陝西武帝茂陵旁边。教师講得精神貫注，学生听得眉飞色舞感嘆不絕。在初二講偉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时，虽然知道这一战爭与汉武帝伐匈奴二者的現实意义孰重孰輕，但講起来就不是那样具体，对許多英雄人物，对許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只是一提而过。

又如，講六朝文学部分时，給学生講起"六朝文絜"，講謝庄"月賦"，事前写好"………若夫气霽

地表，云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脫，菊散芳于山椒，雁流哀而江瀨，升清质之悠悠，降澂輝之藹藹……”。对这种描写笔法大加贊賞，謂其清空澈骨，穆然可怀。講革命文学部分时，对更具有現实意义的郭沫若的“女神”等却一提而过，这些脫离現实脫离政治的傾向，是厚古薄今思想的具体表现之一。

第二，在教学中有引导同学追求資产阶級趣味主义的傾向，不全是从正面积极地教育学生重視历史課的学习，有时是从个人兴趣出发講一些与課本中心內容无关且无現实意义的东西，用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

例如，講述明末农民战争时，根据教学目的应着重講述农民起义的原因、均田免賦的斗爭綱領及农民軍胜利的原因。教材內容較多，不可能把全部細节都加講述。但为了增加学生的兴趣，却引用了“两般秋雨菴随笔”中叙述的，当李自成起兵后，崇禎帝命太监至市肆卜問吉凶，先测“友”字，謂“反”字已出头；又“測”有”字，謂大明江山已失去一半；又测“酉”字，謂至“尊”已失掉头脚。这一故事虽博得同学一笑，也对封建統治者的迷信思想加以批判，但其結果却影响了时間，影响了教学目的的貫徹。使学生认为学习历史課是为了多知道一些故事，反而忽視了学习历史的主要任务。

第三，叙述史实多，分析論述少，分析常是就事論事，联系实际少，未賦予現实意义。

在备課的时候，主要精力放在史实的搜集、整理、安排方面，至于对这些史实怎样解釋、分析、評价、批判就考虑得少，講課时也是用大部时間进行史实的叙述，分析評价則較簡单概括，很难使学生深刻認識徹底領会。而这种分析論述又很少联系現实，使学生感覚不到它有甚么現实意义，所以有些学生就感到学历史好象沒有多大用处。

例如：講明初农业生产的恢复时，只是按照課本所提“……經过二十多年，全国共开塘堰四万多处……对于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来講，在有些班就沒有很好地联系当前我国亿万劳动人民动員起来兴修水利的奇迹。其实如簡要地提一下“1951年——1957年，七年中，在共产党領导下中国人民在水利工程方面所挖的土石方和所澆灌的混凝土，相当于四十座万里长城”，这就更容易使学生了解：过去在封建統治下，劳动人民曾以自己的双手在水利建設方面做出了那样的成績，推动了社会經济的发展；今天在共产党的領导下做了社会的和大自然的主人，劳动积极性和創造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揮，就必然会創造出前所未有的奇迹。这样会使同学既体会到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同时也就更具体地体会到社会主义的可爱，并受到极大的鼓舞。

第四，从教学方法上，也沒有通过思考题和課堂討論等形式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識認識目前問題的能力。复习题只是为当堂的历史知識服务，必要的課堂討論还沒有采取过。

上述現象虽不能完全代表我組的教学情况，但确是相当普遍的問題。产生上述現象的根源，是由于立場問題还沒有徹底解决，革命情感还不够濃厚，从理論上虽然知道教学应为当前的政治斗爭和生产建設服务，但由於受旧的思想意識、思想方法、思想感情的局限，实际表現仍然在相当程度上是为教学而教学，逃避現实脫离政治，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教学态度。

我們認为要在今后教学中更好地貫徹厚今薄古的方針，必須兴无灭資徹底改造思想，从根本上轉变立場、观点和方法，成为眞正的工人阶級知識分子，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要認清国家和人民对我們的要求，密切关心社会主义建設的偉大成就，更好地貫徹教育方針，使教学和社会主义現实生活密切結合，更好地为它服务。

我們計划本着边干边学的精神，在两年內系統地学习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使自己能够更正确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分析历史事实，評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通过历史教学使学生能够更清楚地認識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知道今日中国和今日世界的由来，从而更了解今日应走的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使学生从历史課中获得阶級斗爭的教育，获得鍛煉和鼓舞，加强学生为社会主义建設貢献自己一切力量的决心和信心。

同时我們也准备系統地学习、积累和运用报紙杂志上的材料，从这里了解当前国际国內的重大問題和科学研究成果，使自己首先不脫离現实，給教学的不脫离現实准备条件。通过定期的教研組会研究哪些重大問題可以也应該反映到哪一部分教学中去，并計划从几种主要报刊上剪下有关材料，粘貼成冊，供今后教学使用。

我們也准备通过教研組会探討研究某些历史事实应該怎样賦予它以現实意义，怎样使对該历史事实的論述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今天服务。

我們想到的还很少，这样是不是合适，还需要进一步摸索。

根据"厚今薄古"的精神，檢查我們的教学

北京二十八中历史教研組

陈伯达同志提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方針，是十分正确而及时的。"厚今薄古"还是"厚古薄今"不仅是历史科学研究，也是历史教学中两条路綫的斗爭。我們历史教研組的同志們，过去在教学中正視这两条路綫的斗爭是不够的，而且或多或少地有着"厚古薄今"的傾向。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第一，我們对历史教学的目的性不够明确，沒有坚决貫徹教学为当前的政治斗爭和生产斗爭服务的方針。

我們有的同志講課时，謹小慎微，只講史实，不加分析；教科书和教学参考資料上有的則講，沒有的則不講，照本宣科，依样画葫芦。有的同志願意教古代史，不願意教近代現代史，認为古代史只要掌握史料，講課时多穿插些生动的小故事，就能博得学生們的好評。出了毛病，頂多也是史料上、学术上的問題。至于講近代現代史，講得不对头会犯政治性錯誤，犯不着。有时偶尔在課堂上也联系一下目前的政治斗爭和生产斗爭，不过是灵机一动，脫口而出，不是有計划有目的地去联系現实生活，也不把准备联系的問題写到教案上去。因此，教学上所表現出来的是鲁迅先生諷刺过的"关起門来成一統，管它春夏与秋冬"。举例来說，講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意义，沒有联系到去年十一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議所通过的两个宣言和两顆人造衛星上天这两件大事，沒有指出現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东风压倒西风"。講到苏联的几个五年計划时，沒有很好結合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設，沒有指出苏联五年計划的偉大成就給我們預示了美好的远景，提供了宝貴的經驗。批判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时，只批判过去的历史的东西，沒有进一步指出現代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危害性。在中国史中，講印刷术、火葯和罗盘針三大发明，不厭其煩地詳述其发明过程，而沒有着重分析它对中国及世界所起的偉大作用，从而指出我們今天应如何发揚祖先的頑强的創造精神。講"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有的同志只講过去北京的青年学生怎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沒有联系到今天北京的青年学生应該如何繼承和发揚前一輩的革命傳統，"与工农結合、为工农服务"，积极参加劳动鍛煉，为建設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总之，我們有些同志，只講过去，沒有或很少注意恰当地联系現实；是为死人服务，而不是为活人服务。即使是富有現实意义的史料，也变成了干巴巴的僵死的东西。

第二，处理史料时，不加揚弃，对沒落阶級的东西，思想上发生共鳴。

有些同志备課时，不是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著作作为首要的基本指导文件，却只注意搜集史料，遍翻"史記"、"資治通鑑"、"通鑒記事本末"等古书。而对于史料，又是不問精华与糟粕，就都搬上講堂，沉湎于宮廷逸聞、頹废的詩詞中，大发思古之幽情。举例来說，講宋詞时着重介紹了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和辛弃疾的"……如今識尽愁滋味，欲說还休。欲說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而对宋詞中悲憤雄壯，具有眞摯强烈的爱国感情的詞則不加引用。在世界史中，講罗馬后三雄之一安敦尼失敗时，詳細地叙述了他与埃及女王姑屡巴的爱情和姑屡巴的忠貞殉节。相反，安敦尼在地中海东岸对人民的殘酷統治和人民对他的憎恨，却描繪得很少。講到路易十六时，詳細地描述了他的宮廷生活：晴天喜欢打猎，雨天喜欢做鎖，开会喜欢打瞌睡。而对国王、貴族、僧侣如何殘酷剝削和压迫人民則相对地講得不够。有的同志錯誤地認为只有以上的一些东西才能引起学生对历史的兴趣，逗人乐。由于教师对沒落阶級的东西在思想上发生了共鳴，居然把"末代皇帝傳奇"等类作品也介紹給学生作为課外讀物了。

第三，忽視理論学习，不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历史現象、事件和人物。

我們有的同志备課中重史料，輕理論，认为只要把点点滴滴的史料揉合在一起，就可以了。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典著作，极少翻閱。甚至教世界近代現代史的同志，也沒有系統地学习过"共产党宣言"和"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底最高阶段"等著作。因此某些問題，特别是对历史人物的評价，不能完全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来加以分析，因襲了資产阶級的、甚至地主阶級的看法，无形中降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向学生散布了資产阶級个人崇拜的毒素。举例說，講到滿洲的兴起时，教师强調了努尔哈赤个人的作用，并认为他的才华和功績与爱讀"三国演义"和"水滸傳"大有关系，相反，对于女眞族人民怎样从艰苦的农耕、牧畜活动中，怎样与汉人的交往中，丰富了他們的經济生活，怎样掌握了煉鉄的技术，提高了生产，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等劳动人民的作用则是一語帶过。講到郑和下西洋时，强調了郑和及其随行者的作用，对于郑和七次远航的社会条件：經过农民起义后，明初的統治阶級被迫对人民有了让步，輕减了剝削，促使了社会經济的逐漸恢复，本来沒有人身自由的工匠得到了部分的解放，成为半自由的手工业者，刺激了手工业匠戶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手工业、包括造船业的发展，制造了精密的罗盘針等等。总之，由于人民群众的劳动和智慧提供了郑和远航的物質条件。教师对于这一切都沒有加以分析說明。講到太平天国后期，把一切革命的成就都归功于陈玉成和李秀成的英勇善战，赤心报国。而对太平天国后期的經济政治措施：在江浙一帶由于农民按时耕作，到处是"禾苗布帛，均出以时，士农工商，各安其业"的繁荣景象，和"曉諭四民向化，各安恒业"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对稳定当时社会秩序所起的积极作用等却很忽视。教师竟在教学中錯誤地删去了这一节教材。

只重史料，不重分析，只重視过去，不重視現实，不与目前的政治斗争和生产斗爭相結合，这种脫离現实的教学方法实际就是厚古薄今的思想反映。在課外也很少結合参观和調查研究乡土教材。全国最大的"中国古代史陈列室"、"中国近代史陈列室"，离我們学校近在咫尺，也不帶学生去参观，即或参观了，也是走馬观花，看过了事。事前旣不向学生說明参观的目的，事后也不作什么总結。特别是乡土教材，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起着重要作用的，北京是元明清等历代的都城，革命群众和統治者的斗爭的遺迹、傳說、紀念館是很多的，教师很可以作一些搜集和整理的工作来丰富教学，但过去我們也沒有重視。至于結合学生的思想实际来进行教育，更是罕見，我們大部分教师，对每班学生的名字，叫不出三分之一，更不要說了解他們的思想实际了。这种因襲过去，墨守成規的思想，挖其根源，不又是与"厚古薄今"的教育思想一脈相通的嗎？

我們为什么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厚古薄今"的資产阶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点呢？这与我們"两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书"的脫离政治、脫离現实生活的傾向是分不开的；这与我們只重視史料，忽視理論学习，特别是忽視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典著作的学习是分不开的；这与我們还存在着的資产阶級思想是分不开的。由于我們的阶級立場还沒有完全改造好，我們就不可能眞正地徹底地理解历史課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和历史課必須为当前的政治斗爭和生产斗爭服务的根本意义。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們向党交了心，徹底暴露了以上的腐朽的資产阶級教育思想和教育观点。我們认識到，过去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不完全符合毛主席指示我們把青年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求的。我們感到很沉痛，也很慚愧。今后我們一定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把紅旗插到我們历史教研組来，插到我們所教的每一堂課里去。我們认識到，要消除"厚古薄今"的教育思想，树立"厚今薄古"的教育思想，首先必須改造自己的立場，"兴无灭資"，堅决做一个工人阶級的知識分子。为此，我們要积极投入党和政府所号召的各項政治运动，努力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运用正确的立場、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历史教材。在教学中要做到理論联系实际，联系現实的政治斗爭和生产斗爭。我們要加强备課，相互学习，取長补短，发揮教研組的集体力量。我們已經把以上的努力方向訂到我們教研組的規划里面，并已訂出了每个人的执行計划。我們一定要堅决执行自己的計划。我們还希望得到全国中学历史教师同志們的帮助，进一步批判我們过去在教学中所存在的"厚古薄今"的思想，提高我們的认識，鞭策我們前进！

我們在教学工作中存在的"厚古薄今"問題

北京四中历史教研組

自从党指出学术界目前存在着严重的"厚古薄今"傾向以后，引起学术界很大的注意，正在展开热烈的討論。

我們四中历史組的同志們，最初認为这是学术研究工作上或高等学校教学上的問題，在中学历史教学里，并不存在这个問題。即或存在，問題也不大。理由是我們中学历史課程已經是詳今略古了。我們大多数中学教师都是根据教学大綱、課本进行教学的，根本不可能随便任自己厚薄來講課，也很少有人作专題研究工作，哪有什么厚薄的問題呢？如果說教材有厚古薄今問題，責任也不应由教师負。后經双反运动教师自我檢查和看到学生給我們貼出的大字报，我們才恍然大悟，認識到在我們的教学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厚古薄今"的問題，才进一步認識到"厚古薄今"并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問題，也不只是教材分配的分量多少問題，而重要的是沒有使"古为今用"，沒有使历史教学为今天的政治和生产服务，在教学的思想性方面存在很多的問題。

根据这个理解，檢查我們的教学工作，发現不仅存在"厚古薄今"問題，而且还是很严重的。

根据初步檢查，在我們的教研組中存在如下的一些問題：

（一）教学上存在的問題：

教师在备課时，大部的精力都放在搜集材料丰富教材內容，甚至考据一个不关緊要的名詞、地名和制度上，鉆牛角尖、标新立异，显示自己的学識淵博。为了"单于"的讀音爭得面紅耳赤，有人想尽方法考証平英团当时有几种旗帜。有人为了找磨盘山究竟在哪里，費了許多时間。而关于怎样进行思想教育、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联系今天社会現实生活的实际及怎样为今天的政治斗爭服务等，却缺乏深入的鉆研和进一步的考虑。每个人用于鉆研教材和鉆研思想教育的精力和时間是很不相称的。这还不是严重的"厚古薄今"么？

在課堂教学上，对于联系实际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問題，有些教师怕进行不好会犯錯誤，或因思想保守，不敢突破清規戒律，大胆地进行。有的老师錯誤地認为教材本身已經包含了思想性，只要講明白就是进行思想教育了。相反的，有人在課堂教学中却喜欢津津有味地講些宮闈瑣事，向学生介紹"末代皇帝傳奇"和"清宮瑣記"等含有毒素的书籍。有的人备課时考虑不够，在課堂上却灵机一动地乱联系实际，結果牽强附会，牛头不对馬嘴。效果当然不会好。有的老师不加分析批判地引用站在反动統治者立場所写的史料。

由于还沒有完全具有工人阶級的立場和思想感情，有些老师虽然进行了一些"思想教育"，但很教条化，甚而有时还发生相反的效果。如講工人运动，感情是輕視工人，語气是帶有諷刺性，虽然口里說了几句工人怎样英勇斗爭，也不可能培养学生的工人阶級情感。又如講李鴻章签訂卖国条約时，不是情緒憤慨，而是談笑风生。再如有的学生听了教师对唐太宗的講解，就感覚唐太宗非常偉大，忘記了他是一个封建統治者。有些教师虽然比較重視思想教育，但由于不了解学生的实际思想情况，往往是无的放矢，說教式地講一番道理，学生在思想上感受不深。

总之，解放以来，我們虽然学习过苏联的先进教学經驗和国內各报刊上所介紹的經驗，也曾不止一次地討論怎样进行思想教育，虽然也有过一些思想性比較强的課，但缺点还是很多，还严重地存在着"厚古薄今"的問題。

对学生的培养目标也存在着問題。每个人都知道我們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覚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但在实际工作中，如檢查、考試等，教师思想里总是单純注意学生掌握历史知識的情况，很少想学生从我們历史課的学习中思想覚悟提高了多少，也很少想到解决学生哪些实际思想問題。这就是說我們还沒有眞正做到"古为今用"。

（二）教师进修方面存在的問題：

中学历史教师从事专題研究的不算多，但也不是沒有問題。我們学校的教师在个人进修方面，很少有人願意研究現代史。有一个教师过去曾对中国近代史发生过兴趣，后来发現古代史冷門多，容易成名，便放弃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而轉到魏晋南北朝史方

面。有的教师一直教近代史，他却脱离現实教学需要选擇了宋史作为研究的目标，因为他听某教授說，宋史有“荒”可开，鉆冷門，容易成名。姑且不論他們的成績怎样，这种“厚古薄今”的傾向是严重的。

（三）教师在分配課程任务时所反映的問題：

在每年分配教师担任課程时，有的教师尽力爭取教中国古代史或世界古代史，不願意教近代史和現代史。原因是对古代史，学生知道的少，不致提出問題难倒自己，近代史現代史学生知道的多，恐怕学生知道自己不知道，学生問起来，丢面子。也有人認为近代史現代史政治性强，怕犯政治性的錯誤。古代史离現实远，犯了錯誤也只是学术上的問題，不致牽涉到政治問題上来。这些，都十足反映了脫离政治、“厚古薄今”的思想。

在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一日千里的今天，在党提出“厚今薄古”的号召和在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在通过整风运动思想覚悟提高的基础上，我們决心鼓足干勁、力爭上游，要使历史教学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服务。根据我們檢查出来的問題，初步提出几点努力的方向。

（一）要在历史教学中加强培养学生对于社会历史发展規律的認识，提高学生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設的信心。例如講原始共产主义时必須使学生明确它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区别。講資本主义时代的历史时，必須以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一条紅綫貫串起来，使学生眞正認识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也使学生确信資本主义必然死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一顚扑不破的眞理。

（二）要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教給学生分析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本領。例如，对汉武帝、唐太宗、拿破崙、彼得大帝等人应給以正确的評价，正确理解汉武帝伐匈奴、唐帝国的繁荣等問題，以免使学生造成一些錯覚：以为唐太宗、彼得大帝都是完美无缺的偉大人物；把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古代民族英雄和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人民英雄等量齐观。

（三）要在中国历史教学中，使学生眞正理解劳动人民的阶級斗爭和生产斗爭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动力。例如秦末农民战爭后出現了西汉初年的經济发展，隋末农民战爭后出現了唐初的經济繁荣，元末农民战爭后出現了明初的經济大发展。使学生正确地認识古代的創造发明都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的結晶，偉大的发明家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四）要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最近报紙上介紹的一些历史上偉大的創造者和发明家，是培养青年民族自豪感和鼓足干勁的有益教材，今后在教学中要加强这方面的教材，做到眞正使历史教学为政治斗爭服务，“古为今用”。

（五）要在历史教学中加强联系实际。在今天大跃进中，要敢想敢做，思想大解放，克服縮手縮脚的缺点，大胆地联系实际。

我們对“厚古薄今”思想的初步檢查

天津一中历史教研組

“厚今薄古”的方針提出后，我們理解得很簡单。肤淺地片面地認为“厚今薄古”不过是多研究些近代、現代史，少研究些古代史；多講些近代、現代史，少講些古代史，下学年在古代、近代、現代各門历史課的授課时間比重上由上級規定作点調整就行了。这是課本編者的事，与我們关系不大。对方針的实质沒有深入細致全面地思考。后来，我們看了范老的文章以及北京、上海等地史学界討論这个方針的报导，我們才逐步認识到“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乃是史学界中“兴无灭資”和“兴資灭无”两条路綫的斗爭。“言必三代”多研究多討論古代史，少研究少討論近代、現代史，只不过是“厚古薄今”表現的一个方面。历史教学中脫离政治、脫离生产、脫离实际则是“厚古薄今”的另一种表現。其阶級实质是一样的。“厚今薄古”是指导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根本方針。于是根据我們学习这个方針的体会对目前工作进行了初步檢查。

我們发覚我們“只管教书，不管教人”的資产阶級教学思想还是非常严重的。我們的历史教学工作并沒有很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教书而教书，为講历史而講历史，不能使历史为今服务，为現实服务，这实質上也是厚古薄今的一种思想反映。其具体表現

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单純堆积史料，为教历史而教历史，不重視政治思想教育。有的教师錯誤地認为課的好坏就在于教給学生的知識分量多少，未能很好地考虑教学目的，考虑运用这段史实使学生思想发生什么变化，使学生認識什么問題，使学生思維能力得到什么培养。因此在教課当中，旁征博引，形成摆史料，无分析；有教学，无目的的現象。如有的教师在講到五胡十六国这段教材时，把十六个国家建立、灭亡的演变过程叙述得很詳細，但对北方异族統治者制造民族糾紛，給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給生产帶来严重破坏，并未加以說明。又如教材本来已将有关魏晋"清談"的具体叙述部分删掉了，而教师在講述时，却詳細地介紹了几种"清談"，同时又把鍾会如何陷害阮籍，阮籍如何飲酒裝醉，描繪得淋漓尽致。可是对"清談"的阶級实質并未加以分析，更未进一步通过这段史实使学生認識到：所謂"不問"政治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謊言。

（二）从趣味出发，自由主义教学。有些教师在教課时，为了引起同学的"兴趣"，表現自己的学問淵博、講課內容"丰富""生动"，常抓住一个枝节問題，大加发揮。因此，有些学生虽然覺得历史課很有意思，但对学习历史的目的却不十分明确。比如教师講元末紅巾軍起义时，不着重闡明本質問題，而大講朱元璋如何投奔郭子兴。說朱元璋字国瑞，濠州人，1352年投奔郭子兴，郭子兴看朱元璋相貌出奇，令作九夫长（小头目），后并把养女嫁給他，因此提拔得很快。又如講中国近代史的戊戌政变，对改良派如何争取袁世凱，袁世凱如何向榮祿告密出卖改良派，都作了詳細具体的叙述，而对改良派脫离群众这一关鍵性問題，并未給以突出的分析。显然，这种教学是不能給同学以科学的正确的历史知識的，更沒有完成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教育任务。

（三）单純从教材角度出发，忽視对学生思想实际和現实政治斗爭的联系。有些教师錯誤地認为只要教师把历史知識講清，指出它的內在思想性、規律性，就会对学生有很大的教育意义。至于現实的政治斗爭則認为这是学生所熟知的一些事情，不必在这方面鉆研联系。正因为这种"講清历史規律就是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的片面認識还在支配着我們的教学，因此，教师在备課时，还不能一貫地自覺地把教材与当前的政治斗爭联系起来，在課堂教学中还是零敲碎打地进行思想教育，对学生的思想实际情况还沒有进行系統的搜集和掌握。偶然联系当前政治斗爭任务，也难免无的放矢。我們曾經发現这样的問題：部分学生曾在政治学习时拿近代史中的材料为維护其資产阶級思想影响的根据。在政治討論課上，有的同学說：不一定只是工人阶級才能掌握眞理，在地主阶級反对奴隶主时，地主阶級說的就是眞理；在資产阶級反封建的时候，資产阶級說的就是眞理。学生并引証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綱領作为例証。学生这样作当然有他自身的阶級影响，同时在認識上，对"进步"和"眞理"这两个概念也沒有完全搞清楚。但我們認为还有另外一个問題，即教师在講授"同盟会的成立和它的綱領"这段教材时，缺乏自覺的"兴无灭資"的思想，对同盟会的綱領只是依据教材闡述了資产阶級的局限性，事先沒有搜集学生的思想实际情况，在課堂教学中也沒有針对学生的思想实际进行講述，因而說服力很弱。如果教师具有通过历史教学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明确思想，情况就可能改观，与学生思想情况的結合必然很緊密，大大加强历史教学的战斗性，使历史課在思想教育这方面同样发揮生动、具体、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課程的作用。虽然一堂課并不一定能徹底解决某些学生存在的具体思想問題，但也不至于使学生把这段材料拿来作为維护其資产阶級思想影响的根据。相反，恰恰应該成为其他学生反駁其資产阶級思想的工具。

由于我們缺乏通过历史教学"兴无灭資"的自覺性，我們不但沒能把"古"为"今"用，甚至有些应該联系当前政治斗爭的地方，也常常被我們忽略了。比如，講述中国近代史"資本主义国家对中国鄰邦和中国的侵略"这一章时，应該很自然地跟現在亚洲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斗爭联系起来。使学生了解从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紀初，是世界資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資本主义国家展开了激烈的殖民地爭夺战，它們占領或控制了亚洲的許多地方，但是，現在有些地区的亚洲人民如中国、越南、朝鮮在其本国工人阶級政党領导下，已經战胜了侵略者，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有些地区也已經成为民族独立的国家。帝国主义虽然还控制着若干殘余据点，豢养着一小撮走狗，但最終胜利必将是属于亚洲人民的。又如講述世界現代史苏联社会主义建設过程时，本来应該很自然地联系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自覺地宣傳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但是由于教师还沒有徹底克服脫离政治的傾向，因而沒有能够自覺地联系起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任务也沒有很好地完成。

（四）陶醉于历史資料的积累，不重視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学习，把劳动群众的历史講成帝王将相的历史。一些教师平时积累材料，偏重史料，而对現实

生动材料——我国当前驚天动地的偉大社会主义建設的新奇迹，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成就，则很少考虑。教师陶醉于旧史料的积累，严重忽視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学习。有这种情况存在，就不能正确地分析史实，更不能培养学生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方法来分析历史事件和現实生活中的問題。比如，在古代史教学中曾經发現这样的問題：学生說岳飞就具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思想，沒有工人阶級的立場和人生观，也能做到“我为人人”。学生这样講当然有他的阶級根源，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教师在教学中沒有能够对历史人物予以正确評价。我組教师經过檢查，发現在講述岳飞抗金这段教材时，夸大了岳飞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过分地强調了岳飞行动符合人民要求的一面，而忽略了岳飞行动的阶級局限性。教师这样作，原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由于自己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不高，未能正确評价历史人物，因而获得的效果适得其反。又如在講述唐初經济恢复和发展这段史实时，教师沒有能够突出农民通过阶級斗爭迫使統治者让步的作用，也沒有能够突出农民的生产斗爭对經济恢复和发展的作用，更沒有揭露唐太宗让步政策的实质，而是侈談唐太宗的个人活动——如何納諫等等。这样給学生的印象将是：唐初經济的恢复和发展，不是由于劳动人民阶級斗爭和生产斗爭的推动，而是唐太宗这个封建統治者的英明政策措施的結果。

（五）頌古非今。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的立場問題如果沒有得到徹底解决，对教材的理解和講述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錯誤。比如我們有的教师在講述西汉經济繁荣富裕这段教材时，教师对課本所引用的“汉书”“食貨志”的一段（“七十年間，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尽滿而府庫余財。京师之錢，累百鉅万，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敗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大加发揮，并以“斗米三錢”来进一步說明西汉社会的“国富民安”。但对課本所提出的“但是农民的生活并不稳定。他們經常受到地方官吏的勒索，有时候还要遇到水旱灾荒。这样，有些农民就要借債。为了还債，他們不得不卖掉田宅，卖掉儿女”却只字不提。我們認为这样理解教材，显然跟教师的立場有关。这不仅不能坚定学生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反而使学生向往古代封建社会。

上述檢查，虽不能反映我們的全部情况，但也足以說明我們的資产阶級教学思想和学术思想还是非常严重的。有这种思想存在，当然就不可能一貫地自觉地从教育学生出发来深思熟虑地处理教材，并有力地运用教材来对学生进行深刻的政治思想教育。因此，我們进一步体会到教师自我思想改造的重要意义。我們的檢查还只是初步的，目前正在通过学生提意見的方式和教师間的互相批評，进一步搜集教学中所表現的資产阶級教学思想。我們决心徹底改造思想，轉換立場，拔掉白旗，插上紅旗。

批判陈恭祿先生的資产阶級反动历史観

——評"介紹中国近代史的几种基本史料"一文

許 埜 意

"历史教学"1957年第六期，刊載了陈恭祿先生所写的"介紹中国近代史的几种基本史料"一文。笔者讀后，感到作为近代史的基本史料介紹，如果从近代史的时間范圍来說，应从鴉片战爭到五四运动，或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該文偏重于太平天国革命以前的史料介紹，将以后近代史中的重大事件如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基本史料，却沒有作必要的介紹。从史料的內容上来看，应包括經济、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而該文只着重于政治方面的史料介紹。这篇文章所存在的問題，主要还并不在于这些方面，而在于該文只推崇封建朝廷的公文档案，輕視人民革命的史料；只推崇反动官僚的文集、日記、年譜等等，而忽視劳动人民阶級斗爭生产斗爭的史詩紀实。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虽也提出了史料有阶級性，对旧史料应批判地使用，但那只是貼了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标签，从本文所介紹的史料以及作者对这些史料的实际运用和解釋来看，却充分暴露了作者的資产阶級反动史观。这只要举一两个例子，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了。

例如，作者很推崇封建大臣們的奏摺，捧为第一手材料，按照作者在文章中关于所謂"原料"、"次料"的說法，这是"当事人的报告，比較最为可信"。为了証明这类史料的重要，作者在該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具体的例子："'史料旬刊'第三十五至三十九期刊載道光朝的密奏，是研究近代史极重要的資料。"这里我們就举作者所推崇的密奏——与鴉片战爭有关的耆英的密奏机宜摺为例，看看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可信"的史料。在"史料旬刊"第三十五期所載耆英的密奏中，曾說"不能御寇之由"乃在于"民情渙散"，他說："攘外必先安內………今之牧令，不理民事，不問疾苦，动輒与民为难，以致民情渙散。內不自安，何暇攘外。"他在密奏中提出了几条理由来說明"御寇之难"，其中有一条說："該夷以船載兵………长技在于大炮………用測远鏡窺定，高下远近，号令施放，故能发炮无不中。………我之炮力，本不如彼炮之致远，而船系活动之物………我炮施放，一出之后，彼炮已接踵而来，官兵容身无地，不及装葯再放，是彼炮可以連环接續，而我炮止有一出，发而不中，等諸无炮。"显然，耆英的說法乃是为統治者妥协投降政策所招致的失敗辯护，充分暴露了他的惧外的卑怯心理。

首先，耆英的"民情渙散"說就是站不住脚跟的。在腐敗的封建統治者对人民抗击侵略者的斗爭濫施阻撓的情况下，广东三元里平英团就曾抗击了英国侵略者。一百零三乡民众約一万人左右，自发地組織起来，在平英团的旗帜下，包圍了敌人，杀死了英国兵二、三百人，取得巨大的胜利，使义律知民气旺盛而不敢报复，以后也迫使英国侵略者不敢攻打广东。人民群众斥責义律說："尔旣妄夸利害，何以不敢在林大人任內攻打广东。"（見范文瀾"中国近代史"第73頁）这說明富于革命傳統的中国人民，在抗击英国侵略者时是无比英勇的，而不是耆英所說的"民情渙散"。耆英在自己的密奏中說，当时"牧令"是"不理民事，不問疾苦，动輒与民为难"，这多少还

是一点实話；他們对外妥协投降，对內无休止地剝削和压迫人民。就在义律被三元里人民圍困时，广州知府余保純还用欺騙威胁手段让人民放走了义律及敗兵。由此說明，中国人民是坚决抗英的；清統治者所謂"攘外必先安內"的屈膝投降路綫才招致了鴉片战爭的失敗。写这篇密奏的耆英，就是签訂第一个中英不平等条約——"南京条約"及第一个中美不平等条約——"望厦条約"的臭名昭著的投降派魁首，如果同意耆英密奏，就无异是对中国人民力量的輕視与誣蔑，对屈膝投降的卖国路綫的贊同。

其次，耆英夸大英国海軍实力的唯武器論，也是一切投降主义者的理論根据。我們知道，决定战爭的胜敗，其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武器只是諸因素之一，絕对不是决定战爭胜負的唯一因素。当时，英国侵略中国时已是資本主义制度，使用新式武器，固是有利的因素；但它却有許多不可克服的不利因素，如：战爭的非正义性，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兵力有限，补給綫太長；对中国陆地情况不熟悉，陆地作战不利于英国等等。当时中国的弱点是落后的封建国家，武器比不上英国，这是不利因素；但却具备着极其有利的因素，如：这个战爭是中国人民正义的战爭，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中国是个大国，人口多，具有雄厚的战斗潜力，有反抗外来侵略者的优良傳統；在本土作战，熟悉地形，以逸待劳等等。这些有利因素如"平英团"的抗英斗爭，林則徐的战守广东使敌人不敢再攻，就是明証。由于清政府統治者的腐朽及以琦善、耆英为首的一些投降派官僚的卖国活动，才使鴉片战爭失敗。陈先生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把鴉片战爭的失敗原因归結为"由于不知英国之情狀，海陆軍之实力，而自信太深，造成禍机，以致无法挽救也"（見該书第74頁）。这种說法，豈不是以耆英密奏所提供的論点为依据来为投降卖国者辯护嗎？

再举一个例子。陈先生对封建官僚的文集、日記、自傳等等是很推崇的，在他的"介紹中国近代史的几种基本史料"一文中，以相当篇幅介紹这类史料。为証明这类史料的重要，陈先生还举了"駱秉章自訂年譜"为例，他在該文中說："駱任监察御史，奉旨稽查戶部銀庫。庫官庫丁与商人勾結，收捐納銀有以六、七百两或四、五百两作一千两者，致庫銀亏短九百二十余万两。駱不收規禮，軍机大臣穆彰阿称为'超前絕后'。1843年，案发，历任庫官庫丁，各攤賠款。道光帝知駱廉洁，两次召見，称'积重难返，豈汝一人所能挽回？'攤賠仍須繳交。这可証明政治腐敗，已成不治之症。"从表面上看，这段話好象是在說清朝政治的腐敗；但实际上却同时是頌揚駱秉章。駱秉章曾經是清朝的高官，也是鎮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重要劊子手之一。对于查庫銀事，駱是甚为得意地以相当篇幅在年譜中作了自我表彰，所述皆表白自己的廉洁清高。可以証明清朝政治腐敗的史料是非常多的，为什么陈先生单单举出这个反动人物的年譜呢？并且为什么在叙述中对这个反动人物流露出如此深厚的同情之感呢？这样的反动人物，在他自己的年譜中頌揚自己、表白自己的材料会可靠嗎？

公文、密奏、日記、傳記、年譜是一种可以参考的資料，但必須以明确的工人阶級立場，分析批判地加以运用；如果站在反动資产阶級立場上，就必然为反动派辯护了。

从以上两个例子，我們就可以看出陈先生是站在什么立場上来介紹和运用史料的了。正由于陈先生認为"近代史的史料，以公文官书及士大夫記录为主"，輕視人民革命的斗爭史料，所以許多人民革命可歌可泣的重要史料，在陈先生的笔下，只是輕輕地滑过，或者根本沒有提到。例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最大的农民革命，該文虽也介紹了一些史料，但却沒有象介紹駱秉章那样的有声有色，而是輕描淡写地說："程演生編印的'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是从法国抄回的。商务印行的'太平天国詩文鈔'杂有后人的伪作"等等。对于与太平天国同时的北方捻軍革命活动的重要史料，对震动世界的义和团运动及辛亥革命的一些基本史料，都未介紹。对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領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陈先生的笔头下，簡直只字未提。

总而言之，在陈先生专門介紹中国近代史的几种基本史料的这篇文章中，除了介紹一些殘缺不全的、封建統治者所記录的反动史料外，几乎找不出有关人民革命的史料。文章宁肯歌頌封建反动人物（如駱秉章），介紹辱罵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反动地主李圭的"思痛記"，而不介紹人民歌頌革命的史詩。陈先生的史观不是資产阶級的反动史观又是什么呢？在这种反动史观的支配下，也必然是把反动大臣們的奏摺、士大夫的記录，奉为第一手材料（或称原料），当然也就不会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以阶級分析的方法批判地运用史料和介紹史料。而以这种資产阶級反动史观介紹史料，只会把讀者引向資产阶級学者所走的道路上去，因此我們也必須予以批判。

消息

天津市举办延安革命文物展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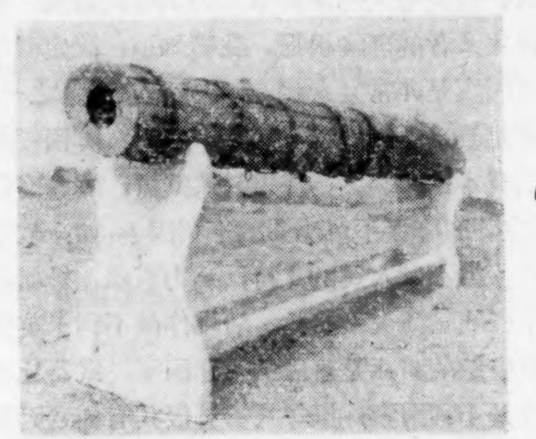
天津市历史博物館和延安革命紀念館，从今年5月20日开始，在天津联合举办了“延安革命文物展覽”。这是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展覽，它通过延安在革命斗爭中保留下来的一部分文物史料，反映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如何发揚了艰苦奋斗的光荣傳統，領导人民克服了各种困难，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展覽是由序幕和“武裝斗爭”、“生产建設”、“文化教育”、“干部生活”等几部分組成的。在序幕中，首先用延安市区模型，介紹了革命圣地延安的全貌。宝塔山、淸凉山、延河以及党中央和毛主席住过的楊家嶺、棗园、王家坪均历历在目，使人不禁想起当时的两句民謠：“宝塔山高延水清，毛主席和咱心連心。”展覽品中的一些实物，反映了陝北人民当时的血泪生活和对解放的渴望，在陈列的一件宣傳品（这是1935年从陝北烈士墓中挖出的）上印着紅軍战士們喜欢唱的歌曲：“富人吃得好，魚肉吃不了，組織淸乡軍，到处捉穷人。……要想翻起身，参加来革命。”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在毛主席領导下长征到达陝北，与陝北紅軍会师于吳旗，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胜利，从此以后，党中央和毛主席就在革命圣地延安領导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爭，經过抗日战爭和解放战爭，一直到胜利。这里陈列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到达陝北时的合影，初到陝北时的紅軍的照片，毛主席、彭德怀、刘志丹的告陝北工农群众书等。在陈列橱里，有一架只剩下半个油滾的破旧油印机（見图一）


（图一）

吸引着观众的注意，这架油印机是紅軍长征时帶到陝北的，它随着紅軍翻雪山，过草地，印过无数的文件和宣傳品。

从展覽会可以看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武裝在党和毛主席的領导下，如何逐漸发展壮大起来。还在土地革命时期，陝北地区就在党和刘志丹同志的領导下坚持了对敌斗爭。展品中有赤衛队用过的等身棍、紅纓槍、大刀以及战士們創造的各种眞的和假的武器，其中有可以連发两下的短射程武器“双筒洋炮”；有被战士們称作“英雄的假机槍”的煤油桶，战斗时在煤油桶內燃放小鞭炮，远远听去就和眞机槍一样；还有一尊“楡木炮”（見图二），是用整段楡木挖空內心外


（图二）

加几道鉄箍做成的，赤衛队在这种炮內裝上火藥与鉄丸、石块等攻打敌人的堡寨，发揮过极大的威力。展品中还有抗战时期八路軍自己制造的六五步槍、子彈、手溜彈、擲彈筒和自衛队制造的石雷等。我軍在党的領导下充分发揮了英勇和智慧，就以这样的武器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敌人并壮大了自己。展品中还有参軍、支前的文物，反映了我們的軍队和人民的血肉关系。神木县的“軍队媽媽”王补梅老太太，在自己家里服侍好五十多个伤病員重上前綫，她收到从前綫寄来的报捷慰問信就有二百多件，这里陈列了晋綏軍区司令部政治部写給她的一封慰問信。

在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鎖，边区的財政經济和人民生活遭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鎖，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人民組織起来战胜困难，并实行了精兵简政生产自給。展覽会用实物和图片生动地反映了边区人民在党的領导下在生产建設上的斗爭。从1943年开始，陝甘宁边区从党中央干部到人民群众都参加了“耕三余一”（耕种三年的粮食够四年吃）的大生产运动，边区留守兵团部队仅在第一年就开垦荒山二十万亩。这里陈列着延安干部、学生上山开荒和集体紡綫的照片，党中央机关使用过的农具，还有王震将軍使用过的一把鋤头。著名的南泥湾就是由王震将軍領导的三五九旅开垦的，展品中有南湾泥开垦前的荒地照片和开垦后稻田一片的照片，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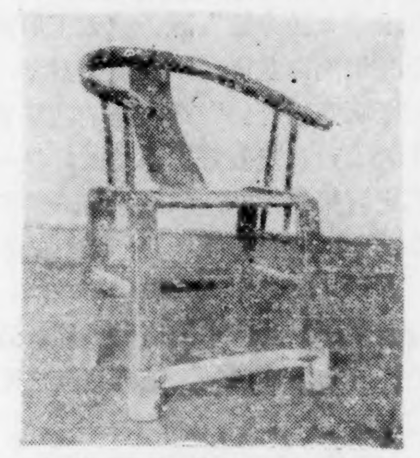
有战士們自己制造的各种农具。展覽会还通过几个典型合作社介紹了边区人民組織起来的情況，其中有包括生产、消費、信用、运輸等部門的南区合作社。毛主席1955年在“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报告中說：“在抗日时期，在陝北的安塞县，就出現了一个社会主义性質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指的是安塞县苗店子合作社。这个社的十四戶貧、中农組織起来后，共同劳动，同鍋吃飯，和灾荒作斗爭，在1944年就打了一百九十五石粮食，展品中就有介紹这个社的照片和他們同鍋吃飯时用过的大鍋等实物。这里还展出了边区人民当时改进和創造的各种生产工具，其中由張忠信同志发明的牛拉多头紡紗机（模型），比手搖紡紗机的效率提高了三十多倍。在党的領导下，边区人民終于打破了敌人的經济封鎖，做到了生产自給，展品中的由当时許多工厂在不同条件下制出的各种产品，看了使人非常感动。

陝甘宁边区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況下，在文教建設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展覽会上陈列了毛主席和参加延安文艺座談会的代表們的合影，陈列了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和当时出版的其他书刊，介紹了中央党校、抗日軍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陝北公学以及列宁小学（苏区一般小学的通称）等学校。当时各級各类学校都貫徹了勤儉办学的方針，学生們一边学习一边劳动，用沙盘代替紙張来写字，用子彈殼制成鋼笔，用桃核制成算盘，小学課本是用馬兰紙（一种很粗的土紙）印的，有的还是手抄本。中央党校沒有鈡錶，就做了一个石日晷来看时間。这些实物都陈列在展覽会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边区卓有成效地发展了革命的文教事业，中央党校、抗大等学校为革命培养了大批的干部。

当时边区干部的生活也非常艰苦，他們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領导群众进行革命斗爭。展覽会上陈列着刘志丹同志穿过的大衣（見图三），这件短大衣刘志丹同志把它穿起来当大衣，坐下来当垫子，睡覺时当被子，經历了艰苦的战爭年月，最后还送給了他的战友商維松同志。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領导同志都和延安普通群众一样地住在窑洞里，展覽会上陈列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領导同志住过的棗园的模型。展品中有毛主席在延安时盖过的被套和坐过的椅子（見图四），有朱总司令用过的飯盒，还有原陝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同志坐过的粗土布沙发（見图五），这个沙发是同志們为照顧他年老利用火柴箱特为他制造的。这些用具都是非常簡陋的。这里还展出了用粗呢子和粗土布做的各种制服，一身制服穿好几年，有的衣褲上补滿了补丁。



（图 三）



（图 四）



（图 五）

这个展覽会的每一件实物和每一張照片都有极大的教育意义，本文只介紹了其中的一部分展品。我們从这个展覽会所反映的史实中可以看到，在过去艰苦的革命年月里，我国人民在党的領导下怎样地进行了革命斗爭，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有了党的正确領导，人民群众就能够发揮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智慧，任何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我們还可以看到革命前輩們以怎样的牺牲奋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去同困难作斗爭，正是由于他們經历并克服了极度的艰难困苦，才为我們創造了今天的美好生活。这个展覽会所展示的历史事实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观众，使人更加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更增强了我們今天建設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决心。发揚艰苦奋斗的革命傳統，紧紧地跟着党走，我們也一定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設中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本刊）

南京的太平天国壁画

郭 存 孝

据史料記載，太平天国在天京，將府第衙館的門窗墻壁均繪上彩画，并多以山水花卉，飞禽走兽为主要內容。清滌浮道人著“金陵杂記”說：“天王府画双龙双凤，东王、北王府門画龙虎，丞相衙繪双象，以下画獅豹鹿兔，墻壁画魚雁等。”又說：“門窗墻壁无一不画。”太平天国对宮室裝飾艺术的爱好是一种風尙。太平天国規定府第衙館的門屏画象是一种爵位等級的表示。天京的壁画約有一千多处，当时的天京几乎是“壁画之城”。但从1864年天京被清軍攻陷，汉奸曾国荃大火燒毀天京，以及清軍的瘋狂破坏，致令天京的太平天国遺迹遺物很难得見，壁画也随之湮沒了。

解放后，由于党和政府对历史文物的重視保护，在南京已发现三处太平天国的壁画，共36幅。这三处是：堂子街72号太平天国某王府大小22幅；如意里40号及44号南京女六中校內大型5幅；罗廊巷17号大型9幅。这三处壁画都是1864年天京陷落后未被清軍燒毀而侥倖保存下来的，經罗尔綱先生从史料、实地調査及壁画本身的特征等方面加以考証，肯定是太平天国时的壁画。

三处壁画都画在正厅两壁的石灰墻上，从已褪色的画面看来，均为水墨淡彩画，取材多如“金陵杂記”所說是山水花卉、飞禽走兽；画上都沒有作者的署名、鈐印和題款，画面上都有水漬、磨蝕、剝落等殘破現象。但其中以堂子街大厅八幅壁画最为完整，画面清晰，彩色鮮艳；次为如意里壁画，罗廊巷壁画剝蝕則較为严重。总的說来三处壁画都具有珍貴的历史价值与一定的艺术价值，现分述如下：

一 堂子街太平天国某王府壁画

堂子街位于南京西南隅，某王府和壁画是1952年1月发现的，1956年10月1日，暫就某王府遺址，建立了太平天国紀念館，几年来曾有三十六万国內外人士观賞了壁画。

堂子街壁画中获得国內外人士一致高評的要算大厅东壁“望楼”一幅（見图一），画上画着一座立于江畔的五层高的楼，上插旗帜，楼下江岸边泊有不少



图一 望楼

軍用船只，看来这是在守衛江防要塞。据清方史料“賊情彙纂”說：“楼高四、五丈”，太平軍首义諸王如东王楊秀淸、北王韋昌輝、翼王石达开門前都有这个“望楼”。这幅画反映了当时軍事斗爭的历史現实。

大厅东西壁上的三幅山水画，都是描繪自然景色的，画上的亭台楼閣、瀑布、流云、木石的笔触粗獷、渾厚有力，其布局构思亦优美。其余有四幅走兽画，其共同特点是动物的形象栩栩如生，其中尤以北壁的“孔雀”（見图二），是一幅具有强烈生活气息的作品。

大厅后面二进、三进还有12幅画在木板上的花鳥、山水壁画和图案，其題材多采用民間喜聞乐見、



图二 孔雀

色彩华美的生动形象，如“荷花鸞鸯”、“獅子戏球”、“鶴鹿灵芝”、“游魚”等，这些画都体現了太平天国人民追求吉祥、幸福、長寿生活的美好願望。

二 如意里太平天国壁画

如意里位于南京城中，靠近当时的天王府，据罗尔綱先生考証，这里曾是天王府属官的衙館，按照太平天国宮室艺术制度，这里墙壁上是画的彩色花鳥画。它是在1954年新宁女中（現改为南京女六中）修理校舍时在露天墙壁上发現的，发現时墙上有石灰敷着，敲去石灰才見到壁画，共有五幅，都是彩色的花鳥画。

这五幅画基本上是清晰完整的，但不及堂子街大厅上的好，其中以“柏树鴿子”、“梧桐白鶴”两幅剝蝕較重。其中“蜂猴图”（見图三）画着一个頑皮的猴子，爬在結满丰碩鮮艳的紅桃的树上，抱着树干伸手去戳蜂窠，以致把群蜂惹起，画家把猴子的机灵、頑皮的性格表現得十分生动。另一幅“綬帶鳥”（見图四），其画技的熟練、优美，比堂子街的花鳥画之艺术技巧为高。其余如“荷花双鷺”等也較优美。

三 罗廊巷太平天国壁画

罗廊巷靠近堂子街，从“金陵杂記”、“賊情彙纂”中，得知这里是太平天国前期重要領袖东王楊秀清的东王府属官之衙館。現为私人住宅。壁画就在二进大厅两壁的墙上。

壁画是1955年10月由一位公安派出所的工作人員发現的，后經罗尔綱先生考定确認是太平天国壁画。

这里的壁画与堂子街壁画体制相同，也是对称的，共有九幅，但是只有两幅較清晰完整，其余殘蝕严重，彩色尽褪，其中一幅磨蝕得已不可辨了。至于比較完整的有“鶴”、“狗”两幅，其余只留下殘角；“狗”画上画着三只狗在打架，其中一只怒目而視，饒有兴味；“鶴”画的形象也很生动，牠那高傲、矯健的姿势甚为动人。



图三 蜂猴图



图四 綬帶鳥

以上三处壁画既无画家的署名、硃印和题款，因此不知是出自哪位太平天国画家之手，估計可能是“画士”、“画匠”們的集体創作，这都是具有一定价值的历史写实画，它在中国人民艺术遺产中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



問：汉代的"分田劫假"是怎么回事？

（湖南衡山二中何器）

答："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并見"汉书""食貨志"及"王莽傳"的王莽改制令。"豪民侵陵"即指当时豪族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怎样的剝削呢？主要內容是"分田劫假"。"分田"，顏师古注說是"貧者无田，而取富人田耕种，共分其所收也。"这解釋应該說是合乎当时实际情况的。即地主分夺农民耕种所得的大半。即董仲舒所謂"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至于"劫假"，师古注說"假"是"貧人賃富人之田"，"劫"是"富人劫夺其稅"，这解釋不太透徹。劫是劫夺，对的；假是什么呢？固然可作地主假田与貧民来講，如宁成"貰武陂田千余頃，假貧民，役使数千家"。这是宁成租貸公田再轉假与貧民，从中获利。这是一种剝削的办法。但照"分田劫假"来看，"假"字解釋为"假民公田"的"假"更合适。劫假即劫其所假。汉代統治主为了緩和阶級矛盾常以公田假与貧民耕种，有些豪族地主劫夺这些假与貧民的公田，这就是"劫假"。如成帝舅紅阳侯王立曾勾結地方官占垦"草田"数百頃，其中"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开发"。这就是"劫假"的一个例子(見"汉书"卷七十七"孙宝傳")，当然，王立这种劫夺行为是与汉政权利益矛盾的，汉政府为了緩和阶級矛盾，而王立所为却会使阶級矛盾尖銳化的，因此当时認为是"罔上不道"而将那地方官治了罪。

又"盐鉄論""园池"篇有"假稅殊名，其实一也"的話，好象假字可以作稅講，因此楊树达先生在"汉书窺管"中便說"劫夺其稅，是矣"。其实按"园池"篇上下文来看，假字仍是把公田池澤假与平民之意。桓寬主張与其他池籞假与平民，不如索性給他們而取其租稅，免得"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也就是免得假而复被权家劫去之意。又假稅是假官家田澤而所出的稅，如"后汉书""和帝紀"："自京师离宮果园，上林广成囿，悉以假貧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稅。"可見原是假而取稅的。又云："其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稅二岁。"然則"假稅"乃是一专名。所謂"劫假"，对农民来說，应該是劫夺所假得的田澤，而不是夺稅。

所以"分田劫假"应該是指两件事：分田是指一般的豪族地主把田租与貧民剝削他們劳动所得；劫假是指豪民夺取假与貧民的公田池澤而剝削他們。两者都是取农民十分之五，王莽指出汉氏虽减輕田租三十而稅一，但以"豪民侵陵，分田劫假"，事实上并非三十稅一，所以說："厥名三十稅一，实什稅五也。"

（峰）

問：英国資产阶級革命中的"掘土派"是怎样出現的？主張与活动如何？

答：十七世紀英国的革命，是近代史上第二个取得胜利的資产阶級革命。在这次胜利的革命斗爭中，英国的劳动人民，特別是广大农民群众成为革命的急先鋒、主力軍和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这不仅表現在1640年春倫敦群众和广大的农民的斗爭揭开了革命的序幕，而且后来內战的胜利、共和国之宣布以及国王的被处死，主要是由于以农民为主的"新式軍队"斗爭的結果。

农民群众斗爭的目的在于废除封建剝削制度，将租种份地变为农民所有。但是領导革命的是以建立資本主义剝削制度为目的的資产阶級，他們仅仅把封建財产变为資产阶級的財产。根据1646年的法令，政府出卖的主教土地大部分落到了資产阶級与新貴族手中，农民則一无所获；反之，农民却必須照旧向地主交租，同时长期战爭的負担以及由此而来的粮食价格的高漲，又加在农民的头上，使农民难以忍受。农民虽则一再向国会請願，但皆石沉大海，毫无所得。而当时的急进民主派，代表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富农的平等派，也不能提出一个适合农民利益的綱領。广大的农村貧民开始以革命行动来回答資产阶級的利己政策。于是产生了"掘土派"运动。

1649年4月1日，一群貧农在爱維拉尔德与溫斯丹萊領导之下，在倫敦附近塞尔利的圣乔治山上开垦荒地，"掘土派"运动于是开始，这一运动之名称亦由是而来。

同年4月26日，"掘土派"发表了他們的宣言，提出了土地公有，一切人都应当工作和都应有同样的財产和同等的权利。并制定了从国王、主教和王党手中取得的空閑土地分配給农民的計划。1651年，溫斯丹萊，在他出版的小册——自由法綱領——里，进一步斥責貴族对农民的掠夺和土地的买卖，認为这是极大的罪恶，并且反对自由貿易，主張将十一世紀諾曼底公入侵英国以来，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加以取消，要求取消教会什一稅，取消庄园上的各种花銷和义务等，最后，树立土地共同使用、財产公有的地上天国。

溫斯丹萊和"掘土派"的思想反映了最穷苦的农

民的愿望，他們深为庄园的苛捐杂税所苦，深受自己土地权和公社附属地权被破坏的痛苦，因此想以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办法来解决土地問題。至于所謂土地公有的思想不过是农民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理想罢了。

部分的“掘土派”領导者主張以起义的方式反对不愿放弃自己特权和在革命中发了財的貴族，但是大多数的“掘土派”的宣傳者如溫斯丹萊号召用和平的方式实現这些改革。

“掘土派”运动开始之后，立即得到广大貧民的响应，如肯特、白金汉、貝尔克、兰开夏等郡都发生了貧农耕种公共土地的运动，并且組成了很多农业公社。

“掘土派”运动出現之后，立即引起了富农以及刚刚取得政权的新貴族与資产阶級的恐惧。于是他們开始以內战和法庭来对待曾經为革命付出过自己血汗的人民了！在“掘土派”出現的地方，資产阶級开始以法庭审訊他們，并派遣軍队进行了殘酷的鎮压。由于“掘土派”領导者的和平主义立場，在1651年底，这一运动便为資产阶級政府所鎮压了。資产阶級反人民的反动本质甚至在它还在襁褓时代，便已充分暴露出来了。

英国“掘土派”运动的出現，反映了英国資产阶級革命运动中两条路綫的斗爭。一条是以农民为主体的英国劳人民徹底清算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現徹底的資产阶級民主共和国的路綫；一条是有利于資产阶級新貴族的、力图保持对农民的封建剝削和半农奴身份，以便能够繼續剝夺农民土地的路綫。这也就是在政治上对保守路綫的斗爭。由于当时英国阶級力量对比有利于保守路綫，資产阶級革命运动的保守路綫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当时英国手工工場刚刚发展起来，而資本主义工业还未誕生，在这种条件下，一方面在封建統治阶級內部分化出了資本主义化的新貴族，一方面形成着正在发展壯大的資产阶級，两者間由于利害的共同性，形成了密切的联盟。而劳动人民在政治上还表現得比較軟弱，其原因是：（一）当时英国的无产阶級还未作为一个阶級形成起来。在当时的手工工人間則由于行会制的瓦解与手工工場制的发展，引起了彼此关系与成分的复杂化；（二）在农民中間由于十六、七世紀圈地运动所引起的剧烈分化，分化成为彼此利害不一的富农、中农和广大的貧农；（三）城乡劳动群众中間尙沒有組織上的联系。所有这些情况妨碍了一切城乡劳动群众在一个共同目标下的团結和統一行动。英国資产阶級正是利用了这种情况，才得以按照自己的利益将革命引向保守的道路，并独占了革命的果实。

（林良）

問：塞尔柱突厥族的兴起对亚洲西部的历史有何影响？

答：塞尔柱突厥族的兴起对亚洲西部的影响問題是一个頗为复杂的問題，这里仅能簡單归納为三項，即（一）使伊斯兰帝国名存实亡；（二）促成了十字軍的侵略；（三）使蒙古人易于征服西南亞。

（一）使伊斯兰帝国名存实亡

阿拔斯朝的哈里发們由于不敢相信自己的人民（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緣故，大致从阿尔馬孟的时代（813—833年）起，即开始召募中央亚細亚的突厥人为佣兵（特別是禁衞軍）。到他的兄弟阿尔牟塔辛姆嗣位时（833—842年），这种风气便大盛起来。由于不断地与拜占廷进行战爭和經常的內乱，突厥佣兵的人数日增，統帅們（突厥人）的势力也愈来愈大。九世紀中叶他們废黜了哈里发阿尔牟塔瓦基尔（847—861年），自此以后废立之事屡見，終至于使哈里发們不得不受制于他們，仰承他們的鼻息。

巴格达的哈里发們不特受制于突厥的佣兵統帅，同时也受制于一些有势力的宰相（維齐或异密之异密〔Amir al—omara〕），如同945年后布伊德家族的維齐們。

为了摆脫这兩种势力的控制，哈里发們經常使用各种方法来和他們对抗，但总不能如愿以償。十一世紀的四十年代，当塞尔柱突厥人的酋長托格魯尔貝格战胜迦色尼王朝并且將它夷灭之后，势力甚盛，因此当时的哈里发阿尔开伊姆（1031—1075年）轉而向他乞援。这就是1055年托格魯尔貝格率領塞尔柱突厥人进入巴格达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1055年托格魯尔貝格进入巴格达后开伊姆对他的戏剧式册封——苏丹，东西之王。自此以后，塞尔柱突厥人便成了伊斯兰帝国的实际統治者，而哈里发則退处无足輕重的、純宗教性的地位。从1055年到1092年之間的四十年（托格魯尔貝格——阿尔卜·阿尔斯兰——馬利克夏）是塞尔柱突厥人的全盛时代，因为他們是一个統一的、团結的民族。他們的势力达到了叙利亞、巴勒斯坦，还在小亚細亚占領了很多地方，1071年的曼西克尔特战役甚至俘虏了拜占廷皇帝罗曼拉斯·戴奧基尼斯。但是自从1092年苏丹馬利克夏去世后，情形就不同了，因为他的几个儿子据地自立，东方的波斯、刻尔曼（波斯迤东），西方的阿勒頗、大馬士革和埃科尼姆（或罗姆在小亚細亚）等地，出現了一系列的小苏丹国，互爭雄長，各不相下。十二世紀后期哈里发的权力曾略有恢复（牟斯塔底在位时），但他的号令也仅及于巴格达和兩河流域一

帶，其它各地仍在塞尔柱人手中。这种情形一直維持到十三世紀中叶。因此我們認为，作为一个阿拉伯人的帝国来說，它在十一世紀中叶塞尔柱人以“勤王”的姿态进入后即已名存实亡。

（二）促成了十字軍的东侵

关于十字軍的东侵，其主要原因是西欧本身阶級矛盾的尖銳化，但塞尔柱突厥人的兴起也不失为促成其东侵的原因之一。1076年塞尔柱突厥人占領耶路撒冷，構成了西方基督教徒“解救圣墓”的借口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則由于塞尔柱人占領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些重要的商业城市，阻滯了西方商人获得东方貨物的一个来源，也是不可忽視的。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塞尔柱突厥人在小亚細亚的发展。我們在前面提到过塞尔柱人在小亚細亚建立的埃科尼姆苏丹国。这个苏丹国的土地完全是他們从拜占廷的統治下夺获的，到十字軍东侵前，已經包括了整个安那托利亚半島。苏萊曼（馬利克夏的第五个儿子——最小的儿子）甚至將这个苏丹国的首都建立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南岸，去君士坦丁堡不过一百英里的尼西亚，并且在那里扩軍备战，兴修要塞，企图进攻君士坦丁堡，这样才引起拜占廷皇帝們的恐惧，迫使他們向教皇以及西方的基督教国家求援。1095年教皇烏尔班二世在克来芒宗教大会上的演說詞中就曾着重地提到这点（参閱世界史資料丛刊初集，“中世紀中期的西欧”，第56—57頁）。如果不是面临塞尔柱突厥人进攻的威胁，我們能設想崇奉正教的拜占廷皇帝肯低头向罗馬教皇求援嗎？如果沒有拜占廷的支持、援助、策应、供給，我們能設想西欧那些封建貴族們敢于掀起第一次东侵的十字軍嗎？

（三）使蒙古人易于征服西南亚

十三世紀前期蒙古人兴起的时候，中央亚細亚有一个幅員广袤的国家名叫花喇子模（其前身为昭武九姓的火寻）。花喇子模在公元十一世紀时为伊斯兰帝国的一个行省，其始祖努什的金原是塞尔柱人第三任苏丹馬利克夏的奴隶。努什的金四傳以后，到摩哈美德在位时，势力已非常强大，遂乘机独立。如我們在前面所說，当时正值巴格达的哈里发們企求摆脫塞尔柱人的控制，因此勾結摩哈美德，于1196年大敗塞尔柱人，將他們的势力从巴格达逐出。但后来摩哈美德也同样挟持哈里发，因此哈里发阿尔那細尔轉而向蒙古人乞援（見W. Muir，“哈里发衰亡史”，第587—589頁，轉引伊本·阿尔阿地尔編年史所記）。当然那細尔乞援成吉思汗之說不一定可靠，但后来成吉思汗进攻花喇子模时，无論巴格达的哈里发或塞尔柱人都沒有給予后者以任何援助則为事实。其次，花喇子模破灭后，其王哲拉尔·哈丁引兵西来，但又不見容于埃科尼姆的苏丹凱科巴德。1230年凱科巴德糾合埃及艾育伯朝的軍队共同击敗哲拉尔·哈丁于小亚細亚东北的埃尔青干，但不久凱科巴德又与埃及艾育伯朝发生战爭。因此到十三世紀中叶旭烈兀引兵西侵时，伊斯兰帝国早已支离破碎，沒有任何足恃的組織或任何可靠的軍队来抵御，束手待亡而已。向使沒有1260年秋天貝巳儿思在阿音札魯特大敗怯的不花的那次战役，蒙古人的馬蹄車轍可能已經印到尼罗河的三角洲上去了。凡此种种都說明蒙古人之征服西亚与西南亚，处处都和塞尔柱突厥人的活动是联系着的。

末了，塞尔柱突厥人在其它方面也还有些影响，而为我們应当提到。首先，塞尔柱人并不是一般所想象的那样野蛮的民族。他們在进入巴格达以前已經接受了伊斯兰教，而且由于受伊斯兰文化薰陶，已經知道农业和工商业。他們在自己所統治的区域中都能使伊斯兰文化繼續发揚，而且也不比哈里发們的統治更严峻，因此多繁荣富庶。例如在馬利克夏的統治时代（1073—1092），由于大維齐尼沙姆·牟尔克的輔政，曾有很多有益的措施。他設立了好几所大学（如巴格达的尼沙米雅大学），以及医院、寺庙、观象台，又改訂日历，詩人学者，英才輩出。不特在巴格达如此，其它各地也如此。埃科尼姆（罗姆）苏丹国的首府自十字軍兴以后，南迁至科尼亚（埃科尼姆城），其建設之美，一时无兩。塞尔柱人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話說：“看見过科尼亞的人，就等于看見了全世界。”其自負可見一斑。

其次，中世紀后期奧托曼土耳其帝国之建立，实即以塞尔柱人的埃科尼姆苏丹国为基础。研究土耳其帝国的历史也必須回溯到埃科尼姆塞尔柱苏丹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說，近代土耳其实即塞尔柱人所建立的国家的延續。我想这样說也不算太过。（刘啓戈）

更　正

本刊1958年5月号第53頁左欄第34行“有人一次賜給万頃”应作“有人一次請賜万頃”。第56頁右欄第5行“則天下其熟能說之”应为“則天下其孰能說之”。同頁右欄第31行“而成始以病終”脫一“成”字。



（左） 焼鸦片
鸦片战争(1840年—1842年



金田起义
太平天国(1851年—1864年)



（左） 武昌起义
辛亥革命(1911年)



（右） 五四运动(1919年)



（左） 五卅运动(1925年)



（右） 八一南昌起义(1927年)



（左） 游击战
抗日战爭(1937年—1945



（上） 胜利渡長江 解放全中国
解放战爭(1946年—1949年)